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阿杜 貝科 加支 烏斯 合著
莫 耐 軍 譯

上海
第一般書店
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3457B

阿貝支加烏斯
杜科爾
合著
莫耐軍譯

政治經濟學方法

法論



上海一版書店發行

~~1604408~~

序論

布爾喬亞的教科書，一定是把關於經濟學的對象和方法的問題編在前面的。可是，我們却不編在最先，而編在最後，這也許會使人感到奇怪罷。（註一）但像這樣來編配內容，在卡爾主義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必然的。當研究了經濟學的基礎課程之後，我們才能提起像方法這樣一般的問題。我們由於把研究過的各種材料定形化，還原和整理，於是關於研究的對象，獲得了某種表象；由於研究卡爾伊里奇主義經濟學，我們同時也領悟了卡爾伊里奇的方法。這樣，在豐富了我們所採集的科學材料之後，我們才能詳細地專門地考察經濟方法論這個問題。

（註一）斯維爾托洛夫××黨大學經濟學部的課程表，關於方法及對象的問題，不編在課程的開始，

而編在終結，即要通曉了經濟學的基礎問題之後才研究。

卡爾說：「因為我以為預先想像了今後必須證明的結果，這是會生出混亂的；而且想來研究我的講義的讀者，應該抱定從特殊進到一般的決心，」所以省略去爲了政治經濟學批判而『既經草就了的一般序說』，（註二）即省略去方法論的解說，單單涉及他對於社會構成及其發展的見解之一般特徵，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方法，內在的對象本身裏面。若依黑格爾的觀念論表現，方法是對象的精神，實體。某種科學的方法，不能離開它的對象和它的內容的關聯而研究。倘說卡爾主義哲學，——唯物辯證法——可以無形消解於其他各科學裏面，那就和主張「科學是它自身哲學」的機械論者，也是同樣錯誤。當做科學的認識論之方法論和理論看的辯證法，是跟其他的實證科學並存的。（註三）

同時，在各種科學領域內之辯證法的適用，是各自固有的，要把握辯證法，

（註二）政治經濟學批判專論。

就必須明白方法適用的特殊性。——特殊性，依存於研究對象及研究的具體材料的性質。——對象，規定着能夠科學地認識對象的方法。我們在研究科學材料的過程中，把握它的方法。

依照上面所講的，可以明瞭已往經濟學者間所展開的論爭的根本錯誤。沒有根據把握卡爾經濟學的材料，而領會經濟學方法，沒有根據更豐富更鑽研經濟學的方法，再盡全力研究現代迫切的問題；反而，雙方——機械論者和魯平主義者。——都越出唯物辯證法的正軌，站在關於一般方法的抽象問題上，相互撕殺。因此關於經濟學對象和方法的論爭，當然要墮入抽象的煩瑣的論爭去了。（註四）

一方面，對卡爾主義之機械論的修正，他方面，對公然的觀念論修正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要求在研究經濟學時，曝露出現階段經濟學上敵視卡爾主義的各種觀念的特殊形態。否則，就不能作經濟學的正確研究。——以××鬥爭的指導原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指導我們。——然而，曝露經濟學上的修正主義這個課

題，決不是粗疏地一瞥所能想像的那麼簡單的。

經濟學論爭的一特徵，就是雙方都站在擁護正統卡爾主義的旗幟之下而行動的。修正主義，一般地大都是掩飾和化粧自己的本質的。在普羅列塔利亞指導之下，在社會科學的卡爾主義指導之下，對卡爾伊里奇的敵對行動，差不多始終都是假借着卡爾伊里奇學說的『新』理解和解釋這種招牌而出現的。

這種卡爾主義的偽造，往往是極無意識的。卡爾說：「體系標記跟商品標記所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不僅欺騙了買手，而且還欺騙了賣手。」（資本論第二卷）。我們必須追究和揭穿：經濟學上觀念論的和機械論的傾向的代表者，在方法論的領域裏，怎樣地自欺欺人。何況在經濟學領域裏的錯誤，對於我們的鬥爭和建設的實踐上，尤其是有着直接關係。經濟學，到底是黨派的科學。「在現代社會，經濟學跟認識論同樣是黨派的科學」（伊里奇語）。在經濟學方法論論綱的性質所允許的範圍，我們要努力從論爭焦點的抽象公式，連系到蘇維埃經濟

和現代帝國主義的諸問題。我們當前的任務，在於明示：方法論諸問題的錯誤設定，會怎樣地在理論上誘導到不正確的理解社會主義建設和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

(註三) 恩格思把「自然辯證法」第八章，題為「當做科學看的辯證法之一般性質」。

(註四) 參看米留定和波里林的論文論經濟學上的論爭。「波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三〇年第二號

——由該雜誌編輯部註釋。

(註) 「波爾什維克」雜誌編輯部給米留定和波里林的論文的註釋說：「一方面，對待理論經濟學諸問題上的機械論見解，他方面，對待以魯平為代表的卡爾主義之直接觀念論的孟雪維克的修正，不能不執行斷然的鬥爭。」

卡爾伊里奇經濟學說的機械論修正，其根柢在於波格達諾夫主義。在黨內，這種最鮮明的代表者，要算同志布哈林及其學派（愛亨瓦爾特，馬列茨基等），他們在理論基礎上，是把右傾的觀念公式化了。許多同志（畢索諾夫，寬恩等），在體系上採用了的機械論的錯誤，是和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理論錯誤相吻合的。——假使一部份共產主義經濟學者，在理論上，一方面依據機械論的障地，一方面雖然為着黨的政治方針而積極地鬥爭，可是把政治背景離

開「經濟學這種黨派科學」（伊里奇語）的理論，便是最大的不徹底。經濟學上的機械論者，已經給赤裸裸地曝露出了。他們方法論的反伊里奇的本質，在理論上誘導到機會主義的政治結果。

編輯部指摘下面一件事實：同志畢索諾夫和寬恩，在「波爾什維克」雜誌的特別聲明里面，他們完全承認了：跟魯平鬥爭時，所採用的機械論錯誤；並且聲明了：在根本上，是贊成同志米留定和波里林的論文的。

魯平的理論諸勞作，一方面表現着著者的孟雪維克見解，一方面割去卡爾主義革命的內容，拿公然的觀念論的和機械論的構成之混合物，去替換卡爾伊里奇的辯證法唯物論。魯平據守着反卡爾主義的障地，同時回避蘇維埃經濟問題的檢討，和現代帝國主義的研究，離開活的現實，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和世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鬥爭的實踐，而逃亡到抽象和煩瑣哲學的領域里面去了。

還有，在根本上，一方面正確地理解經濟學上機械論的危險；一方面却不正確地理解魯平的反卡爾主義體系的危險的同志們（波里林，李昂吉葉夫等），也實在犯了很大的錯誤。他們都變成了魯平主義的俘虜，宣揚了魯平的反卡爾主義見解，說是：「加深我們對卡爾主義

經濟學的理解的」(波里林語)，「供卡爾經濟學發展和加深的」(同志科洛梵，格列布里斯等)，基於「對卡爾伊里奇經濟學說的精神之正確理解」，「嚴正的卡爾主義」(李昂吉葉夫)等等。這樣，不但沒有曝露魯平的反卡爾主義見解，實際上，反而助長魯平的反卡爾主義見解的普及，因此他們都變成了魯平的擁護者。雖然後來他們最初承認魯平的「各個的曖昧」和「可疑」的公式化，接着肯定魯平「觀念論錯誤的體系」，然而將魯平的勞作，評價為「嚴正的卡爾主義」，這除了當做不澈底和折衷主義而加以特徵之外，再沒別的办法。

目次

序論

第一章 當做生產諸關係底理論表現看的政治經

濟學諸範疇

第二章 廣義政治經濟學和狹義政治經濟學

第三章 生產諸關係

一、生產諸關係的物質性

二、生產關係和技術關係

三、生產關係、交換關係、法律關係

第四章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相互關係

一、技術和生產諸力

二、當做生產諸力之發展形式看的生產諸關係

三、技術學與政治經濟學和批判的技術學史

第五章 當做政治經濟學對象看的資本主義生產

方式

一一〇

第六章 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及分析和綜合的統一

一五一

第七章 在卡爾經濟學體系之『邏輯的』和『歷史

的』

一八七

第八章 均衡理論和卡爾的經濟學理論

二〇八

第九章 卡爾的方法和古典派經濟學

二三五

一、在斯密士和李嘉圖體系中的經濟諸範疇之發展

二、古典派經濟學方法論之特徵

第十章 在布爾喬亞科學中經濟學對象的規定

二六二

第一章 當做生產諸關係底理論表現看的政治

經濟學諸範疇(註)

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是從商品的分析開始。在我們看來，商品是一種二重的東西，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價值當作物的關係、當作交換價值而出現於我們的眼前。可是「物」的這種性質，即是能夠交換的性質，並非從物本身的性質產生出來的，而是從產生物的社會生產關係產生出來的。在依照一定的預定生產和分配計劃來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里面，勞動生產物，並不在市場上交換，也不當做商品而出現。只有在不直接統制生產者諸關係的商品經濟里面，社會生產的統一，就得通過市場才能實現，勞動者的生產物，也得採取商品的形態。以一定的比率來互相交換的勞動生產物之性質，是從一定的社會生產組織形態產生出

(註)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不外是生產關係的理論表現。——哲學之貧困

來的。這樣，我們在物與物關係的背後，暴露了商品生產者間的諸關係。也就說明了價值不外是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之表現罷了。可是這種關係的發展，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的發展，很快地使得商品分裂為商品和貨幣。

所有的商品，直接的祇是單純的商品體和使用價值而已。至於商品同時又是價值這件事，却被隱蔽着。商品的內部對立，為要採取外部表現的緣故，所以商品必須使其形態二重化。

若就商品的性質來說，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形態。商品的價值，只有在一種商品和其他商品的關係上，才能夠表現出來，於是一種商品體，就變成了其他商品的價值表現的形態

如果交換關係發展到某種程度，就會生出下面的結果：即是商品世界里面，抽出了甲種商品，其餘的一切商品，都在這甲種商品里頭顯現出自己的價值來。在跟其餘商品的關係上，這甲種商品當做一般等價而出現——能夠和其餘任何商

品直接交換的。——這樣，商品經濟之根本矛盾的發展，就引起商品分裂為商品和貨幣。所以貨幣這東西，並非物的自然性質，不過是商品經濟的生產關係之表現罷了。

到現在為止，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還沒有理解貨幣的經濟性質之能力，借用格蘭斯頓的巧妙的話來說：「雖然戀愛會把人們弄昏，但是還不至像關於貨幣本質的穿鑿那樣，把人們弄得更利害」（註）。對於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貨幣的性質，依然還是一個謎。只有在政治經濟學諸範疇的背後暴露出人的生產關係的卡爾，才成功了建立包括的貨幣理論。依照卡爾的見解，貨幣的性質不是物，乃是採取物的形態而出現的生產關係。

商品分裂成商品和貨幣，對於商品經濟的生產關係的運動，構成了必然形態。這個形態，就是商品流通的形態 $W—G—W$ ，其中交錯着一切商品的形

（註）見政治經濟學批判

態變化，實現着各個商品生產者相互間的全面關聯和依存。

貨幣，在其一切多樣的機能上，服務於流通過程，造出商品生產關係的全面成長——商品生產的諸關係，超越了單純商品經濟的界限，而轉化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諸關係。——之可能性。貨幣遂轉化為資本。

卡爾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其根抵，在於將辯證法的發展理論，適用到布爾喬亞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領域里面。所以卡爾把簡單的經濟諸關係（商品和貨幣），看做更複雜的、發展了的關係（資本）之一般形態和萌芽。

卡爾把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里面，分析了商品社會之一般的生產關係、和商品生產者的人類關係；分析了商品、貨幣和商品流通。——看做研究資本的著作之第一篇，因此叫做『資本一般』。更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再三作商品和貨幣的分析，構成了卡爾體系的入門（註）。

商品流通發展的結果，很快地就發生：直接生產者喪失生產手段的過程、生

產手段集積於資本家階級、勞動力的商品化等等現象。在這里，我們暫時不談資本發生的歷史條件，——卡爾在『本來的蓄積』（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研究過的。——在這裏，要緊的，祇是指出隱藏在資本底下的勞動者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一定的階級關係。祇有基於這兩階級的諸關係，貨幣才能夠獲得掠奪剩餘價值的能力，即是變成資本。剩餘價值的生產，乃是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之下剩餘生產物的獨特的生產形式和佔有形式。因為支配階級的榨取關係和佔有剩餘生產物，不單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就算在封建經濟的諸條件、奴隸經濟的諸條件，領主和奴隸所有者都是佔有由農奴和奴隸勞動所形成的剩餘價值生產物的。不過在資本主義經濟，這種佔有獲得獨特的形式罷了。這種獨特的形式是靠着勞動力的流通，即勞動力的賣買諸關係為媒介的，而在這賣買諸關係中，隱藏着資本家階級掠奪勞動者階級的真正榨取關係。

（註）在最初的草稿，卡爾預定將這篇叫做『序論、商品和貨幣』。參看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三卷。

因此，剩餘價值的範疇，不僅特徵着這一階級掠奪另一階級所形成的剩餘生產物，而且特徵着執行這種掠奪的特殊形態。資本和剩餘價值，是表現一定的歷史經濟形態所固有的階級關係之特殊關係的範疇。

假定說：資本不是物，乃是表現在物里面的，並且把特殊社會機能賦與物的一定的社會關係；那麼，對於資本的分割，也適用同樣的說法。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也可依照它們在資本增殖過程所分担的任務來區別。「一方面生產手段，他方面勞動力，兩者總不外是最初的資本價值脫去了貨幣形態而轉形為勞動過程的要素時之各種存在形態」（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章），兩者都顯現資本主義榨取關係的更發展的規定。轉形為生產手段（即原料、補助材料、勞動手段），而在生產過程中，不變化其價值大小的資本部分，卡爾叫它不變資本部分，或簡稱不變資本，這不變資本，在生產過程，吸收新形成的價值，同時又吸收剩餘價值，轉形為勞動力，而再生產它自身的等價物和剩餘價值這種過剩部分的，亦即在生

產過程中，變化其價值的大小的資本部分，卡爾叫它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可變資本。這可變資本，對於總資的保存和增殖，是很有用處的。

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差異，顯示出資本增殖的不同方法。靠着延長勞動日，以增大剩餘價值的，卡爾叫它絕對剩餘價值；靠着縮短必需勞動時間，以增大剩餘價值的，卡爾叫它相對剩餘價值。不消說，榨取的性質，和榨取關係的諸條件，在各種情形之下，不是一樣的；剩餘價值的不同的形態，暴露出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關係。卡爾政治經濟學不但揭穿各階級的特殊關係，而且最縝密地探討這些諸關係的構造和運動。

由於動的處理資本的生產過程，才能考察資本家對勞動者關係之真正的本質。只有分析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才能包括地揭穿資本主義榨取的方式。倘若拿單純的交換和個別的生產行為來看，就會以為某勞動者的出現為勞動者，某資本家的出現為資本家，這總是偶然的。但是只要一經分析資本的蓄積過程來看，就

會明白依據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勞動者階級不可避免地要變成勞動力的賣手，資本家不可避免地要變成勞動力的買手。資本的積蓄過程，逐漸擴大資本的支配範圍，逐漸提高工資勞動對於資本的隸屬程度。在單一的生產行為上着眼，資本的起源，依然是祕密的。只有分析資本積蓄，才能辦明一切資本，總歸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在單純的交換行為上着眼，也許你要發生出一種錯覺，認為資本家和勞動者是平等的哩；可是一分析了資本的積蓄過程，就不但打破了這種錯覺，並且還明示出資本家和勞動者間的不平等之恆常的再生產。政治經濟學諸範疇的安定性、和在資本主義秩序里面物所具有的社會性質之外觀的恆常性，不過是顯現出通過物而不絕地實現的生產關係之繼續更新罷了。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卡爾解剖了資本之內部生命，考察了資本的生產過程中之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的關係。這些一切，都理論地表現於政治經濟學之一定諸範疇里面（註一）。可是，這些範疇，不但是表現資本主義生產諸關係的，同

時又是隱蔽資本主義生產諸關係的。

由於下面所講的事實，越加促進了生產關係的神祕化，即是：「資本從內部有機的生活，轉入外部生活的關係，於是便不再是資本和勞動相對立，而是一方面資本和資本相對立，他方面各個人也單純當做購買者和販賣者相對立着。」
(資本論第三卷第二章)

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卡爾才研究這些外部生活的關係，亦即資本的流通過程
(註一)。

資本，在其運動中，通過如下系列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資本家當做購買者，出現於商品市場和勞動市場，他的貨幣轉形為商品 (G—W)。

第二階段：是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同時是商品和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

(註一) 資本論第一卷，題作「資本的生產過程」。

第二階段：資本家當做販賣者復回到市場上，他的商品轉形爲貨幣（ M ）—— Q ）。

資本存在於循環的各階段，依照在各階段的形態如何而區別開來。這些形態表現於政治經濟學的各种範疇，就叫資本的貨幣形態、資本的生產形態、資本的商品形態。

各種資本通過了這些形態，在流通領域里面——生產物互相交換——實現互相聯系的諸關係，實現各個個人資本間的關係。

卡爾由於考察各資本形態的運動，即分別考察各資本形態的獨自的循環，而

（註二）卡爾在給恩格斯的信裏面寫道：「照你所知道的，在資本論第二卷我打算提到在第一卷裏面所展開了的諸前提，而處理資本的流通過程。因此從流通過程所產生的新形態：像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資本的回轉等將會出現罷。」（一八六八年四月三十日）。資本論第二卷題作

「資本的流通過程」。

解明了這種關聯。同時從資本的商品形態和貨幣形態的循環上，特明示出：爲要使得生產過程能夠很順利地繼續進行，剩餘價值的生產能夠很順利地繼續進行，那麼，各個資本的形態變化，就得互相不中斷地連續着。

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間的生產關係，在其發展形態，在流通領域——這里面，實現榨取關係的——又必然包含着各個資本互相連系的諸關係。但在流通領域里面，並不直接形成剩餘價值，只不過發生幫助實現剩餘價值的資本罷了；那就是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是使到資本的本性更加隱蔽的。一切資本，都要從生產領域移行到流通領域，都要從生產資本的形態移行到商品資本、貨幣資本的形態。但是這種移行，在生產資本的各部分，不是一樣的。

卡爾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面，區別開生產資本的各構成部分在資本增殖這點上所演的作用；在第二卷里面，考察資本的部分回轉之不同的性質；得出生產資本可分爲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別。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別，在於資本轉

移入生產物里面的不同的價值轉移樣式，亦即在一回轉期間內，是完全補償資本的價值，或者部分補償資本的價值這點。布爾喬亞學者，往往把這種區別混同技術的區別。可是卡爾加強的說：「這時候（區別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時候——著者）要討論的問題，不是物所包攝的定義，乃是應該表現於一定範疇的一定機能。」（資本論第二卷第十六章）

倘若考察社會總資本的生產物之實現，就格外明瞭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範疇是表現生產關係的。在一個時期內（比方說一年），還沒有轉移入生產物的價值構成成分中的固定資本部分，不能從生產物的價值構成成分收回來。至於流動資本部分，在每一回轉，就跟着已消耗了的固定資本部分一起全部流回。所以從流通領域歸還的生產資本流回形式，亦即靠着交換——在資本家自身之間進行的——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的生產關係之不斷更新這個法則，也當做資本之分割爲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而成立。可是，同時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範疇，却越加掩蔽

了資本就是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榨取關係、人的關係、社會諸階級的關係。分爲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資本分割，——更明確地顯現出資本是生產關係。——乍看起來，就會湮沒在這些範疇的背後。

然而，生產關係的『神祕化』和政治經濟學諸範疇向神祕符號的轉化更加發展。資本所生產的商品，在資本家看來，只認爲是轉移到流通界去的固定資本部分和流動資本部分。結果，生產商品所需的費用，在資本家的眼里，不過是生產商品所需的支出總額，這些支出的一切要素，只是費用價格這一新範疇的相等部分罷了。

費用價格，是補償已消費的生產手段的價格和勞動力的價格的商品價值之一部分。在資本家看來，商品是有價值的東西，不過他們却認爲商品價值之大小是由費用價格來決定的。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經濟，費用價格獲得了價值生產本身這一範疇之錯誤外觀。」（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第一章）從費用價格的範疇

來講，「購買勞動的資本部分，跟購買生產手段（棉花、石炭等）的資本部分所不同的地方，只是這兩種資本支付素材不同的生產要素這一點，決不是在商品的價值形成過程、因而在價值增殖過程，資本演着機能不同的任務這一點。……

（所以從費用價格的範疇來講，——譯者附加——）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沒有區別了。」（資本論第三卷第一冊第一章）資本主義的榨取關係，也就越加被隱蔽着。再則，對於費用價格的超過部分，當作前貸總資本的產物而出現時，剩餘價值當作轉化為利潤的結果，這些諸關係，就蒙上了拜物教的形式。這種轉化，在論理上是從下面的事實產生出來的，即是：（一）資本家不但把生產資本看做前貸資本，連流通資本，也看做前貸資本。（二）區分生產資本的標準，不是依照資本各部分在形成剩餘價值過程中所演的機能。（三）生產資本的支出，採取等於商品費用價格的商品價值部分的形成這種外觀。

同量的資本，在各種部門所形成剩餘價值的數量，是有關於資本有機構成之

高低和回轉速度如何的。因此，在各種產業部門所見的資本有機構成和回轉速度的差異，制約着等量資本在各種產業部門所形成的種種剩餘價值量。倘若價格以價值爲中心而變動的話，那麼，各個資本家就會實現不同的利潤率啊。可是各種產業部門的利潤率，一旦生出各種差異，資本就必然會從利潤率低的部門，移動向利潤率高的部門去。於是就生出各種利潤率趨於均等的傾向，價值趨於生產價格的轉化。

生產價格的範疇，不祇是表現榨取關係、表現資本家階級佔有剩餘價值的關係，同時還表現產業資本家階級之內部的諸關聯，以及表現這些關聯以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的關係爲基礎而怎樣地形成。所以像魯平那樣，把生產價格的範疇，看做單單表現產業資本家間之關係的範疇，這是錯誤的。在這里，關係更加複雜了。這個範疇，是表現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的諸關係的，又是表現從勞動者階級掠奪得來的剩餘價值分配於產業資本家之間的分配關係的。

對於一切資本家，從共通的平均利潤率上，顯示出他們在榨取勞動者階級這種關係上之平等。一切資本家，都是當做榨取股份公司的股東而出現，都是當做按照自己的資本額而分享總剩餘價值的收受人而出現。

概括起來說，經濟學上的諸範疇，越是完全地表現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也就越加使人與人的關係神祕化，這種神祕化，在分配關係上，達到了頂點。

在資本論第三卷里面，最完全地暴露出這些諸關係，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亦即研究了資本在其再生產法則之基礎上所採取一切多樣的形態之總體活動。在第二卷里面，說明了從生產形態到商品形態、貨幣形態的資本轉移的必然性，貨幣形態的資本由循環而解放的必然性。在第三卷里面，明示了：社會資本的各部分，怎樣使那些一切機能成爲自己的；商品——商品資本、貨幣——商業資本、利貸資本，怎樣從生產資本分離出來；在資本主義生產諸條件之下，土地所有，採取怎樣的形態；資本家階級對勞動者階級之總體關係更加發

展，轉化爲支配階級間之更複雜的多樣的關係之基礎。這些關係，因爲是掠奪剩餘價值的諸階級間的關係，所以從剩餘價值各部分趨向特殊的經濟範疇之特殊化中表現出來，轉化爲利潤的剩餘價值，首先分成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其次再分割爲企業者紅利、利息、地租。工資還依然和它們並立着。於是新形成的價值總額，當做種類不同的、外觀獨立的各部分之總額而出現。在利潤上，資本家的所得跟勞動者的所得相對立着。亦即利潤還鮮明地跟工資相對立着。這種鮮明的程度，等到工資跟企業者紅利相結合，跟利息、地租相並立時，就完全消失了。新形成的價值，分配於這些範疇而被掩蔽，必需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區分就完全消失了。

分配諸關係，不過是生產諸關係之簡單的反面。可是表現分配諸關係的諸範疇，却變成完全歪曲這些諸關係的基礎——價值的諸關係——之結果、完全的謎、社會的象形文字。剛看資本主義社會的表面，就會以爲土地生出地租、資本

生出利息、勞動生工資確是自然的，於是商品的價值，就變成了加算它們的數量之總和；基礎的範疇，——倘若不把它分析，就不能理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怎樣表現於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中。——也就會變成最發展的經濟範疇、當做簡單的總和而出現。「在生產的代理人看來，資本、土地所有、勞動，是三個不同的獨立泉源，是每年生產的價值之三個部分，因而又是含有價值的生產物的三個不同的構成部分，因而又不僅是這價值的不同諸形態，——當做所得而歸屬於社會生產過程之特殊的諸要因的——從這三個泉源產生出來，並且連價值本身及那些所得形態，也都從這三個泉源產生出來。」（資本論第三卷）

在這里，卡爾所解釋的課題之一切複雜性，開始明白了。即卡爾開始辨明了物的神祕性質——在未受科學指示的人的眼中，包圍着經濟的諸範疇的——混亂的相互關係的渦流和不合理的結合。根據以自己的分析的結合爲出發點，按着生產關係的發展之線索而尋求，於是卡爾開始從頭到尾的解析一切的渦流，明示了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怎樣顯現於經濟的範疇里面；這些諸關係的發展，怎樣產生出越更新鮮的、越更複雜的——甚至那些諸範疇從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起源，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那麼複雜的——範疇。

關於經濟學的諸範疇，像上面所述的梗概一樣，乃是說這些一切範疇是表現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關係的。商品、貨幣、資本、剩餘價值、利潤、商業利潤、利息、地租等等，互相保持內部關聯，同時表現布爾喬亞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間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之內部關聯。經濟的範疇之發展，表現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具有的特殊性，決定經濟學上諸範疇的特質——是物質的、而且是使得現實神秘化的特質。——總括起來說，歷史的特殊的生產關係的體系和社會固有的自然史的構成，隱藏在經濟諸範疇的總和的背後。可是，當做這種構成看的資本主義之研究，才是卡爾經濟學的真髓所在。因此卡爾再三強調了：經濟學上的諸範疇，不外是人與人之間的生產

關係之理論表現。因此伊里奇給轉形期經濟學的旁註，對於布哈林引用卡爾的話「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不外是社會生產關係之理論的抽象的表現，」附加了一點意見說：「這才是辯證法唯物論之精確的簡明的真實的表現。」

要之，布爾喬亞學者看做包羅萬有的、而且一成不變的經濟的諸範疇，其實不外是資本主義之歷史的——過渡的生產關係之可變的表現罷了。因而政治經濟學必須以研究生產關係之發生、發展、以至死滅的法則為任務，也就是政治經濟學上卡爾辯證法的方法之特徵。有一位資本論的批評家可夫曼氏，——他的敘述，是卡爾自己完全贊同了的。——曾確當地指示出：「在卡爾看來，找出從事於研究的各種現象之法則，固然是重要，……還有更加重要的，就是找出各種現象的變化和發展的法則，亦即由這一形態到另一形態的推移之法則，由相互關聯的某一秩序到另一秩序的推移之法則……卡爾的科學的目的，在於闡明：支配着一個社會有機體之發生、存續、發展、滅亡，和由另一較高級的社會有機體所代

替。的。特。殊。法。則。」（資本論第二版的序文）

伊里奇也同樣地特徵着卡爾經濟學的辯證法說；「從其發生、發展及沒落上，歷史地研究一定社會的生產關係，——這就是卡爾經濟學的內容。」

第二章 廣義政治經濟學和狹義政治經濟學

既然有了卡爾伊里奇的明瞭的、不容一切曲解的定式化，那麼，關於卡爾主義經濟學研究什麼這個問題，本已完全沒有論爭的餘地了。

前章說過，假定卡爾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是表現資本主義生產諸關係的；又假定在這些諸範疇的總和的背後，隱藏着特殊的受歷史所制約和規限的社會構成的話，那就誰也不能否認卡爾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也帶有同樣的特殊性質，只能夠表現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關係。

然而，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爲何這一問題的最初論爭時（一九二五年光明主義學院），這點却成了問題，成了論爭的焦點，將經濟學者們分成兩大陣營了。波格達諾夫一派主張：卡爾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除了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生

產關係之外，還包含着其他一切社會構成的生產諸關係；結論是經濟學是研究所
有社會經濟構成的一般發展法則。當時以布哈林爲中心的反波格達諾夫派，他們
主張：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乃是包藏着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生產過程的諸關係
之拜物教迷信。他們認爲政治經濟學的本質，政治經濟理論的必要的基礎，只是
在於借着抽象理論的幫助，打破拜物教的迷信，研究隱藏在其背後的生產關係這
一點。可是因爲披着拜物教外衣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以布哈林及其
一派定下了結論，說政治經濟學之所以必要，只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而
言，只有研究資本主義，『理論科學』才是可能的，只有在資本主義秩序之下，
社會發展的諸法則才適合於理論的研究。

一九二五年的論爭當時所處理的問題背後，一般地隱藏着這樣一種立場：即
是政治經濟學是單單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諸法
則呢？抑或是研究一切經濟構成的一般諸法則和生產的社會組織的一般呢？』前

者對呀——還是後者對呀？當時這樣提起了問題。其實真理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後者。兩者的立場，都是非辯證法的。正確的答案是這樣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各種社會經濟構成的特殊諸法則；狹義政治經濟學，——不消說是卡爾的政治經濟學的精華。——單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構成的特殊發展法則。狹義經濟學的諸範疇，只是表現、而且能夠表現資本主義社會構成的生產關係。然而卡爾伊里奇的方法，同時可以適用於所有的社會經濟構成，在他們政治經濟學說裏面，建立着對於其他一切社會形態的理論研究之鞏固的基礎。

爲了說明出台於一九二五年論爭的雙方錯誤，且考察考察他們的基礎論綱看罷。這一場論戰，沒有當時暴露出波格達諾夫和布哈林的方法錯誤。所以再考察其往後的發展，也是格外必要的。一九二五年的論爭，埋藏着許多修正主義論綱——在關於經濟學對象的第二回論爭（一九二七——一九三〇），由兩方的論者所提起的。——的種子。

首先從波格達諾夫的立場開始罷。波氏最初在政治經濟學教程，其次在一九二五年第一回論爭，最後在關於魯平對蘇聯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報告的討論，都堅執如下的意見：說卡爾在資本論裏面，研究一切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而卡爾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是可以推廣到一切社會構成去的。波氏在蘇聯科學研究所聲明過：「我經常地方圖展開卡爾的政治經濟學概念，能夠適用到其他各種歷史構成去。」（魯平著「卡爾體系的抽象勞動和價值」三八頁）「我把抽象勞動的範疇，解釋做不但可以適用於資本主義的。」（前書三九頁）「勞動價值亦同樣」。（前書三七頁）

『擴張』資本論諸範疇的波格達諾夫式的嘗試，是起因於誤解生產關係的。他忽略了一切社會的生產關係所具備特殊的獨有性質。他在技術上規定生產關係本身，說是『物的生產的諸條件』，（前書四十頁）說是技術關係。若依他的意見，不妨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特殊性，包攝於一個包含着一切構成的生產關係

的範疇裏面。同時波格達諾夫式研究的任務，在於闡明貫通着一切社會發展時代之普遍的、超歷史的法則，正因其如此，別說一切時代，實在連一個時代也理解不了。波格達諾夫把卡爾的經濟的諸範疇，簡單地混同了社會生產一切階段所固有的一般的規定。這時他忘記了卡爾的明白指示：「概括起來說，在一切生產階段上，根據思惟而當做一般的東西來設定的共通規定原是有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者，不外是不能把握實際的歷史生產階段之抽象契機罷了。」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八頁。）

對於某種現象的認識，以認識它的特殊性為前提。波格達諾夫的錯誤，就是起因於他忽略了社會經濟諸構成的特殊的合法則性，沒有辨別構成和構成間的特殊差異。這種錯誤的方法論基礎，在於不理解高級形態不可機械地還元於低級形態這點。將高級形態完全還元於低級形態，——這就是說不理解的範疇，正是機械論世界觀的一個特徵。

真正機械論者波格達諾夫，甚至對於政治經濟學上最抽象的諸範疇都具有質的規定性這點，也不能理解。抽象的諸範疇，雖說因為抽象的緣故，適合於所有的社會構成，但是在抽象性的規定這點來說，它自身還是歷史諸關係的產物，而且抽象的諸範疇，具有完全妥當性的地方，只是對於歷史諸關係，只是在歷史諸關係的內部才有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三十二頁）波格達諾夫拋棄這種規定，企圖把卡爾政治經濟學的範疇推及所有的時代。波氏自己在無意識中，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關係及法則，移植到其他所有的構成裏面。歸納起來說，波格達諾夫是以否定卡爾政治經濟學的法則的特殊性，設定共通於所有社會構成之單一的法則，而企圖一下子說明了這些構成的；他從這個要求出發，擴張資本主義的諸法則到其他所有的社會構成裏面去。由於想從布爾喬亞的諸形態裏面，找出其他構成的一切關係，至使波格達諾夫陷入了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抹殺一切歷史的差異，想在一切社會形態裏面，找出布爾喬亞的形態的經濟學者」（前

書三十三頁)——之可悲的命運。

抹殺歷史的差異和把卡爾政治經濟學諸範疇移植到所有的構成去，這是特別危險的；因為這種見解，對於否定蘇聯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否定社會主義化分野的諸企業之社會主義性質，成了理論的根據。波格達諾夫主義，會變成許多反革命的(把資本主義的諸範疇，機械地移入蘇聯的諸條件)集團之理論旗幟，不是偶然的。這些集團主張抹殺蘇聯經濟的特殊性，說蘇維埃企業，保存着普羅利塔利亞的剝削、剩餘價值的佔有等等，即是說依然保存着布爾喬亞社會諸關係。

爲要明瞭波達諾格夫怎樣歪曲卡爾學說起見，只消一看資本論的基本範疇就夠了。爲着容易了解，且拿商品經濟最一般的範疇——價值來看罷。若是沒有偏見的讀者，誰都知道，價值的存在，只是跟商品經濟，即商品交換的存在相關連着。很顯明的，倘若生產者當做商品生產者、當做生產手段的私有者而沒有互相關聯，倘若他們不生產商品，那麼價值和交換就會消失了啊。關於價值，卡爾

說：「在一切的社會狀態之下，勞動的生產物都是使用的對象物；但是，只有當做物的『對象的』性質，即當做物的價值去表示支出於生產使用物的勞動之歷史一定發展時代，才把這種勞動生產物轉化為商品的。」（資本論第一卷）在商品經濟裏面，生產者的勞動，直接上，是私的勞動；只有被隱蔽的形態、社會勞動，才能夠在市場上進行勞動生產物的交換，才能夠進行當做價值看的商品的交換。倘若生產者共有生產手段，生產者當做單一的集團成員而互相關聯，他們的工作依照預定的計劃去執行，這樣一來，他們也就用不着把勞動生產物當做價值來交換了。

隨着商品經濟的基礎滅亡，當做商品之轉化形態看的貨幣、為資本發展基礎的商品流通、資本自身、由資本所形成的剩餘價值、資本的競爭及利潤、利潤之分配於各資本等等，都一齊歸於消滅。——一句話說：隨着資本主義生產諸關係的死滅，表現資本主義生產諸關係的諸範疇也就同時歸於消滅。卡爾在資本論裏

面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及其發展、滅亡的法則，因而開始證實了政治經濟學上諸範疇的現實意義和過渡性質。

卡爾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祇是具有他在資本論中所研究的生產諸關係之表現的意義。卡爾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之一切發展，——像我們已經講過的，諸範疇的發展，不外是生產關係自身的現實發展之表現。——都在這點上打定了根

柢。如果沒有生產關係之理論表現這種關係，那麼，資本論的諸範疇，對於研究變化的經濟現實，也就不會發生效力呀，因為範疇沒有表現現實的緣故。比方研究共產主義的時候，好像資本利息的範疇；或者研究印度的民族制度的時候，好像工資的範疇；或者分析家長制農民家族的諸關係和它的純粹自然經濟的時候，好像商業利潤的範疇，有什麼用場呢？只要提這個問題，就可以使人充分確信：現代政治經濟學上的諸範疇帶着的特殊性質，只具有一種意義，就是當做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生產關係之表現。在卡爾的資本論裏面，——在那裏面，最

完全而又澈底地發展了這些範疇——討論問題，祇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祇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構成的發展、滅亡的法則的。關於這點，伊里奇曾明白的指示出：「卡爾處理社會——經濟構成的一種形態，亦即商品經濟的體系。——根據龐大的資料（他研究了二十五年以上），極綿密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構成的機能和發展的法則。這種分析，受着社會成員間的生產諸關係所限制，即是說卡爾說明問題，然而並不曾援用立於生產諸關係之外部的契機，而給與瞭解下列那些問題的可能性：社會經濟的商品組織怎樣發展？它一方面產生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兩個敵對（在生產關係的界限內）的階級，一方面怎樣轉化為資本主義組織？它怎樣提高社會勞動的生產性，而且由它自身怎樣招來了跟資本主義組織本身的基础難以調和的矛盾之要素等等？」（伊里奇著：何謂人民之友）

卡爾、恩格思始終強調他們所設定的諸法則之歷史的、過渡的性質。恩格思說：「祇適合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態的諸法則，祇有當着這生產方式和交

換形態佔支配地位的歷史時期，才有意義。」（反杜林論）布爾喬亞教授瓦格捏爾有一個可笑的命題說：「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來講，在卡爾的社會國家里面，也發展了的卡爾的價值法則，因而價值理論是有效力的。」（資本論第一卷附錄）卡爾嘲之爲愚劣。

所以對於波格達諾夫之復活的嘗試，即企圖把資本主義的範疇和法則推及其他社會構成，或企圖把不同的社會構成之特殊合法則性，還元做各種經濟構成之一般的、超歷史的發展法則的一切嘗試，不能不執行斷然的鬥爭。可是一九二五年，對於波格達諾夫的修正主義所執行的鬥爭，却是十足非卡爾主義的。以布哈林爲中心來對抗波格達諾夫的一羣經濟學者，並沒有批判到波格達諾夫企圖像恩格斯所謂「誰想把火地島的經濟和現代英吉利的經濟，統一於同一的法則之下那樣，除了說些極尋常的話以外，甚麼也不能說明」。——反而是拿他主張要認識非資本主義的社會構成，必須有「理論政治經濟學」這一點來批判。同志布哈

林否認卡爾主義的基本論綱：「政治經濟學，對一切國家，對一切歷史時代，不能用同一的法則。」（反杜林論）而堅持修正主義的見解，說政治經濟學不能解釋商品。資本主義社會構成以外的一切構成。他們對抗波格達諾夫，而否認政治經濟學「是首先研究生產和分配的各種發展階段之特殊諸法則的；這個研究結束了，才能完全成立普遍地適合於少數的生產和交換之一般諸法則。」（反杜林論）

他們自始就否定了在非資本主義的諸構成裏面，也有適合於理論研究的一切經濟法則。同志布哈林及其一派，追隨費爾希丁，主張生產關係（非資本主義的——譯者）並不當做物的社會關係和人的物質關係而出現，乃是當做生產者之直接的社會關係而出現；經濟的研究不過是經濟史的研究罷了，再沒有理論政治經濟學的餘地。」（費爾希丁著卡爾的理論經濟學的問題之提起，著作集經濟學的根本問題，一一二頁。）

上述布哈林見解的根據，潛伏着一種錯誤的表象，是跟他對於生產關係的機

械論理解——比如認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則跟其他諸構成的法則所不同的地方，只是『物質外衣』——有緊密的聯系。這種錯誤的表象，在同志布哈林的定式化『勞動支出的法則』中，最鮮明地表現出來。超歷史的說明經濟過程內容的同志布哈林，他辨別『有統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之間的差異，祇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勞動支出的法則』披着價值這一拜物教的外衣而出現，反之，社會主義經濟，則剝脫了拜物教的『裝束』，勞動支出，直接當做『經濟的統制者』而出現。實際上，布哈林認為成立資本主義的法則之全副任務，不外是在排除生產關係之對象假象，政治經濟學之所以必要，也就在於這一點。其實卡爾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在於暴露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運動法則，闡明運動法則的特殊性質，指出運動法的關係『爲什麼』『怎麼樣』表現在那物質範疇裏面的。

勞動的社會性質之對象假象，並非錯覺。只有覺得這假象好像不是一定秩序的生產關係之結果，而覺得是勞動生產物本來具備的自然屬性，這才是錯覺。政

治經濟學雖然打破了錯覺，可是勞動的社會性質之對象假象，依然存在。政治經濟學除去了商品——拜物教的主觀方面，却沒有除去拜物教的客觀基礎，祇說明拜物教的客觀基礎罷了。卡爾說：「勞動生產物，只要以價值爲限，那就不過是人類用於生產的勞動之單純的物質表現罷了，這個見解，是近世科學的發現，是人類發達史上劃一新時代的，但，決不是除去勞動的社會性質之對象假象的。」

（資本論第一卷）在商品經濟中，『物』（勞動生產物）的特殊作用，是不容否認的。但，物的特殊作用，決不就是指：單在物發生着特殊作用的社會，政治經濟學才有可能；決不就是指：問題的本質在於這種作用，而不在於這種作用所由生產的生產關係之特殊性質。由於主張只有在勞動生產物發生着社會作用的社會，政治經濟學才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志布哈林又犯了一個錯誤，他認爲勞動生產物，在其他的社會構成裏面，不發生什麼作用，也沒有獲得什麼社會形態。在轉形期經濟學裏面他寫道：「隨着生產過程的不合理性消滅，亦即隨着意識的社會

的統制者代替自然長成而出現，商品轉化為生產物，喪失了它的商品性質。」伊里奇加以評註說：「不精確。不是轉化為『生產物』，是轉化為某種別的東西；是轉化為經過市場而進入社會消費的生產物。」（伊里奇遺稿集第十一卷三三八頁）這種場合，伊里奇明白地指示出：勞動生產物，在資本主義構成以外的構成，也並沒有喪失它的社會形態。

在最近發表的卡爾對瓦格涅爾的著作之批評裏面，我們看到他對於不同的社會構成的勞動生產物的特殊性之率直的指示，卡爾說過：「我所着重的地方，就是使用價值——勞動生產物——在商品顯現的特殊形態；即『物要成為商品，必須是有用物，而且是人類勞動的生產物。靠着自己的生產物來滿足自己欲望的人，只是創造使用價值，而不創造商品。爲着生產品起見，他就不但要生產使用價值，同時還要生產爲他人的使用價值——即社會的使用價值。』（資本論第一卷）這樣，使用價值——作爲商品的使用價值——它本身帶有歷史的特殊的性

質」。卡爾又繼續指示出生產物和使用價值，在其他的社會構成裏面，也同樣帶有獨特的社會性質：「比方在共同生產和共同分配生活資料的原始協同體，共同生產物，充作協同體各成員和各生產者的直接生活上的必需之用。生產物——即使用價值——的社會性質，包含在協同體的性質裏面。」（卡恩文庫第五卷）這樣完全明白了：勞動生產物，對於社會既不是無差別的东西，也不是死的自然之無關聯部分。勞動通過了生產物——生產物的運動，形成社會交換。——才能實現為社會的性質。各個人的勞動（不能混同私的勞動，個人勞動不是和社會勞動對立的），靠着生產物而不斷地進入相互的完成、加工、補充的過程，只有這樣才顯現為社會勞動。完成的過程——是某人着手做過的生產物，由別人完成之。加工的過程——是因為某種勞動種類的一面，由其他勞動種類的一面補充之。補充的過程——是因為各個人為要能夠繼續自己的勞動起見，必須不斷地取得他人是勞動生產物。這種相互完成、加工、補充的方法，不是隨隨便便的，而是依存

於社會秩序的。因而勞動生產物的作用和社會運動法則、勞動生產物的社會形態，都依存於這個方法。所以勞動的社會性質，不能夠分離開生產物的運動過程；生產物的社會形態，不能分離開勞動的社會性質。在生產過程中，勞動直接是私的勞動，祇在間接顯現為社會勞動的商品經濟中，物的社會交換過程，祇能基於商品交換，祇能當做商品的價值實現之自然發生的過程。這樣，由於物獲得社會形式，人們之間的關係採取對象性質，勞動生產物才進入社會消費。在社會主義社會，就不是這樣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面，依照人民經濟計劃，正確地考慮其特有的發展法則，生產物的運動，不消通過市場就能夠計劃的合理的進行。這種考慮，在社會主義社會是可能的、是必然的。因為在那裏，勞動直接地社會化了，在其所有的具體性上，都是社會勞動。於是商品轉化為生產物，經過市場而計劃的進入社會消費，這是因為生產關係排除了價值形態的緣故。布哈林不理解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靠着生產關係的運動做媒介。他不理解這點，

是跟他混同了非交換社會的社會分業和技術分業、以及否定了非交換社會的勞動生產物之社會形態有着密切關係的。這些一切錯誤的結果，就是布哈林把政治經濟學僅僅局限於商品 \parallel 資本主義構成的範圍。這種見解，在他決不是偶然的，好像一根紅絲一樣貫通着他一切理論的（不止理論的）諸勞作。

在有階級的經濟學裏面，他早已主張「當做科學看的政治經濟學，只能以商品社會（即商品 \parallel 資本主義社會）為對象。在實際上，處理某種經濟組織，比方洛德貝妥斯的家庭經濟、原始共產體、封建的莊園、社會經濟組織的其他形態、以及社會主義經濟等等，在那裏我們找不到一個理論政治經濟學可以解決的問題。因為那些問題是關於資本主義形態的商品經濟的。是價值、價格、資本、恐慌等等的問題。」（布哈林著：有階級的經濟學四八頁）不消說近代政治經濟學所處理的價值、價格、恐慌等等問題，是商品 \parallel 資本主義的構成以外的社會經濟構成所沒有的，因為價值、價格、恐慌等，是跟資本主義構成的生產關係不

可分地關聯着的。但決不就是說其他的社會——經濟構成就沒有適合於理論研究的問題，更不是像布哈林所說那末樣：「在社會主義秩序，經濟學失掉了牠的意義，不過是簡單的經濟地理學、個別記載科學、經濟政策的規範科學罷了。」本來在社會主義社會，人們之間的關係，變成簡單、明瞭，集團的意識活動的合法性代替自成生活的合法性而出的；但是像布哈林得出上面的那種結論，是不能援用這個理論做基礎的。

社會主義集團之所以是意識地合法則地活動的緣故，就是因為社會秩序要求人們認識自己整個活動的法則、由生產者自身計劃地實行這種法則；同時社會秩序能使人們獲得在實踐上實現這種法則的可能性。新經濟政策的新階段之經驗，已證實了隨着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長成，對於理論的要求，日益迫切。

同志布哈林的結論，只有下述這種情形是正確的：即是倘若商品——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消滅，一切特殊的社會生產關係也隨之而消滅，『生產之技術的骨骸』

(魯平語)，『以赤裸裸的姿態』(布哈林語)站在我們眼前的時候(註一)。

還有在下述的情形，布哈林的結論也許是正確的：即是倘若社會主義社會，在特殊的、祇是這個社會固有的形態，生產關係不是媒介着生產力的運動的時候(註二)。然而實際上，即使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還是當做生產力的發展形態而出現的。社會的發展，還是通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辯證法的關聯而實現

(註一)通常一切經濟學教程所敘述的，對於技術分業和社會分業的誤解，特別關聯着布哈林那種理論。通常人們觀察技術分業和社會分業的差異，都根據下面幾點理由：說前者帶有組織的性質，依照預定的計劃而實現；後者帶着自然長成的性質，通過市場的關聯形式而實現。倘若依照這種解釋，那麼古代印度的共產體和社會主義社會，就不能叫做社會分業了。如周知的，卡爾認為：「商品生產不是社會分業的存在條件，它(社會分業——引用者註)，才是商品生產的存在條件。在古代印度的共同體，生產物不成爲商品，而勞動却被社會分割了。」

的。不過在那裏兩者的相互關係不帶着敵對的性質，矛盾却依然存留着。假如沒有矛盾，也就不會有發展。我們不能跟布哈林一樣，把敵對和矛盾混爲一談。

伊里奇說：「敵對和矛盾決不是同一的。在社會主義之下，前者消滅，但後者留存。」（伊里奇遺稿集十一卷三四九頁）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與人的生產關係，因爲是依照固有的特殊的方法媒介着生產力之發展的，所以必須有相應着生產關係

（註二）蘇倫傑夫教授發表了意見，說在沒有自然交換關係的地方，一般地社會關係也不存在。「倘

若社會良好地組織其生活和關係，社會上每一種生活活動，都能夠是依照以何種形式來表現的社會意志預定和命令的產物；倘若一切人的關係，都失掉了自然性、必然性（?）、不合理性，反而依照由社會自身所嚴密地預定的計劃進行；這樣一來就沒有社會制約性存在的餘地了，一切人的關係，就會失掉了這裏所說的社會性——我們想闡明它的性質——啊。」（蘇倫

傑夫著經濟學入門六一頁）假如社會主義是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的王國之飛躍，那就不能像

蘇倫傑夫那樣把自由誤作康德的目的論的王國。自由不外是認識了的必然而已。

的理論研究。

因此當布哈林在轉形期經濟學里面，寫着：「理論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基於商品生產的社會經濟之科學，即是研究無組織的社會經濟之科學。」時，伊里奇加以評註道：「有兩個錯誤：一是從恩格思後退了一步的定義；二商品生產，也同樣是『有組織的』經濟。」當布哈林寫着：「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商品經濟」時，伊里奇又加以評註道：「不單是那樣。」對於布哈林主張：「以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經濟消滅，同時也是政治經濟學的終結。」伊里奇再加以評註道：「不對。甚至在純粹的×產主義社會，也有 $IV + M$ 對 $II C$ 的關係（？）和蓄積（？）也有政治經濟學。」（伊里奇遺稿集第十一卷二五七頁）這種場合，伊里奇是反駁把政治經濟學單單局限於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註），但是如果有人要把伊里奇這個指示，跟他所講卡爾在資本論單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構成的主張相對立起來，那就是意外的錯誤。

伊里奇之所以根據恩格斯，是有着深長的理由的。伊里奇不但採納反杜林論裏面的政治經濟學定義——「在最廣汎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支配着人類社會物質生活質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諸法則之科學。」（反杜林論）——而且透澈了解恩格斯爲什麼說明「政治經濟學對於一切國度，一切時代，不能是同一的」，更透澈了解恩格斯當做『狹義的』政治經濟學來特徵着當時存在的政治經濟學。恩格斯指出的特徵是什麼呢？他說：「我們講到政治經濟學，現有的，差不多專限於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發生及發展。即是政治經濟學以批判封建

（註）許多同志們也犯了跟同志布哈林一樣的錯誤。例如，波里林說：「我們的生產關係達到了十分完成的體系，或者我國的生產關係完全停止了自然長成的，離開人們的意志而長成和再生產的社會關係，如果我們站在上面那種觀點看來，那麼，到這時候，實際上，專門的理論科學也許沒有必要了罷。」（對於經濟學上的機械論的傾向）因此若依波里林的意見，就是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再用不着理論科學了。

的生產諸形態、交換諸形態的遺物開始，證明應該由資本主義的形態來代替它們的必然性；然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着它的交換諸形態的諸法則之肯定方面，亦即循着方向從這些法則助長一般的社會目的這方面展開；而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社會主義批判，亦即資本主義的法則之否定方面的敘述，換句話說，即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着它自身的發展，而把自己向着不可能的地點推進爲終結。」（反杜林論）不消說，在這里恩格思也是顧到卡爾政治經濟學和在資本論的敘述的。所以恩格思對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冊的批評，雖然說過「政治經濟學是近代布爾喬亞社會之理論的分析」，還不至自己打嘴巴。在這種情形，恩格思也像伊里奇規定資本論的內容一樣，提到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我們研究資本論，是研究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換句話說，即是研究已經不適合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的政治經濟學。

半世紀以前的恩格思的說明，到現在還依然正確的：「當做研究人類諸社會

生產物之生產交換的條件和形態以及適應它的生產物的分配方法之科學看的政治經濟學，這是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今後必須創造出來。」（反杜林論）

照這事看來，那麼我們研究資本論，對於理解其他的社會構成，豈不是沒有一點幫助了嗎？

這種想法是大大的錯誤。卡爾指示着：研究布爾喬亞諸關係，要充分明瞭過去的社會經濟構成之發展。他說：「布爾喬亞社會是生產最發展的、最多樣的歷史組織體。表現這一歷史組織諸關係的諸範疇，對於這一歷史組織體編制的理解，同時可以察知那些向着布爾喬亞社會發展而已經沒落了的一切社會形態的編制和生產關係。布爾喬亞社會，是建築在那些過去的社會諸形態的廢墟和要素之上的，而那些過去社會諸形態的一部分，當做未經克服的遺物，殘留在布爾喬亞社會里面，另一部分，在簡單的萌芽形態，就完全發展了。人體的解剖，是猿類解剖的關鍵。只有洞悉了高等動物軀體時，才能理解下等動物體也含有進化到高

等動物的萌芽。」（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郭譯三十二頁——三十三頁）卡爾好像是預防波格達諾夫式的推廣布爾喬亞社會的諸範疇一樣，他說：「研究布爾喬亞社會生產關係的政治經濟學，是提供研究前代的政治經濟學之關鍵的；但絕對不是抹煞一切歷史差異的，在一切社會形態里面去找尋布爾喬亞社會形態的那種經濟學者的做法。如果我們理解了地租，就可以理解貢賦和十分抽一稅等等。但我們絕對不可把兩者混為一談。……所以研究布爾喬亞社會生產關係的政治經濟學諸範疇，雖說對於其他社會諸形態，確是具有一種真實性，不過還得打了折扣去理解。布爾喬亞社會，使到一切其他的社會諸形態或發展、或萎縮、或漫畫化，而包含在自身里面。但始終是有着本質的差異的。」（郭譯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三十三頁。）

因此，卡爾的諸勞作，使得我們能夠理解死滅了的社會生產形態的構造，使得我們能夠接近死滅了的社會生產形態的分析。爲了比較研究不同的社會的發展

形態之要點，在資本論中，達到了向來一切的政治經濟學所不能企及的程度。在資本論中，才算是打定了要將政治經濟學從狹義的政治經濟學轉化為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廣義政治經濟學的需要，在我們日益迫切。——之基礎。恩格斯規定並說明前述的資本論的特徵，他說：「爲要完滿地執行對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單靠生產、交換、分配等資本主義形態的知識，那是不夠的。還得研究和比較資本主義形態以前的，或跟資本主義形態並存於未發展各國的諸形態，至少還得研究其粗枝大葉。因此到現在爲止，說明前資本主義理論政治經濟學之根本原理的工作，差不多全部是卡爾的研究所負起的。」（反杜林論）

還有，不能不指摘的問題的又一面，就是如像在資本主義社會過去諸構成的遺物保存着餘命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也長期間保存着資本主義秩序的痕跡。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間，充滿着正在長成的社會主義諸關係跟資本主義諸要素以及滋養它們的地盤的鬥爭。伊里奇分析蘇聯的經濟，說有五種構成，

這種分析，充分地指示出這五種構成諸要素的關係，和這五種構成的相互關係。爲要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的合則性、克服資本主義的遺物、改造小商品農民經濟、促進社會主義的發生和發展起見，不用說，研究卡爾政治經濟學理論是必要的。基於這種研究，而領會了卡爾伊里奇的方法的人，就不能懷疑蘇聯發展全過程所依據的固有的法則，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全過程是不同的，就不能懷疑蘇聯轉形期經濟包含着矛盾同時又是一個統一物。如果懷疑蘇聯經濟發展過程的統一性，懷疑蘇聯經濟向着社會主義之唯一的運動法則之支配，那他就是背叛了伊里奇主義的人。這些人們，一方面是托洛斯基主義者，把社會主義化的部分和農民經濟的基本大眾，當做蘇聯經濟的獨立的兩個分野，當做完全依據互相排斥的法則的兩個分野，而使牠們對立起來。他方面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布哈林的信徒，他們不理解蘇聯經濟的矛盾，否定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理論研究之可能性，否定支配蘇聯經濟諸法則的科學成立之可能性。這種觀點，是從布哈林主

張：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不能超出自成的市場關係之研究範圍而來的。由這種觀點推廣下去，就會得出靠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能理論的把握當做總體看的蘇聯經濟之主張，就會透導到以零碎的、部分的、割裂的、點滴的方法去研究蘇聯經濟之結果，換句話說，就是誘導到折衷主義去。同志李昂契葉夫和傅美里尼可夫合著的轉形期經濟學大綱，便是一個例證。

他們主張：「爲着是轉形期經濟學的緣故，不能創設特殊的理論體系。因爲轉形期經濟學跟卡爾主義的理論經濟學的方法論太相矛盾了。」（李昂契葉夫傅美里尼可夫合著：轉形期經濟學大綱八〇頁）他們之所以否定蘇維埃經濟理論的建設之可能性，乃是因爲關於政治經濟學上的卡爾的方法，他們抱了極端獨特的表象的緣故。這種表象，是怎樣背叛卡爾主義的，只要舉出兩三個例子來看，就可以立刻分明了。

例如：同志李昂契葉夫固執着下面的論綱：「無論是資本主義以後的社會經

濟構成的靜力學或動力學，都不包含理論政治經濟學性質的諸問題。」（前書二七頁）像同志李昂契葉夫這樣反對社會主義社會需要理論政治經濟學，是跟他的『經濟法則』的把握有着緊密關聯的。他把『經濟法則』解釋做『支配社會的、社會之獨立的、歷史發展的產物。』可是社會主義社會，沒有了盲目作用的社會力量。因此據同志李昂契葉夫的意見，既然那里沒有經濟法則，當然就沒有研究那些法則的政治經濟學的餘地了。

從這里，在理論上產生出實際否定了蘇維埃經濟理論的可能性。因為如果理論科學被限定於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框子里面，被限定於自成的市場關係的框子里面，那麼，祇要轉形期經濟不能夠納進那框子，也就用不着什麼理論科學了。

李昂契葉夫在形式上雖然沒有反對蘇聯經濟是各種經濟構成的統一體，但是却認為必須由兩種科學——（一）記述的（研究社會主義化的分野），（二）理

論的（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的分野。）——去研究這統一的經濟。這種『結合起來的』科學，就是李昂契葉夫所謂『卡爾主義的理論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很明顯的，反對商品＝資本主義的關係之外還有經濟法則存在的人，因而又反對『理論政治經濟學』之必要性的人，當然會反對創造轉形期經濟學的理论，當然會反對認識爲蘇聯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的根柢的諸法則（註）。

李昂契葉夫和傅美里尼可夫說：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轉形期經濟，沒有經濟法則。這個主張是怎樣的錯誤呢？如果一看卡爾主義的創導者們說到這個問題的話，就可以一目瞭然了。諸君知道卡爾恩格思曾經再三說明：資本主義社會，

（註）同志米留定及波里林的論文說：「從布哈林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理解出發，在理論上會不理解蘇維埃經濟理論的必要，——強辯只有在自然長成的、『無組織的』市場關係存在於蘇聯經濟這種限度內，才有必要。——會不理解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理論研究之必要。（布爾

經濟的法則是離開了人的統制而作用的自然力吧！但是諸君沒有看過卡爾恩格思主張一切的經濟法則，一定是盲目地作用的法則吧！不但這樣，而且恩格思在反杜林論里面，還給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法則作用加以特徵，他說：「人們自身的社會活動的諸法則，向來是當做外來的、支配人們的自然法則，跟人們相對立着的，但到了現在（指社會主義社會——譯者。）這些法則，都由人們以充分的專門知識去利用它，因而又支配它。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向來是當做由自然及歷史來強制人們的東西，跟人們相對立着的，但到了現在（指社會主義社會——譯者。）却變成人們自身的自由行爲。向來支配歷史的客觀的外來的諸力，都服從於人們自身的統制之下了。從這時候開始，人類以充分的意識去創造自家的歷史了。」（反杜林論）

由上面的引用看來，顯然恩格思的分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社會有經濟法則，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經濟法則這點。他是依着經濟法則作用

的性質去決定這種分別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些法則是支配人們的；反之，在社會主義社會，這些法則却被認識了，而服從於「人們自身的統制之下」。

第三章 生產諸關係

一 生產諸關係的物質性

照前章講過，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一定的社會——經濟構成的生產諸關係之科學。生產諸關係原來是什麼呢？爲了答復這個質問，我們借用卡爾的答案罷。他說：「人們在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結合着一定的、必然的、離開人們的意志而獨立的諸關係，亦即結合着照應物質生產諸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諸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的經濟構造，換句話說，即是形成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築聳立於其上，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相應着它的現實基礎。」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一般。不是

人們的意識決定自己的存在，相反的，却是人們的社會存在規定自己的意識。」（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三頁）卡爾區別開那不依存於人們意志的物質社會關係和『意識的』關係（註）。

卡爾從社會生活之多樣的諸關係中，抽出了「生產諸關係當做根本的、本源的、決定其他一切的關係」。於是卡爾說明了人們的客觀關聯性、人們的社會生活的客觀合則性。當伊里奇和民粹派主觀主義作鬥爭時，很光輝的特徵了和發展了卡爾主義的根本論綱。『主觀主義的社會學者』托出了觀念、『批判地思考的個人』、人類的意識行動等等；爲了對抗這種理論，伊里奇主張社會的發展是根據客觀的合法則性——通過人們的觀念意圖如何和人們的活動，打開道路前進——

（註）伊里奇說：「卡爾恩格思的根本觀念，在於將社會關係分爲物質關係和意識關係。後者祇是建立於前者之上的上層建築；前者跟人類的意志和意識無關係，人類是爲着維持生存的活動

形式之結果。」（伊里奇著：何謂人民之友）

的。在卡爾以前，「社會學者，還未能進到如像生產諸關係那樣最簡單的、本源的諸關係之先，就立刻着手政治的、法律的諸形態之研究，一碰到這些諸形態在某時期從人類的某種觀念發生出來的事實，他們就在那里停頓了。於是彷彿社會諸關係是由人類有意識地造成的一樣。」（伊里奇著：何謂人民之友）

這種立場，是閉塞了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的。因為它失掉了將社會的諸現象分爲本質現象和非本質現象的客觀標幟，以至開闢了一條讓各種主觀主義走進科學裏去的道路。卡爾從社會現象之錯綜的網中，抽出了物質的、離人類意志而獨立的諸關係，決定其他一切諸關係的諸關係。「分析物質社會關係，就可以馬上認識反復性和規律性，就可以馬上得到各種國家秩序普遍地化爲『社會構成』這一個基本概念。只有這種普遍化，才能給與從社會現象的記述（及從理想的觀點評價社會諸現象）轉移到社會現象的嚴正的科學分析——例如甲資本主義國家和乙資本主義國家有什麼分別，而且研究共通於這兩國家的『某種東西』。——之

可能性。」（伊里奇著：何謂人民之友）

簡單的說，卡爾把生產諸關係，解釋做在人類社會生活的生產過程中，不依存於人類的意志、意識而獨立地形成的諸關係；也就是卡爾伊里奇所再三強調的物質關係。對於生產關係的『物質性』和『社會性』的誤解，是機械論修正主義者和觀念論修正主義者的特徵。實際上，兩者都把物質的混同了自然的、物體的，把社會的混同了觀念的、精神的。機械論者，一方面從生產關係是物質的社會關係這個正確的論綱出發，一方面又想從生產關係是物理的這點上去找尋生產關係的物質性。布哈林說：「我把生產關係解釋做在時間空間的人（布哈林稱爲活的機械）的勞動配列。」這種『唯物論的』理解，原是布哈林想預防自家墮入觀念論的。同樣，觀念論者也一方面從生產關係是『社會的』現象這個正確的論綱出發，一方面却否定了生產關係的物質性。阿德拉說：「這個法則（社會存在之由生產諸關係來決定——著者），甚至對於社會史上最發展的精神諸現象也能

適合的緣故，並非因為像許多人所誤解那樣，在經濟關係上，與一切精神現象無關係的物質要因不影響到社會；而是因為經濟關係自身，已經是精神的某種東西，總之，只有當做精神生活的諸現象才能理解。經濟關係就是人的關係，就是社會類之本原的、基礎的關係。」（阿德拉著當做思想家看的卡爾）在這裏，存着阿德拉式歷史哲學的真髓與智囊，這是十足的觀念論。

總之，機械論者和觀念論者的特徵，就是將『社會的』和『物質的』絕對的對立起來。他們的判斷的公式：如果不是『社會的』便是『物質的』，再沒有第三者存在。比方：當做進行自己增殖的價值看的資本的運動，『以自然法則的四大力而作用』，愛諾太葉夫斯基引用着卡爾的這個論綱，發出如下的質問：「假定資本價值，不但是沒有社會的力，同時又沒有物質的力，那麼，為什麼能夠有這個法則呢？」（愛諾太葉夫斯基著理論經濟學的論爭問題，社會經濟第一

冊——第二冊。）我們請問：為什麼社會的力不能夠是它自體物質的力呢？澈底

追究這個『同時又』，原來是什麼呢？一種力的社會性質，是排除它的物質性質的嗎？祇有極俗流的解釋『物質性』、純自然主義的說明『物質性』的愛諾太葉 夫斯基，才會將一切物質的社會現象還元於物理的自然的現象。例如：他把抽象勞動還元於人類的『能』的生理支出。依他看來，抽象勞動的物質性，排除抽象勞動的社會規定。對於這種『自然主義』而言，魯平則處於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學派』直接影響之下，主張「形成價值的抽象勞動，應該解釋做一個社會範疇——我們在那裏面找不到一個物質的原子——。」（魯平著卡爾價值論綱要第三版一四九——一五〇頁）抽象勞動的社會性質，依魯平看來，是排除抽象勞動的物質性的。

『社會的』和『物質的』絕對對立，這種的根底，是建立在俗流的『物質觀』上面的。

「物質的唯一『屬性』——哲學上的唯物論，關聯着物質屬性的認識。——

是客觀的實在性質，是離開我們的意識而獨立存在的性質。」（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生產諸關係的物質性，就是指這些關係不須通過生產者的意識而形成這一點；而不是指生產諸關係是當做在『時間空間』的活的機械看的人類之物理關係這一點。生產諸關係的物質性，不是排除生產諸關係的社會性，這正好像生產諸關係的社會性不是排除它的物質性一樣。生產諸關係的『社會性』，完全不是指：生產諸關係是『精神的』、意識地設定的關係這一回事。生產諸關係之所以是『社會的』，乃是因為它是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人類的關係；生產諸關係之所以是物質的，乃是因為它是離開人類的意志而獨立地形成的，決定一切社會的發展的，同時是客觀存在着的。在社會上，生產諸關係是階級間的關係。因此卡爾伊里奇把社會發展的必然性和合法則性，當做社會諸階級的行動之必然性來考察。辯證法唯物論者跟客觀論者、俗流唯物論者的不同，「不祇是證明過程的必然性，而且闡明什麼社會經濟構成給與過程以內容？什麼階級決定這個必然性？」

（伊里奇著：民粹派之經濟的內容）辯證法唯物論者把『社會的』當做『階級的』來處理。如果不理解這一點，研究生產關係就會得着不合理的表象。這種表象，或者在生產關係和技術關係的混同中出現，或者在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交換關係和法律關係的等同看待中出現。

二 生產關係和技術關係

生產關係和技術關係的混同，對生產關係特殊性的不理解，都是同志布哈林的特徵。由於將生產關係跟當做活的機械看的人們在空間的配合同等看待；所以布哈林不能區別開：從生產過程的技術組織發生出來的關係、和社會的生產關係。「拿近代企業的形態來看罷：……它是大規模的工場，它是一個大組織，在那構成裏面包含着幾千人，迫使他們依照一定的秩序，配置在一定的場所，嚴格地執行特定種類的勞動。……一切都像時錶一樣精確地進行。這就是分業，這就

是依照合理化主義的勞動的『科學組織』。這種工場，若就人的組織、即人們相互間的關係看來，也確是一個生產關係。」（布哈林著：史的唯物論）布哈林的說法，顯然是混同了生產關係和技術關係。近代（資本主義）工場，說它是生產關係之一，那是對的。因為它不是爲了工場要求幾千人的、統制的協同作業的，而是這協同作業是基於資本家購買集合的勞動力，在『資本的命令』之下進行，以生產剩餘價值爲目的，以勞動者喪失生產手段、生產手段集中於資本家爲基礎的緣故。生產過程中人與物的一定配列、和兩者之自然的、物理的交互作用，這兩點上成立的技術生產過程，雖說處於上述的生產諸關係的影響之下，但是却不可混同了生產關係和技術關係。這種錯誤的混同，在同志畢索諾夫的聲明裏面，格外明白地表現着。例如：，他不在生產諸關係的性質上來看、而在技術的特徵上來看一個社會構成的特殊性。他說：「精確地指摘怎樣的技術特徵格外表徵着資本主義三個階段的各階段，這是伊理奇不以爲恥的。」而在結論上並且這樣附

言：「我們要聯系着不同的技術發達程度去觀察資本主義的各個階段。」（畢索諾夫著：魯平主義乎？卡爾主義乎？）不錯，資本主義的各階段，是關聯着技術的各種發達程度。但須知伊里奇決不是主張資本主義本身的各個階段之特徵、或是資本主義的特徵，存在於技術的特徵裏面。我們在下面試舉出兩三個例子，就可以充分證明了。

比方：拿資本的範疇做例子吧。這個範疇表現出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關係。雖然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發展，關聯着生產力——包括技術在內——的一定發達水準；但是從技術的水準出發而規定資本，那就是毫不理解卡爾主義的。不錯，機械技術，是資本主義的特徵，但是可不能說沒有機械的地方，也就沒有資本。試拿富農做例子來說吧：誰都知道，富農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的；然而不利用機械技術的富農，不是也有嗎？如果從技術關係直接引出生產關係，那就不能區別各種社會經濟構成了。不消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是以技術的一定發達水

準爲前提的，但是不能就此定下結論說：資本主義的特徵，在於技術的一定發達水準。

再舉出周知的伊里奇的表現來看吧：伊里奇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我們是否就可以從這裏下結論說：凡有電氣化的地方，就形成了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呢？比方現在美國，電氣化發達到極高度了，只要樹立蘇維埃政權，就容易建設社會主義諸關係。但是拿美國電氣化爲理由，而企圖否定它的資本主義性質，像這樣的傻子，恐怕不會有吧！如果技術是特徵着社會組織的標幟，那麼，就得說：「美國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了」。

當時民粹派認爲沒有機械技術的地方，也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諸關係。伊里奇駁斥他們，作了如下的指摘，說如果站在機械技術的利用上去觀察資本主義的特徵，那麼，在『人民的組織』裏面，便不能看出資本主義呀！好像九十年代，支配農村的『人民的（小布爾喬亞的）組織』裏面，確已有了資本主義諸關

係，但是還沒有機械。伊里奇說：「資本主義對於『人民的組織』，不是相矛盾的，而是最緊密的直接的繼續和發展。」（何謂人民之友三九〇頁）「有一種流行的判斷，說當時俄國沒有資本主義……這是全無意義的。」（前書三八一頁）這種判斷之所以被採用的緣故，「是因為沒有把經濟組織的現實形態，加以精確的決定的特徵之任何嘗試；……是因為特別地抽出生產關係，而又不加以獨立的分析。」（前書三八八頁）「基於俄國國民經濟的技術落後、和手工業生產佔着優勢等，而把俄羅斯的秩序跟資本主義的秩序對立起來，這是傻透了的事。因為資本主義無論在技術高的地方或技術低的地方，都同樣存在着。」（伊里奇全集第二卷、論經濟的羅曼主義的特徵）總之，民粹派是爲了要在機械生產裏面找出資本主義的特徵標幟，所以便不能在小經濟裏面看出資本主義了。這樣，他們就達到了在俄羅斯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結論。

畢索諾夫的錯誤，跟民粹派的錯誤相類似，在許多問題上，使他背叛了卡爾

主義。他說生產關係的特徵，是可以在技術的關係裏面找出來的，生產關係可以直接還元於技術的；像這樣說法的畢索諾夫，我們怎麼也不敢同意啊。關於能否在技術及技術關係裏面探求某社會形態的特徵這一個問題，蒲列汗諾夫決定的說明着；他率直地指出從技術水準『抽出』社會組織，這是很大的錯誤。他說：「在近代機械工場的勞動組織，受着技術的現狀所決定；技術是特徵生產力的狀態的，決不是特徵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秩序的。這個經濟秩序，主要的由它固有的財產關係所特徵的，換句話說，即是機械工場不是屬於在那裏結合的勞動者，而是屬於榨取勞動者的資本家；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秩序，祇是由這點來特徵的。」（蒲列汗諾夫著作集第十一卷、駁斯托爾惠）因此，如果想說明在工場內的技術分業，或者想決定生產力的水準，就不能不講到技術發展的分析；但必須決定社會構成的特徵時，就得着眼到生產關係。

不理解生產關係和技術關係的質量差異，以及將生產關係直接還元於技術，

這是會誘導到混同資本主義企業的技術生產組織的諸過程和社會生產組織的。從這裏會發生出一種錯覺，誤認技術的生產過程的『組織性』之成長，就是指『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之發展；也會把資本主義的發展，當做生產關係的『擺脫拜物教』的過程，當做不合理的經濟組織向着在資本主義框子內的『合理的組織』之轉化來描寫。根據這種見解，同志布哈林展開了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之理論，即是跟卡爾主義沒有一點共通的、而且跟他自己的帝國主義觀——伊里奇會經批判過的——有着密切關係的理論。當布哈林在轉形期經濟學裏面寫着：「金融資本，清算了大資本主義國內的生產之無政府狀態」時，伊里奇在空白上評註道：『沒有清算。』（伊里奇遺稿集第十一卷三五〇頁）技術關係和生產關係的混同，招至對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的無政府性之過低評價，和招至本質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謊謬理論、『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

三 生產關係、交換關係、法律關係

許多經濟學者都受了經濟學上『社會學派』的影響，把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又把交換關係和法律關係混爲一談。在這裏，首先得明示魯平理解生產關係的特徵。魯平和畢索諾夫剛相反，他是極力主張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諸關係的科學。

波里林、李昂契葉夫等，不能認清魯平理解生產關係的觀念論的特質，而支持了他的意見（註）。

（註）米留定及波里林的論文，對這些同志的立場給以下述的特徵說：「一羣同志們（波里林、李

昂契葉夫等），保持着正確的觀點，揭穿了機械論的錯誤，他們的功績是可嘉的。但是這些

同志們不理解魯平的諸勞作之反卡爾的、反丹證法的、革命的性質，而對魯平的勞作給與根本錯誤的肯定的評價。」（參看反駁機械論傾向論集九、十、五七、一二九各頁）而且爲

魯平像口頭禪一樣強調了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諸關係的。但是他對於生產諸關係的理解，不但跟卡爾伊里奇的理解不一致，而且在根本上跟卡爾伊里奇的學說背道而馳。卡爾伊里奇唯物論地理解生產諸關係，反之，魯平却觀念論地理解生產諸關係。在這個問題上，魯平追隨着裴特里、亞蒙及其他政治經濟學上社會學派的代表者。裴特里說：「卡爾認為經濟學的諸範疇，不外是社會生產關

了上述的緣故，依據着錯誤的折衷主義的障地，在客觀上助長了魯平的理論、見解的普及，使到許多同志正確地執行兩條戰綫上的鬥爭愈感困難。

在對機械論者這一面作鬥爭上，有一些同志贊成魯平關於抽象勞動的、關於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反卡爾主義的意見，而且左袒了魯平對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定義，混同生產力和生產之物質的技術方面——技術過程——。到了最近，這些同志們被批判所打動了，漸漸放棄了錯誤的觀點，以至承認了魯平觀念論錯誤的體系。然而還保留着如下的主張：說魯平的特徵，並非歪曲卡爾主義，在根本上是正確解說卡爾恩格斯的。由此他們墮入了顯明的不徹底和折衷主義的泥潭。」

係的理論表現。」（佛蘭芝·裴特里著：卡爾價值說的社會內容二九頁）接着，裴特里不再批判卡爾這個命題，而把生產諸關係解釋成全不近似卡爾主義的。他說：「社會生產諸關係，是以法為主體的人類意志的關係；社會生產諸關係，是人們以法為主體，基於生產過程的分業，媒介生產過程的分業，而進入相互關係——於是他們的自由活動的範圍，相互制約相互制限。——的方法。」（前書二九頁——三〇頁）這樣，裴特里把生產諸關係看做法的主體的關係，把生產諸關係解釋做法律關係。在很多地方，他區別開生產關係和法律關係也是事實；但是這個場合，却完全停止在社會關聯的形式的法的理解之上了。若依他的意見，生產關係和法律關係的不同，很實際的法律和法的規範、人們的契約關係和法律——確保這個契約關係，對契約賦與義務的性質的。——之不同是一樣的。他說：「在基於自由競爭的布爾喬亞社會，法律關係和社會生產關係是不相一致的。這些概念原是表現同樣的社會現象的，不過是在不同的局面來把握社會現象

罷了。在前者，是當做抽象規範適用的個人場合來把握社會現象；在後者，則是當做依具體的法律關係和個人利害而設定的社會關係來把握社會現象。」（裴特里著卡爾價值說的社會內容三三頁）

因此，照裴特里看來，各種個人利害，是設定生產關係的；反之，生產關係却不是決定各種個人利害的，也不是決定這些利害的相互關係和利害的『作用』界限的。然而，實際上各種個人利害的作用，不是統制生產關係的，反之，生產關係才是決定和統制各種個人利害的作用的。各種個人利害，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如果不承認私有財產是特殊的社會生產關係的表現（如果想從個人的利害作用導出生產關係，那是不可能的），那就得承認私有財產是形式的，即抽象的法的規範之總和。由於從各種個人的利害導出生產關係，結局，裴特里之所以區別生產關係和法律關係的緣故，祇是爲了從後者導出前者，從法律秩序導出生產關係罷了。由此即可明白裴特里區別兩者關係的價值。然而，裴特里在很多地方，

連這種區別也忽略了。那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他祇是把商品生產看做法的自律主體的。

魯平跟這種及類似這種的觀念論體系——裴特里、蘇特里茲曼、亞蒙等——相提攜了。

魯平贊同亞蒙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定義，他說：「政治經濟學以一切複雜性和具體性的經濟諸現象的世界為『觀察對象』。可是爲了構成自己的特殊對象或認識對象起見，政治經濟學必須從特殊的社會觀點去研究前述的經濟諸現象……。」

「上面亞蒙的推論，在它的明確性和方法論的正確上，實在要算是模範的。」
 （魯平著：西歐近代的經濟學者三三頁）

社會學派的代表者們，一方面把生產諸關係解釋做法的自律主體、或是經濟的主體的觀念關係；一方面開始生產關係的研究。實質上，魯平已採用了他們這

種見解，魯平說：「蘇特爾茲曼承認他自己的『社會統制』是最接近（？）卡爾所設定的『生產諸關係』的概念的。」（前書一一〇頁）

依魯平看來，蘇特爾茲曼和裴特里是「承認在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裏面，看出人類社會生產諸關係的卡爾的『社會的』方法之豐富的。」（前書二三〇頁）這是會誘導到什麼結果呢？魯平由於修正卡爾主義的緣故，而跟始終敵視普羅列塔利亞的社會學派相聯合了。由於以資本主義之物質形態的生產關係為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做效亞蒙、蘇特爾茲曼、裴特里等，而把生產諸關係『社會化』了。

只要從魯平的著作卡爾價值說綱要第三版裏面，取出一個引例來證明就夠了。魯平說：「……能夠交換的各種商品之相等，反映出商品經濟之根本的、社會的特徵，亦即反映出商品生產者之平等。」

所謂跟社會學派相提攜，是毫無疑問的了，魯平慌忙辯解道：

「在這種場合，所以說生產者平等的緣故，並非說平等地佔有物質生產手段這種意義，乃是指他們是自。律。的、不相互依存的商品生產者——其中任何一個，若不基於和對手的契約，若不是獨。立。的。經。濟。主。體，若沒有對手方面的形式協商，就不能直接由一方左右對手。——這種平等而已。」

在這個場合，他不客氣的說出真話，露出了對生產關係之形成法學的、觀念論的見解，下面的例子便可證明：

「沒有經濟外的強制，不基於公法而基於私法及所謂自由契約的各個人的勞動組織，是近代社會的經濟構造之最特徵的樣式。從這裏（！）產生出各個私經濟間的生產關係的基本形態、交換形態、交換的價值的相等。」

魯平對於生產關係的觀念的、主觀主義的理解，在前面推論的純粹裴特里主義的、結論的定式化中，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交換商品間的平等，乃是近代社會的基本生產關係，即是當做同權的、

自律的、不相互依存的經濟主體看的商品生產者間關係的物質表現。」（卡爾價值說綱要第三版九八頁）。

生產諸關係的這種法律的解釋，跟卡爾主義完全沒有共通之點。如果拿來跟卡爾下面的論綱相比較，就立刻明白了：「當做參與者的意志行爲、當做他們的一般的意志之發現、當做義務來進行經濟的契約，受國家強制履行的法律形式那方面，不過祇是單純的形式而已，不能決定契約的內容的。法律的形式祇是表現那個內容的。」（註）（資本論第三卷）

從這裏極明白地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卡爾嚴密地區別開經濟關係和經濟關係的法律形式，認爲後者是前者的表現，並非前者是後者的表現。

（註）卡爾在評論蒲魯東的信裏面說：「政治經濟學，不是從所謂意志諸關係那種法律的表現上來把握財產關係全體的，而是從那現實的形態上，即是從生產諸關係上來把握財產關係全體的。」（哲學之貧困）

魯平的混同法律關係和生產關係，那病根就在於將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更將交換關係和賣買契約等同起來。他把賣買契約叫做商品經濟的『基本的生產關係』。在交換過程中，亦即在賣買關係上，表面看來，商品生產者只是當做物的所有者——他們的意志可以支配物的——而出現。這點是卡爾再三強調說過的。

爲要使得那些物當做商品而互相關聯起見，商品生產者也不能不當做將自己的意志寄托於物的人而互相發生關聯。這樣，一方只要得到對方的同意，即是各個人都依照共通的意志行爲，出讓了自己的商品，而佔有別人的商品。因此他們必須承認對方的私有權。這種法律關係，——它不是立法的表現，它的形式是相等的契約。——是反映經濟關係的意志關係的。」（資本論第一卷）但是卡爾嚴密區別開經濟關係和意志關係，而唾棄嘲笑把後者置於前者的上位的，把法律置於經濟的上位的一切嘗試。布爾喬亞教授瓦格捏爾，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裏面，

跟魯平完全同樣地敘述了：「由交換而獲得財物，必然要以基於交換而施行的一
定法律秩序爲前提。」卡爾加以辛辣的批評說：

「我的糊塗傢伙，在這裏把一切反裝了。說先有法律而後有交換。但是事實
剛相反，是先有了交換，然後法律秩序才發展的。當分析商品流通的時候，我曾
經指示過：在發展了的交換中，交換者暗地裏承認對方是平等的人格及交換物的
所有者。他們在相互提供自己的財物，而完成購買時，就已經實行着了。只有由
於交換本身，而且只有從交換上發生的那實質關係，後來才蒙受到所謂契約之類
的法律形式。但是這種形式，也不是創造爲其內容的交換的，也不是創造存在這
形式內的人們相互的關係的，而是剛剛相反的。」（卡恩文庫第五卷四〇二頁）
交換過程的特徵，就是這過程的變態不能離開人們的意志而進行。人之所以結成
交換關係，是因爲人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佔着一定位置的緣故。所以當結成交換關
係時，人們的意志決不是『自由』的。祇不過在賣買行爲上，人們互相意識地結

成關係，這種行爲表現做人們的意志行爲，至於在交換關係上所實現的生產關係，那就恰恰相反，是離開商品生產者的意志而獨立形成的，是決定交換關係及其參與者之契約關係的。「人們在生活的社會，加入一定的、必然的、離開人們的意志而獨立的關係，亦即是照應着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達階段的生產關係。」（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通過交換關係上的商品生產者之意志行爲而實現的生產關係，是跟人們意志無關的東西。由於將生產關係和買賣關係等同看待，以至魯平把生產關係當做意志關係而純觀念論的、裴特里式的去理解了。

把生產關係混同了買賣關係，那是不對的。我們切不可忘記：商品經濟的生產關係之特質，在於生產關係的運動必須通過交換才能實現這一點。商品社會的經濟構造之特質，在於生產關係的運動，只有通過當做商品看的物的運動才能實現這一點，在於勞動生產物採取價值形態這一點。這種『物』，不但是使得生產關係顯現的，而且是使得生產關係實現的。卡爾說：「通過（由交換造成於勞動

者生產物之間的、而且通過它又造成於生產者自身之間的）諸關係，個別的私的勞動實際上變成了社會總勞動的一環。」

在流。通過過程的參與者之間造成諸關係的價值物的『能力』，就是生產關係——存在於商品生產的參與者之間的——的實現形態，同時又是生產關係的往後的機能的條件。所以商品交換，是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運動之必要契機；而且一方面是卡爾所謂潛伏的包含在生產關係裏面的，一方面又是以特殊的性質賦與生產關係的。商品經濟的一切生產關係，由交換為媒介，在這意義上說，交換是商品經濟的基本關係。伊里奇在論辯證法的片段裏面說到：「在卡爾的資本論裏面，首先分析最單純的、日常的、根本的、大量的、不知反復幾十億次的布爾喬亞商品社會的關係，即商品的交換關係。分析的結果，說明了在這最單純的現象裏面（在布爾喬亞社會的『細胞』裏面），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換句話說一切矛盾的芽萌）。從而先前的敘述，也都顯示出各部分總和——自始至終的

——的那些諸矛盾及那社會的發展（成長和運動）。」（伊里奇全集第十二卷）

卡爾根據商品社會的生產來攻究社會關係，而以商品及其矛盾的分析作研究的出發，自然地說明了商品經濟的勞動的二重性，自然地指示了這些諸矛盾靠着流過程而怎樣發展和解決。在流過程中，通過商品的運動而實現人類的生產關係。魯平承認物是『設定』和『創造』人與人的契約關係的，但是却否認了物的這種性能——在流通代理人之間，創造這樣的關係的。——是生產關係的運動形式，却否認了生產關係和契約關係本身是不同的。所以在魯平的表象裏面，生產關係被轉移到流通領域去，於是賣買關係和契約也被看成同樣的了。魯平的交換概念的真髓（註）——使到他跟奧大利卡爾主義K·練涅爾和他自己關於通過流通的社會化之理論相吻合的。——就在這裏。

（註）因此有些同志認為「對魯平的交換概念之非難，是不對的。」這些同志是十分錯誤的。（在

卡爾主義的旗幟之下雜誌，一九二九年第十二號一一〇頁。波里林的論文。）

第四章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相互關係

一 技術和生產諸力

關於生產關係的誤解，是跟對生產力的範疇的誤解有着密切關聯的。我們常常看到有些人將生產力和技術同等看待，魯平和布哈林就是堅持這樣的觀點的。在同志布哈林看來，『生產力』的概念跟『技術』的概念是並無二致的。

在史的唯物論一書中，他開首寫着：「社會和自然的互相關係之精確的物質指標，就是社會勞動要具的體系，亦即社會的技術。在技術上，表現出社會物質生產力和社會勞動的生產性。」（布哈林著：史的唯物論）

有些地方，他早已在生產和技術之間打着『相等』的符號了。在一三八頁寫

著：「當考察社會、社會的發展條件、社會的形態和內容等的時候，必須以生產力的分析或社會的技術基礎開始。」因此，在這個場合是混同了生產力和技術的。對於生產力的這樣理解，在魯平的理論裏面也可以看到。魯平說：「生產的技術或生產力，不過是卡爾經濟理論的研究領域的前提條件。」（魯平著：卡爾價值學說綱要第三版一一頁）關於政治經濟學的這種完全錯誤的粗雜的表象，是由全部布爾喬亞『卡爾主義批判者』開始——而且是故意——加給卡爾主義的。全部『批判者』，也很知道卡爾恩格斯並沒有把生產力單單看做技術；可是他們從當作史的唯物論的建設者的立場，首尾不一貫的描寫了生產力。例如：批判古諾時，波爾托開維支說：「除了古諾以外，許多學者們都知道卡爾恩格斯說到生產力的時候，不是單指技術，但爲了一貫起見，單單舉出了生產力。否則，卡爾恩格斯的理論，就會完全失掉了獨創性啊。」提出這樣的問題，在阿萊克塞葉夫，杜坎·巴拉諾夫斯基等的論理裏面，也可以看到。若依批判者的意見，卡爾

變成了嘗試將社會現象還元於自然物理基礎的人了。大家周知的，照卡爾的意見，社會發展的基礎乃是生產諸力。所以照「批判者」的意見，生產諸力就不能算是「社會要因」。阿爾格蘇爾說：「可以下個定義說，生產是經濟的非社會要因的總和」。〔見歐蘭斯基著卡爾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一四八頁〕生產諸力的自然主義的解釋，是從關於唯物論的「批判者」之粗雜的俗流的表象——他們把生產力叫做卡爾恩格思的一切學說——發生出來的。在對布哈林的轉形期經濟學中的評註，伊里奇斷然地摒擊了將生產力這樣的解釋成技術。

在哲學之貧困裏面卡爾說過：「機械不算是經濟的範疇，這是跟挽犂的牛不算經濟的範疇一樣。機械不過是一種生產力罷了。建立於使用機械上的近代工場，是社會生產關係之一，也是經濟的範疇之一。」

引用卡爾上面的話的布哈林說：「在這裏，卡爾顯然的把生產諸力解釋做生產之物質的、人的要素，相應着這個，生產諸力的範疇，就不是經濟範疇，而

是技術範疇了。」以卡爾把技術加進生產諸力爲理由，布哈林就在兩者中間放着

『相等』的符號。關於這點，伊里奇在補白上附註着：『加進並非等同看待』。

並且加了重要的『訂正』：說不是「『相應着物質的人的要素』；因爲『人的』（是曖昧的用語），跟『技術的』不同」。 (伊里奇遺稿集第十一卷三七一頁)
布哈林顯然忘記了他從卡爾著作中引用的文句：「在一切生產手段中，勞動階級是最大的生產力。」

我們通常說，生產諸力是生產手段及勞動力的總和。其實這還不是充分的規定。生產手段及勞動力是生產諸力的諸要素。生產諸力的諸要素和生產諸力，不能說是同一的。這可由機器例子來說明它。拿時錶分解爲各種要件來看時，可以得出齒輪、螺旋釘、發條等等雜然的集合物。這種雜然的集合物，已經不是時錶，而是時錶的各部另件。要把這些另件結合起來，使它運動才是時錶。

生產諸力的諸要素，倘若牠們沒有運動和作用，就不能算是生產諸力。但是

正在運動着的生產諸力，也不祇是物的技術運動過程，並且是依人們的一定關係而被形成的過程。於是這種場合，不能不把關係分成兩類：第一，是勞動過程中的人們的技術關係，是受生產的技術組織自體來直接統制的。第二，是特徵着社會的特殊經濟構造的生產諸關係。以工場內的機械爲中心的人的配置，這是技術關係；人們勞動的協同性質，以指導各種勞動過程的監督和技師爲前提。從生產過程的技術組織發生出來的各種機能和關係的全體制，是技術關係的體制。但是資本主義工場，監督技師和勞動者的關係，不祇是單純的技術關係；監督和技師在工場內所演的機能，是具有二重性質的：一方面是當做生產的技術代表者而出現，他方面是當做生產手段的佔有者資本家的代理人而出現。按着這個方針，他們的職能，就在於爲了儘可能地大量榨取剩餘價值而監督勞動者這一點上的（註）。

這些關係加進了生產關係——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而且是在生產的全部

技術關係上蓋着烙印的。——裏面。卡爾把生產的全部技術關係加進生產諸力裏面，在資本論第一卷有一個地方講過：關於『由各種勞動的結合所發生的』生產力，在另一個地方又講過關於『由協業和分工所發生的生產力』。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裏面，他贊同培蒂把分工率直地叫做生產力，他說：「培蒂還把分工當做生產力，但比起亞丹·斯密士來，已是在更大的規模上展開了。」（政治經濟學批判郭譯三八頁）總之，卡爾是把受生產的技術組織本身所制約的人的關係，包括在社會生產力的概念裏面了。

生產力的運動，不但是以人與人的技術關係為媒介，而且是以社會構造特有的生產關係為媒介。生產諸力當做生產諸關係——以質的特徵給與前者的——的

（註）卡爾說：「當檢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時，經濟學者們，就把指導的機能——由協同的性質

而生的——和這過程的資本主義的機能，因而和由榨取的性質所制約的機能等同看待了。」

內容而出現。

在這裏，想起黑格爾關於形式和內容的理解，並不是無用的。黑格爾區別開材料、內容、形式，他說：「內容和材料的區別，就是在下面所講的地方：即是雖說材料具有形式，沒有形式就不能存在，但不是限定於那一種形式的。相反，內容在保有自己一定形式的時候，依然是不變的。」（黑格爾小論理學一三三節）生產力的諸要素，在各種形式上表現出來。在這意義上，是社會生活的材料。可是形式以內容的規定給與材料。這時候，在一定的形式裏面把握的生產力的諸要素，轉化為社會的現實生產力，當做生產關係的內容而出現。

只有在運動中把握的，只有受生產關係的運動來媒介的生產諸力之諸要素，才是社會生產諸力。

二 當做生產諸力的發展形式看的生產諸關係

在這裏，我們接近了卡爾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一個中心點。因為這樣解答生產諸關係和生產諸力的互相關係的問題，是關連着怎樣理解社會改革和社會發展路徑的問題的。

普通只限於說明生產諸關係受生產諸力的影響而發展，或是生產諸關係關聯着生產諸力。這大體上雖是正確的論綱，但却不見得就能保證對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互相關係有正確理解的。我們必更進一步來指出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互相關聯的性質和構造。試舉出一個例子看罷。在經濟學論爭的參戰者當中，沒有一個人反對生產諸關係關聯着生產諸力的。只要自己承認是卡爾主義者，在形式上總是不能反對的。但是這也不防礙魯平一派和機械論者，從關於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發展之非卡爾主義的反革命的表象出發。

所以，更詳細地吟味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相關聯的性質，我們認為是必要的。

辯證法唯物論把生產諸關係和生產諸力的相互關係當做形式和內容的相互關係來考察（註）。所以對於形式和內容的相互關係的正確理解，就是爲了正確地理解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法的條件。然而，誘導到機械論世界觀的形式和內容的等同看待，以及誘導到康德的先驗論的形式與內容的絕對分離，都是跟辯證法唯物論毫無關係的。

（註）「社會人類對自然的生產活動，在這活動過程進行的生產力之長成，——這是內容。社會的經濟構造，即社會的財產關係，——這是形式。形式從一定的內容（『物質生產的發展』的一定階段）產生出來，那內容往後發展的結果，打破形式。一經形式和內容之間生出了矛盾，矛盾是不能『緩和』的，由於內容的不斷的長成——爲舊形式所來不及適應新需要那麼快地長成的——而日益長成。這樣，必然的排除舊形式和由新形式來代替舊形式的瞬間，遲早終歸要到來的。像這樣，就是卡爾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的意義。」（蒲列汗諾夫全集第十一卷一

爲一切發展發條的形式和內容的矛盾，不但是沒有否定兩者的統一，並且是以兩者的統一爲前提的。伊里奇說：「在形式和內容的統一上，黑格爾要求：形式是內容的形式那樣的、是活的現實內容的形式那樣的、是跟內容不可分地完成那樣的邏輯」（註一）。「形式，受本質自身所規定，在對象的發展路徑上，一方面受本質所規定，一方面和那對象的內在內容、合法則性——從對象產生出質量規定性的——不可分地關連着。」「形式是內容，在其發展的規定性上是現象的法則。」（註二）

但是如果將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轉化爲同一，那是不行的。形式和內容是兩樣的，決不能忽視其他的一面。真理存在於形式和內容的統一，在統一之外，不能有形式和內容。以爲有一方面沒有他方，在實際上是是不可能的。但是兩者的統一，同時實現於兩者的本質區別裏面，否則，那就是無活動的，死的統一。形式

（註一）伊里奇遺稿集，第九卷，三九頁。

是能動的。內容只有通過形式，以形式為媒介而發展。形式促進內容的發展，這只是限於一定的具體歷史時期，如果超過了這個界限，那麼，受着形式所促其發展的內容，就會跟形式不能兩立，而否定形式。祇有基於內容本身發展而生長的

(註二)黑格爾小論理學第一三三節。黑格爾根據物質嚴密地分別開受着質量規定的內在形式和發現

形式。爲使一目了然內在內容的形式和發現的形式之區別起見，我們引用一個黑格爾的例子來看吧！他說：「一塊大理石，它是不管會得出什麼形象的形式，或將得出圓柱形的形式

的。它對於藝術家給它的形式也是不關心的，但是對於自己本質的形式，即是對於造成自己現有的形式就不是不關心的。現在礦物學者決定地層的特徵，把它從旁的類似的地層，例如砂岩、斑岩等區別開來。」(前書一二九節)蒲列汗諾夫因襲黑格爾而強調說：「形式」只有

在某種表面的意義上，即是只有在外部形式的意義上跟「外形」是同義的。如果更進深一層來分析，就會到達當做事物的「法則」看的形式的理解，更正確的說，當做事物的構造看的形式的理解……」。(蒲列汗諾夫全集第七卷三五頁)

新形式，造成了內容往後運動的條件。祇有從這個基礎上，才能理解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法，才能理解兩者的矛盾的長成。

某種生產關係的體系，一經生長了，不但是在它內部的生產力運動的被動外殼，而且是內容（生產諸力）的運動形式，是內容的內部構造，所以生產諸關係，不祇是在生產諸力一定發展階段上生長，而且生產諸力的發展，也祇有通過生產諸關係——對發展的性質和速度，發生積極的作用的——的運動才能實現。這種作用不能看做是生產諸關係對生產諸力的外部壓迫，它是生產力發展之內部的、特殊歷史的法則（註）。

（註）「社會人的屬性，在各個時期，由生產諸力的發展來決定。因為社會關聯的全秩序，是依存於生產諸力的發展階段的。……但是某種社會關係一經生長了，那麼，往後的歷史，

就依照着自己獨特的內部法則來進行，這種內部法則的作用，是促進或阻止那決定人類歷史

運動的生產諸力之發展的。」（蒲列汗諾夫全集第十三卷二九四頁）

在資本論最後的一頁，卡爾說道：「勞動過程，不過是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過程，那單純的諸要素，是共通於勞動過程之一切社會發展的諸形態的。可是這過程的一定的各種歷史形態，使到這過程的歷史基礎和社會形態更加發展。一經達到某個成熟階段時，就會打破那種歷史形態，而過渡到別一較高級的形態。這種危機的時期到來，在下面所講這點上現露出來：即是分配關係，因而又應適它的生產關係的一定歷史形態，與生產力、生產性及其諸要因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立的加深和增大之中顯露出來。這時，生產的物質發展和社會形態之間，發生了衝突。」（資本論第三卷）

在另一個地方，卡爾給布爾喬亞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加以特徵說：「分配形式不過是從另一觀點看的生產形式。種差——因而為布爾喬亞生產之界限的這種特殊限制，進入生產本身裏面，決定和支配生產。可是，它由於自身的內在法則，一方面，不能不（好像不是在受限制的社會基礎上的生產那樣的）

發展自己的生產諸力；他方面，又只能在受限制的範圍內發展自己的生產力。於是，在這一點，曝露出在兩者的矛盾——在它的內部，這種獨特的差異運動着，而且由於運動，容易判明這種差異當作單純歷史的、過渡的形式而出現的。——上表現出的恐慌之最深刻的內部矛盾。」（剩餘價值學說史）。

一方，資本家爲着追求利潤而改良技術，使生產諸力發展；他方，這種發展，跟資本主義分配的實現條件和局限性質相矛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特徵就在這裏。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矛盾，在恐慌、階級革命——結局打破資本主義社會的——上表現出來。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一

（註）卡爾把生產的社會形式看做特殊的歷史法則，這在他批判費喬克拉脫的論著裏面是很明白的。
 。「生產的布爾喬亞形式，在他們看來，是不可避免地成爲生產的自然形式；在他們看來，生產的自然形式是物質法則。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把社會歷史之一定階段的物質法則，看做

支配一切社會構成的抽象法則這一點。」（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三五頁）。

方面，刺激生產力的發展，他方面，局限生產力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成爲生產諸力發展的特殊社會法則（註）。

我們引用一些例子來解明：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之間的內部關聯罷。卡爾說：「生產剩餘價值，卽進行貨殖，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法則。」（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一節）

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諸力的發展，是根據這絕對法則的。利潤是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及再生產的終極目的，是決定契機。「爲價值增殖的狂熱渴望者的資本家，毫無顧忌的驅使人類執行爲生產的生產，因而使到社會生產力發展。於是，造出了以各個人的完全而自由地發展爲根本原理的、能夠成爲較高級的社會形態的唯一現實基礎的物質生產條件。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必須使得投於產業上一企業的資本不斷地增殖；因而競爭，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在法則當做外部強制法則而課與資本家。爲了保持自己的資本起見，在競爭上資本必須

不斷地增殖自己的資本；而資本的增殖也必須依靠累進的蓄積才行。」（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第三節）

資本主義生產的運動之機構，對於各個資本家，能夠強制生產諸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條件之下，決定生產的規模，是一任各個資本家的意思的。但是那動因還是剩餘價值的掠奪，並且不是單純的掠奪，而是在日益增大的規模上來掠奪。我們已經知道：採用進步技術的企業，個別商品的價值比較市場的價值要來得低廉，於是那些企業的老板就得到了超過利潤。資本家爲了追求超過利潤而改良技術，於是使得社會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利用想獲得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的渴望，不但生出圖謀擴大和改良生產的刺激，並且不斷地進行擴大生產，這對於各個資本家都成了生存的法則。只要商品的廉價是競爭場裏最重要的武器的話，那麼，在競爭的條件之下，生產的改良和擴大也就是各個資本主義企業的生存條件。各資本家在發展生產事業上，一旦比同業落後了，就會馬

上威脅到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所以由於競爭的緣故，倘若有一部分的資本家企業擴大，另一部分的資本家企業爲了自己的生存的必要也不得已而跟着擴大起來。但是生產一擴大，就伴隨着資本有機構成的高位化，資本有機構成的高位化，又引起利潤率低落的傾向。在這裏，表現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的生產力發展的矛盾性質。這個矛盾，「如果概括的說出來，就是下面所講的地方：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價值、價值所包含的剩餘價值、和資本主義生產所依據而進行的社會關係等暫擱起不談。——包含着促使生產力絕對地發展的一傾向，同時另一方面，以保持既存的資本價值，而且儘可能地使資本價值增殖（即不斷地促進價值的增殖速度）爲目標。……社會生產力的無限發展這種手段，跟既存資本的價值增殖這種受限制的目的不斷地衝突。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使物質生產力發展，而且是造出照應物質生產力的世界市場的歷史手段，同時又是這種歷史任務和照應它的社會關係之間的不斷的矛盾。」（資本論第三卷第十五

章第二節)

前段，卡爾明白地指示着：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是空前的刺戟生產諸力之發展的，同時又是限制生產諸力之發展的。卡爾再三強調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時又是歷史的過渡的特殊社會的生產力發展之界限。）的積極的作用，他說：「對於生產過剩的明瞭現象的一切異論（這些現象的進行，是不管那些異論的），說資本主義生產的諸限制，決不是生產一般的諸限制，因而也不是特殊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諸限制。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是在於具有使生產諸力絕對發展的傾向這一點上。因為生產諸力的發展，跟那資本所依靠而運動的、而且祇有依靠資本才能運動的特殊生產諸條件，陷於不斷的衝突。」（資本論第三卷第十五章第三節）

生產諸關係，不單是反映（由於是生產諸關係變化而反映的）生產諸力發展的被動外殼，這祇消一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諸關係和生產諸力的相互關係就可

以明白了；那嗎，準此也就可以明白了生產諸力自身是通過生產諸關係的運動而發展的，而且是祇有這樣才能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當做某一社會經濟構成的生產諸力之發展形式（特殊的歷史法則）看的生產諸關係的（註）。若不理解在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生產諸關係所演的積極作用，那就會墮入魯平一派特有的修正主義的泥潭，以及背叛卡爾主義。

由於將生產諸力和技術看成同一，魯平使到生產諸力由社會形態的內容轉化

（註）魯平到處強調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諸關係的。這個論綱本身是正確的，可是給魯平弄重了，跟關於非卡爾主義的生產諸關係和生產諸力的相互關係之表象相聯系着。所以在作論爭總決算的同志來留定和波里林的論文裏面，當決定政治經濟學對象的時候，特別指摘了：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當做生產諸力的發展形式看的生產諸關係的。（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三〇年第二號五三頁）。魯平的錯誤，並非像畢索諾夫所想像那樣：魯平沒有將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並行來研究；而是在於魯平沒有將生產諸關係當做生產諸力之內部構造，沒有當做生產諸力之發展形式來考察。

爲社會形態的前提條件，即是轉化爲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的生產關係之前提條件了。從這裏產生出他的命題：「生產諸力發展的特殊社會法則，不是政治經濟學所應該研究的；而是特殊的科學、即研究『社會技術』的科學所應該研究的。」

『研究社會技術』的科學和政治經濟學的關聯，在魯平看來，正好像他看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關聯一樣，純粹當作外部東西而出現。依魯平的意見，這種『關聯』在於下述這點：即生產諸關係『應化』於生產諸力，『包裹』生產諸力，由於生產力的『壓力』而發展等等。他對中央委員會的報告裏面曾說過：生產諸關係不是生產諸力發展的被動反射，這確是事實，但是，實際上他不曾把生

（註一）擁護魯平的一羣同志們，沒有發見魯平體系的修正主義的性質。例如，同志波里林說：「關於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問題，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問題，魯平是站在擁護『經濟學是研究生產諸關係的科學』這種舊卡爾主義定義之障地的。」（卡爾主義的旗幟之下雜誌一九

產諸關係看做是生產諸力的運動要通過它（生產諸關係）才能實現的形式。於是魯平關於爲了說明生產諸關係而『援用』生產力，就不能不如此這般了。依魯平的意見，必須把生產諸關係的體系「束縛於橫在其根抵的物質技術基礎、即生產過程。」（魯平著：抽象勞動和價值八七頁）於是生產諸關係的體系，從生產諸力的內部構造轉化爲被動外殼了（註一）——在生產諸力跟被動外殼相矛盾之前，在生產諸力由於發展而造成新的生產諸關係之前，不動地靜待着的外殼。——

（註二）「俄羅斯的生產諸力，還沒有達到可能造成社會主義那種程度。這個論綱，第二國際的一切英雄們——當然斯哈諾夫也在內——把它像繪畫的袋那樣担着。他們把這個沒有爭論餘地的論綱千回反復着，但是我不認爲它對於革命的估量會有什麼意義的。」

「對於建立社會主義，倘說必須一定的文化水準，（這文化水準是什麼？誰也不能斷言，）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先由革命的方法來造成達到這個一定水準前的提條件，然後基於勞動者（勞動階級和蘇維埃政權），以趕上其他各國呢？」（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

魯平說：「卡爾主張在一種生產諸關係的內部，生產諸力不斷地與它的形式相衝突，以它爲外殼而運動。」（魯平給羅詹貝格著：李嘉圖與馬克思的序文四二頁）魯平當做生產諸力的被動外殼來把握形式，這不可避免的要誘導到過低評價新生產諸關係之影響於生產諸力發展的作用。這是使得魯平的理論接近了斯哈諾夫的論綱——新生產諸關係的形成，必須生產諸力達到了高度的發展水準，它自身早已不能跟資本主義兩立了——的（註二）。這些一切，跟魯平的修正主義的性質一樣，是暴露出他沒有正確分析經濟關係的能力（註三）。「關於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相互關係之孟雪維克理解，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也都被打破了。在勞動者對於新生產方式和『勞動規律』的新關係之基礎上」（伊里奇話），

（註三）關於『魯平主義』，伊里奇下面的話完全被證實了：「總之卡爾主義者，是把經濟關係的認識擴大到普羅列塔利亞階級革命的。在這裏存在着卡爾主義者和一羣或大或小的布爾喬亞的最深刻的差異。卡爾主義的真正的理解和認識，就不能不在這個試金石上試試看。」

在勞動者對於當做全勞動階級的共有生產手段看的生產手段的關係之基礎上，勞動階級之間展開了空前的活動。基於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的新生產諸關係，和基於農業的新生產形態（國營農場，集體農場）的普羅列塔利亞對農民的新關係，促進了蘇聯生產諸力的發展，使得生產諸力的發展達到資本主義所未有的增長速度。

在實踐上，證明了蘇聯的嶄新的社會主義生產諸關係，正在助長着生產諸力的空前增長。卡爾伊里奇把生產關係看做生產諸力之積極的發展形式，祇要明白了卡爾伊里奇對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相互關係的理解，就會首肯蘇聯國民經濟最近發展速度的急激化。

三 技術學、政治經濟學和批判技術學史

簡單地說，生產諸關係是生產諸力的發展形式，是給與後者以特殊歷史的運

動法則的。由於研究生產關係，我們可以知道生產諸力的運動機構及其特殊歷史發展方式。無疑的，一切社會構成的秘密，不能不在社會生產過程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力的結合方式之中去探求（註）。

然而這些生產力的諸要素，——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如果懂就勞動過程兩者的相互作用說來，那是具有發展之內部邏輯的。所以當布哈林在轉形期經濟學里面寫着：『生產諸力是立於技術和經濟的境界的極限概念』時，伊里奇加以評註說：『這比較八八頁說得好些。』（註——在八八頁是混同了生產諸力和技術的——日譯者註）社會生產過程，就是人類生活的物質諸條件和這過程所貫通着的特殊歷史生產諸關係的同時生產過程。社會生產過程，就是人類對於自然和對

（註）卡爾說：「不問那社會生產形態如何，勞動者和生產手段始終是生產的要因。但是兩者分別存在的時候，兩者都不過是在可能性上的生產的要因，爲着要生產，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

實現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是區別出社會構造的各個經濟時代的。」（資本論第二卷）

於相互間而參加進里面的諸關係之總和。卡爾說；「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社會生產過程一般在歷史上規定之一種形態。社會生產過程本身，是人類生存的物質諸條件之生產過程，同時又是在特殊歷史經濟生產關係之下進行生產和再生產這些關係本身的過程，而且是生產及再生產這過程的負擔者的、和他們的物質生存諸條件的、以及他們的相互關係的過程，亦即生產和再生產他們的時代之一定的經濟社會形態的過程。因為生產的負擔者對於自然、對於相互間而參加進里面的那些關係之全體，他們賴以生產的諸關係之全體，都正是從經濟構造這方面來考察的社會。」（資本論第三卷四十八章第三節）生產諸力的發展，在它的諸要素的發展上表現出來，在一種社會構成所固有的特殊歷史生產諸關係的影響之下進行。生產諸力的諸要素由於包含於社會生產過程的進行中而採取經濟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機械，是相對的人口過剩的產生和驅逐勞動力的手段，同時又是剩餘價值生產的手段。因此在資本主義之下，機械恰是當做增

加勞動者的失業、延長勞動日、增加勞動強度的手段而發展的。卡爾說：「數學者和機械學者常常愛說工具是簡單的機械，機械是複雜的工具（英吉利的政治經濟學書中，也有模仿這種說法的），……但是如果從政治經濟學的立場看來，這種說明簡直是全無意義的。因為它缺乏了歷史的要素。」「資本主義社會所使用的機械，也跟勞動生產力的其他一切發達樣式相同，對於減低商品的價格、縮短為勞動者自身的必需勞動日部分、延長為資本家的無代價的勞動日部分這種目的，是極有幫助的。因此機械是剩餘價值生產的手段。」（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一節）

所以拿技術關係來包括地特徵生產諸力的發展，這是不可能的。卡爾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面說過：「資本的構成，應該從兩種意義上來觀察它：若從價值方面來看，資本的構成，是受着資本被分割為不變資本（即生產手段的價值）和可變資本（即勞動力的價值 || 工資的總和）的比率來決定的。若從作用於生產過程內

部的材料方面來看，總資本被分割爲生產手段和活的勞動力；資本的構成是由在一方的使用生產手段的數量和在他方的充用的必要勞動數量的比率來決定的。我把前者叫做資本的價值構成，後者叫做資本的技術構成。這兩者之間是具有密接的相互關係的。爲了說明白起見，從受着技術構成所決定的、而且反映技術構成之變動的這方面看的資本的價值構成，我叫它做資本的有機構成。」（資本論第一卷第廿三章第一節）

從這里明白的看出，卡爾是把資本的技術構成，看做在人類積極作用於自然的過程中，不同的生產諸要因之間所形成的數量比率；把資本的價值構成，看做對象化於這些諸要因中的資本價值的構成各部分間之數量比率，而將這兩者分別開來。資本的技術構成，如果移行到價值構成的比率，它就獲得新的質，而變成資本的有機構成；只有在這新的質上來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法則。資本主義的生產諸力的發展法則，不是資本的直接的技術構成，而是有機構成的高度化的

法則。依存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的資本主義生產諸力之構造，既不是由資本的技術構成本身、也不是單由資本向價值的分割、更不是由被分離的那些諸契機的那個所給與的，而是由爲兩契機之統一的資本有機構成所給與的。

技術關係——技術——具有從人類對自然關係的合則性而發生的內部發展的邏輯。卡爾敦示着：研究這種合則性的，就是技術科學。他說：「技術科學是解明人類對自然的積極關係，是解明人類生命的直接生產過程的。」

由於分析生產諸關係，我們可以明瞭生產諸力之特殊歷史的發展法則。因爲這法則，是由一定的生產諸關係所給與的。可是生產力的運動，其中包含着生產力諸要素的發展；依照前面講過的，後者的發展，又是在技術發展的影響之下進行的。生產力發展的水準是由技術的水準特徵着的。技術、即人類對自然的關係，具有一定的內部發展的邏輯。勞動要具的變化，具有一定的內部合則性。若看卡爾分析從手工業到工場手工業、從工場手工業到工場的轉化，就會知道他把

握各種技術體制的內部發展、說明這發展之內部合則性、指示出各個階段都是達到後一階段的階梯。技術（倘若將生產關係置之度外），是集團勞動所使用的一定的勞動要具和技術方法的總和。存在於工場手工業生產方式的那些勞動要具和

（註）卡爾說：「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大工業跟手工業的、工場手工業的基礎在技術上發生了矛盾。發動機、傳力機、作業機等的範圍，應該怎樣擴大？機器構成諸部分和作業機的複雜性、多樣性、正調性等，隨着它們（作業機等）脫離了手工業的原型——本來完全決定它們的構造，採取根據它們的機械任務決定的自由形態的——而應該怎樣增大？應該怎樣使得自動裝置發達？例如用鐵來代替木材、更難處理的材料之利用等，成爲日益迫切，而應該怎樣處理？——這些一切原生地出現的諸問題之解決，用工場手工業之下結合着的勞動者之全部力量，只能做到某種程度，不能根本上打破的種種人的限制，仍然隨處碰到。例如近代水壓機、近代力織機、近代梳刷機等機械，依靠工場手工業是供給不來的。……歸納起來說，大工業必須達到掌握有爲其特徵的生產要具的機械，以機械生產機械。於是大工業開始造出適應自己的技術基礎，用自家的腳跟站起來了。」（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一節）

技術方法，並不是一朝一夕產生出來的，而是會由手工業技術準備下來的。手工業技術的發達，準備了工場手工業的發達，後者的諸要素已經孕育在前者胎裏的。另一方面，機械，也是工場手工業的技術達到了一定發達水準的時候，才開始產生的。工場手工業里面精密的分業原則，向着單調的、簡單的操作之工作上的轉化，能夠使得那些操作轉達給機械，能夠使得那些操作從受限制的人類能力及筋力解放出來。假定一個人紡織一具紡錘，我們把這種操作轉移給機械去做，一台機械可以紡織十二個乃至十五個紡錘，到了目前，還可以紡織五六十個紡錘。但是技術上的改良進步，不僅要靠技術本身的一定發達水準，同時還要靠一定的社會生產諸關係才能夠實現（註）。

在技術的領域內，只要生產諸關係的一種體系決定社會生產諸力發展的典型為限，那麼，從其發展的內部邏輯而生的各種改良進步的命運，就受着這一種體系所左右。技術上的改良進步，是否被採用，因為是關係於階級鬥爭、而且受着

階級鬥爭所決定、是關係於生產諸關係的一種體系，而且受着生產諸關係的該種體系所決定的緣故，所以很多的改良進步竟沒有被採用，這是我們所知道的。還有向機械生產的移行，不祇關係着工場手工業技術的發展，而且關係着適應它的經濟諸條件的——強制採用機械的（註）。——在哲學之貧困里面，卡爾說過：「在英吉利，當市場發展，而手工業不能滿足其要求，於是開始感覺到機械的必
要。那時，就想到應用在十八世紀已經完成了的機械學。」（哲學之貧困第二章

第二節）

（註）在資本主義社會，機械的使用，有一定界限，即由追求剩餘價值所決定的界限。卡爾說，「倘若當做謀生產物廉價的手段來考察機械，那麼機械的使用，界限就在於：生產機械本身所需的勞動要比充用機械所代替的勞動更小這一點。不過在資本家來看，那界限還要更小哩。因為資本家所支付的，不是勞動的價值，而是充用勞動力的價值，所以從資本家的立場來看的機械使用的界限，就是機械的價值和由機械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之差。」（資本論第一

卡爾還指摘過，在機械發明上的階級鬥爭之意義。他說：「自一八二五年以來，差不多一切的新發明，都是爲了力圖使專門勞動者的勞動低廉化的企業家和勞動者之間相衝突的結果。在經過多少顯著的衝突之後，便出現了一種新機械。」（哲學之貧困第二章第二節）卡爾所指摘的這兩個要因（商品需要的增大和階級鬥爭）——是影響機械的普及和發展的——是生產諸關係的一定體系的諸契機。因而由於生產諸關係決定生產諸力的發展，而給與發明的實現和普及以大或小的餘地。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發展的影響，不消說並非打倒技術發展的邏輯，而是在邏輯的範圍內給與勞動要具發展以方向的。

比方：奴隸經濟關係的秩序，隨着排除纖細的高價的勞動要具，而誘導適應它的勞動要具的發達。因爲生產力的發展，完全是貢獻奴隸所有主的利益的。卡爾說：「這是使得以奴隸制爲基礎的生產之生產費增高的一例。若依照古人適切的表現，在奴隸制之下的勞動者，不過是當做會說話的工具，能夠跟發聲工具的

動物和無聲工具的死的勞動要具區別罷了。但是勞動者自身，不願給動物和勞動要具覺得跟自己相平等，反而叫它們感到自己是一個人。即是勞動者由於虐待並且以真正的歡喜去糟塌那些動物和勞動要具，而得到自己和那些動物及勞動要具有着差別的意識。這樣一來使用極拙笨的極粗陋的勞動要具，——因為粗笨極

不容易破壞——便變成了這種生產方式的經濟原則。所以直到南北戰爭以前，在墨西哥海灣沿岸蓄養奴隸的各州，仍然使用古代中國式的犁，好像豬羅和驢鼠一樣，只能掘起地皮，不能夠作畦或掘返。」（資本論第一卷）

生產諸力的諸要素之發達，依從人類對自然的關係之合法則性的，——那是技術上的合則性，是技術學所研究的。本來的生產諸力之發展，在生產諸力的諸要素之發展上表現出來，是在自身里面包含着諸要素之發展的，但是它自身是更高度的運動形態，不能還元於技術發展的。生產諸力的發展，當做特殊的質而依從經濟上的合則性——從某一種社會——經濟構造的特殊性發生出來，由政治經

經濟學來闡明的合則性。——這兩種合則性的混同，以及從混同而生的技術學和經濟學的混同，都是機械論的特徵。例如畢索諾夫說：「生產諸力的物質基體之所以成爲社會發展之基礎的緣故，只是在它被勞動的活的火燄所包圍的限度內，即是在它作用着限度內。當作這種東西看的基體本身之研究，乃是政治經濟學的範圍以外的事。這基體的諸要素間的相互關係，即發生着作用的生產諸力、『當作這種東西』看的勞動過程，都是跟受它們所制約的生產過程的社會形態同樣成爲政治經濟學的不可分離的構成部分。」（經濟學的諸問題第四——五篇二一〇頁）

因此，依同志畢索諾夫看來，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生產諸力的基體的諸要素間之相互關係的。但是生產諸力的基體的諸要素間之相互關係，畢竟只是物與物的關係，只是生產過程中的人與物的關係而已。生產諸力的基體，是機械、原料和勞動力等。它們的相互關係，就是技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可以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不僅是這樣，並且同志畢索諾夫還率直地說明了「人類集團對

自然的關係，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人們的相互關係同樣屬於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前書二一〇頁）如果拿這論綱跟卡爾的主張「技術學是說明人類對自然的能動關係的」相比較，就會立刻明白同志畢索諾夫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立場之錯誤。

對於機械論者混同了相異的運動形態，以技術合則性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言，則魯平一派却以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諸力之特殊發展法則，作為研究特殊科學（社會技術）的研究對象。（魯平著：卡爾價值理論綱要第三版十頁）那時魯平根據卡爾，從資本論里面零零碎碎地引用了如下的一個地方：「如果要寫批判的技術學史的話，那末無論十八世紀的什麼發明，都不應歸功於個人，這總之是被證明了的事實。但是却從來沒有這樣的技術學史。達爾文引起我們注意自然的技術學歷史，即是當做動植物生活的生產要具之各種器官的形成。社會人類的生產器官，也是當做各種特殊社會體制的物質基礎而被形成的，這不是值得

同樣的注意嗎？而且供給這種形成史，比較動植物的場合，不是還要容易一些嗎？維科說得好，人類史是我們所創造的，但自然史却不是這樣的，從這點上，可以看出兩者的區別來。技術學是闡明人類對自然的能動的關係的，換句話說，亦即闡明人類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因而又闡明人類的社會生活關係及從它而產生的精神表象的直接生產過程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一節）從這里可以明白，卡爾認為建設「技術學的批判歷史」這種科學是必要的。這門科學的任務，就在於理解：『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發展過程，在具體歷史現實上怎樣地進行？社會需要怎樣地影響到技術的發達？例如創建適應資本的生產過程的體制這種社會的任務，由於歷史而怎樣地在技術上得到了解決？這樣一來，指示出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具體歷史發展過程，便是證明了技術的觀念論發展理論——把技術的進步，歸功於『有天才的個人』的影響和行爲——之一切無稽和虛偽的，便是證明了「無論十八世紀的什麼發明，都不應歸功於個人」的。在卡爾主義之

前，嚴然矗立着卡爾所講過的科學，即創建『技術學的批判歷史』這個極重要的任務。比方在關於高等專門學校問題的中央委員會之決議案中，高等專門學校講授『卡爾主義技術史』的理由就在這裏。但是『卡爾主義技術史』或者『批判技術史』，是跟魯平的『研究社會技術』的科學絲毫沒有共通的地方的。魯平的出發點，乃是我們靠着研究生產諸關係，不能夠了解生產諸力的特殊發展法則這種非卡爾主義的論綱。魯平這種見解，基因於他沒有把生產諸關係當做生產諸力的發展形式來考察，自始就把生產諸關係當做包裹生產諸力之外殼（好像豆殼包着豆子一樣）來考察。加之，在魯平，還關連着生產諸關係的觀念論的理解哩——像我們已經知道的，他把生產關係混同了關係——還關連着生產諸力的自然主義的理解哩——他把生產力和技術等同看待——他既不理解爲人類生產活動形式（成果）的生產諸關係的物質性，又不理解爲生產諸關係內容的生產諸力的社會性質。簡單的說，由魯平看來，生產諸力從生產諸關係的內容轉化爲生產諸

關係的前提條件了（註）。只要魯平從觀念論上去理解生產諸關係，把生產力和技術等看待爲限，那就不管他怎樣力說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諸關係的，畢竟在那本身正確的論綱之背後，已是潛伏着對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非卡爾主義的理解了。

（註）魯平把生產諸力看做生產諸關係的前提條件。他說：「生產的技術（即生產諸力），只有當做前提條件，只有當做出發點，在它對於爲我們的真正研究對象的生產諸關係的說明是必要的限度內，才入於卡爾經濟理論的研究領域。」他方，同志畢索諾夫又提出了錯得一場糊塗的主張，他說：「物質生產過程的兩面（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引用者註），具有同等的資格，都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因爲兩者具有同等的資格，都進入爲政治經濟學的客體之物質生產的。」

魯平主張：在政治經濟學中，不是連同生產諸關係一起的去研究生產諸力的。同志畢索諾夫拿魯平的主張爲理由，而批判魯平，提議了兩者都應該研究其實。魯平真正的錯誤，並不是他把政治經濟學對象局限於生產諸關係，而是他沒有把政治經濟學對象看做物質的關係。——特徵着生產諸力發展的典型及其特殊的歷史的法則的。——

第五章 當做政治經濟學對象看的資本主義生

產方式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的序文裏面，卡爾說：「在本書中，我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相應着它的生產諸關係及交易諸關係。」某卡爾批判家，從資本論中引出了上面的話句，而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諸關係』對立起來。

例如：拉普德夫說：「卡爾到處嚴密地分別開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魯平主義和卡爾主義一二〇頁）

這種主張是正確的嗎？不，不是正確的。只要從資本論中引出下面的文句，就可以明白這種主張是錯誤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自始就有了兩個特徵，可以和旁的生產方式區別開來。第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當做商品來生產

生產物的。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其他的生產方式區別的特徵，却不在於

商品生產這樁事實的本身，而在於商品對於生產物具有支配的決定的性質這一事實。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首先以下述的條件爲前提：勞動者本身當做單純的商品的賣手、當做自由的工資勞動者出現，因而勞動一般當做工資勞動出現。……

還有使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格外顯著的第二個特徵，便是剩餘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的目的、決定的動因這一點。」（資本論第三卷第五十一章）像這樣，卡爾由於給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加以特徵，恰是記述了資本主義的特殊生產諸關係。所以在這裏卡爾並沒有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諸關係』對立起來。

同樣，卡爾屢屢當做特定的構成的經濟關係之基礎來說明生產方式，以這爲理由，認定斷不可把這兩個概念對立起來的。卡爾給阿萊年可夫的信裏面有着下方面的話，這是諸位知道的吧：「由於變革現代經濟關係所依靠而建立的基礎，和

變革現代的生產方式，就不僅可以根本消滅競爭、獨佔、和它們的矛盾，並且可以根本消滅它們的統一、綜合、運動——實際上是調劑競爭和獨佔的。——

顯然的，在這裏卡爾把生產方式這句話，解釋做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的特殊歷史的結合方式。即是解釋做在特定的構成中所固有的生產諸力的內部構造。（參看前章由資本論第三卷的引用）。生產方式，是一切社會的一切經濟關係的現實基礎，亦即在生產本身和分配的生產代理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交換關係等等的現實基礎。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的社會結合方式，實在是表現出生產手段之向階級分配的。

比方：工資勞動者，爲什麼要跟當做對他們有冷淡的敵意的外力看的生產手段來結合呢？這便是因爲勞動者喪失了那些生產手段，被資本家階級所獨佔而化爲榨取手段的緣故。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的結合方式，表現出各種分配形式。然而分配形式，「乃是在生產關係本身的內部，其一定的代理人們跟直接生產者相對

立而盡的特殊社會機能的基礎。分配形式，對於生產諸條件本身和生產諸條件的代表者們賦與一個特殊的社會資格。分配形式，是決定生產的全性質和全運動的。」（資本論第三卷第五十一章）因此，拿一句話概括來說——我們這樣附加——生產物的分配和交換，是決定一切經濟關係的。

「生產物的分配，顯然是包含於生產過程的內部而決定生產編制的這種分配之結果。如果忽略了生產所包含的分配而去觀察生產，那顯然是空虛的抽象。」（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郭譯二十頁）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的社會結合方式，亦即生產方式本身，便是從這種分配直接產生出來的，而且是表現這種分配的。在這意義上講，生產方式，便是在萌芽狀態包含着一切、便它們從自己內部發展起來的基礎經濟關係。在這裏，生產方式本身不能跟生產諸關係相對立。

隨着生產方式的變革，一切經濟關係也同時變革的場合，卡爾把生產方式這用語，解釋做當作基礎的經濟關係看的物和人的生產要因的特殊歷史結合方式。

卡爾給阿萊年可夫的信裏面所論述的生產方式，正是這個意義。「隨着獲得的新生產力，人類變革其生產方式。隨着這種生產方式，人類變革一切的經濟關係。——祇是特定的生產方式的必然諸關係。——」

但是，如果認為卡爾隨便在什麼地方使用『生產方式』一語，都是上面所講的意義，那是大錯的。他使用『生產方式的變革』這句話，往往是指生產的技術基礎的變革。

「在某生產部門的生產方式起了變革，在其他的產業部門也給與同樣的變革條件……」「比方：機械紡績業，使得機械機織業的成立成爲必要，兩者的結合又造成了漂白業、染色業、印花業的機械化學革命之條件。」（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一節）

最後當講到近代工業的時候，卡爾在資本論第一卷裏面寫着：「我們稱爲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真正意義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關係和技術方法的結

合……」(資本論第一卷德意志版第一版，昂格思版第四版，都沒有這個地方，這顯然是考茨基從法蘭西版採入的。)這樣，卡爾在這裏是把技術方法和社會關係的結合，叫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因為卡爾使用『生產方式』這個用語，有種種的意義，所以應該隨時根據前後的關係作不同的解釋。在上面所引用的文句，是卡爾通通沒有下過定義的，這點必須得留意。在卡爾，定義是多餘的。『他決不下定義』(伊里奇語)。我們所以要討論生產方式這問題的理由，就是因為有許多經濟學者們，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抱着錯誤的見解。好像經濟學和技術學的混同，便是從誤解這個用語而生的。

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適應它的生產諸關係』。有一些經濟者從卡爾這個論綱出發，便認為卡爾在資本論裏面，不但研究生產的社會秩序，同時還研究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同志拉普德夫說：「卡爾既沒有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還元於『物質』技術生產』，也沒有還元於一種生產關係。他把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做使用價值的生產（即當做人類對自然關係的生產）、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關係本身的生產和再生產的統一來考察。倘若從這統一中抽去它的有機構成之一部分，那就會不能夠得到卡爾所給與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概念啊。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上述所有的諸契機之統一，從諸規定所給與的豐富的全體上，才能叫做資本主義的生產。如果剛處理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面，那就只能獲得這一面，而不能獲得資本主義的生產。卡爾當做資本論的實質主題來處理的，只是這種意義的布爾喬亞生產。」（魯平主義乎卡爾主義乎一二一頁——一二二頁）

如果依照上面拉普德夫對卡爾理論的解說，那麼，資本論的主題，不但是被解釋做『依據生產的人類的社會關係』（伊里奇語）的生產，同時也是當做『人類對自然的關係』（拉普德夫語）看的生產。然而，說技術學是研究『人類對自然的能動關係和人類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的人，作這種解釋的人，可不是

卡爾嗎？而拉普德夫却偏要把自己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理解，推到卡爾身上去。

「倘若像某解說家所想像那樣，卡爾把生產看做生產諸關係的體系，那麼卡爾既然一方面認為在研究對象裏面包括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爲什麼一方面又認為必須附加相應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關係呢？這不是費解的嗎？」（魯平主義乎卡爾主義乎一二一頁）。

第一，關於『附加生產關係』，卡爾在什麼地方也沒有說過；他所說的是關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適應它的生產關係及交換關係』。第二，因爲說不定有誰『感到費解』，而卡爾就主張在這關聯上，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候，不消提到依據生產的人類的社會關係，這是不可能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是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像卡爾再三講述過那樣，是表現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之統一的東西。因此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候，卡

爾區別開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在資本論第一卷裏面，他檢討了資本的生產關係，在第二卷裏面，他檢討了資本的流通關係，在第三卷裏面，他考察了『當作總體看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請參看資本論各卷的標題）

當說明適應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時候，卡爾把它們當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諸契機、當做在這一經濟構造的統一內的諸差別來考察。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布爾喬亞的生產』、『物質的生產』等等，在這個場合，卡爾從其關聯上，把上面的一切規定，解釋做生產的社會秩序。關於這點，伊里奇最光輝的闡明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絕對不是一般人通常所說的『物質價值的生產』（這是技術學的對象），而是依據生產的人類的社會關係。只有由於將『生產』看做第一義，然後才能特別地撇開『分配』。這個場合，在研究『生產』的部門，不形成社會經濟之歷史上所規定的形態的諸範疇，而形成屬於勞動過程一般的諸範疇。通常那種無內容的腐敗，

不過只能幫助抹殺歷史、社會諸條件罷了（資本概念便是很好的例子）。如果當做依據生產的社會關係而澈底地去考察『生產』的話，那麼『分配』、『消費』，就都會失掉其一切獨立的意義罷。」（伊里奇全集第二卷二〇〇頁）從這裏極自然的得出下面的結論，即不是講技術學，而是講當做政治經濟學對象看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場合，我們是要提及當做『依據生產的社會關係』（伊里奇語）看的『生產』的。伊里奇對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理解，在這裏，毫無疑義的明瞭敘述了。然而還有一些同志要將政治經濟學不單是研究依據生產的人類關係，同時直接研究人類對自然的關係這種見解，推在伊里奇身上，這確是可驚的事實啊。不消說，由於研究依據生產的人類關係，我們就可以知道實現人類對自然關係的特殊形態，但混同了兩者，却是不行的（註）。然而，竟有一些同志們，偏要愚昧的企圖以這種混同，把魯平從修正主義泥潭中拯救出來。

魯平的修正主義，並不在於：他把資本主義生產看做生產關係的總和這一

點。乃是在於：他對於生產諸關係之觀念論的、非卡爾的理解中，對於生產諸關係和生產諸力之辯證法關聯的不理解中，生產關係和賣買關係——魯平說是政治

(註)甚至在波爾什維克雜誌編輯部宣告了論爭的總決算以後，愛諾太葉夫斯基還提出新的論文，發表於社會主義經濟上，這是更加深了他自己的修正卡爾主義的。他繼續主張：「政治經濟學，不僅處理價值的生產過程，同時也處理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和一切社會構成的生產過程。政治經濟學不僅研究生產關係，同時也研究客觀的和主觀的生產諸力之發展。」愛諾太葉夫斯基著：理論經濟學的論爭問題，社會主義經濟雜誌一九三〇年，第一冊——第二冊。愛諾太葉夫斯基的論文，在已經決定了的政治經濟學論爭上，是貢獻給成爲對象的諸問題的。波爾什維克雜誌編輯部所承認的同志米留定和波里林的論文，對於這些問題已給了明確的解答，取得了最大多數的卡爾主義經濟學者的擁護。關於已經解決了的諸問題，現在要再同愛諾太葉夫斯基開展論戰，未免太無謂了。雖然是這樣，但是社會主義經濟雜誌編輯部，還在給該論文的註釋上，聲明着「關於這些問題，在本雜誌上裁斷。」波爾什維克雜誌編輯部，曾經指摘了以登載米留定和波里林的論文，論爭便算結束（波爾什維克雜誌第一號六三頁）。反而現在社會主義經濟雜誌編輯部，又在自己的雜誌上審議這個論爭問題，這實在是有點滑稽。

經濟學的真正對象——的混同中。

奧大利卡爾主義的特徵，便是把流通看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決定關係。在這裏，魯平跌入了奧大利卡爾主義的懷裏。在奧大利卡爾主義者看來，流通，變成了所謂『通過流通的社會化』這種機會主義理論之基礎。本質上，貢獻這種理論根據的著作，便是練涅爾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

練涅爾說：「流。通。過。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高立法者和裁判官，說得更真。確。點，其中包含着社會化的問題之實體。在流。通。過。程，才實現了價值和剩餘價值；在流。通。過。程，才把價值和剩餘價值分配於經濟代理人之間；流。通。過。程，才是決定全經濟主體的命運的最高法庭。」（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二九〇頁）扼要的說，從練涅爾看來，布爾喬亞社會的決定契機，是流通和交換，而不是生產。在這裏，理論上產生如下的結論：即不是拿生產當做『社會化』的出發點，而是拿流。通。過。程當做『社會化』——但（若依機會主義者的意見）一定會叫布爾喬亞滿

足的——的出發點。他說：「我們必須靈活地運用、和意識的徹底的實施資本主義經濟的諸方法，亦即很快的打倒所有者的機能，給與某種物質的滿足，而把所有者驅逐於流通之外的諸方法——換句話說，就是已經成案了而且給與着的諸方法。——」（練涅爾著：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三一九頁）「這樣，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推進到新的道路上。」（註）

（註）前書三二二頁。對於生產和流通的相互關係的曲解，誘導到對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演進的非卡爾理論上去。這在布哈林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到，他展開了通過蘇聯的流通的社會主義建設之「獨特的」理論——成了右傾理論的基礎——他說：「我們用不着以破壞農民經濟為基礎的打倒農民經濟的方法，而要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即是由於使農民和我們聯繫起來，而且從經濟上，把他們誘導進依存於國家和各機關的協同組合，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生產。我們不是直接通過生產過程，而是通過流通過程，即是通過協同組合而達到社會主義。」（布哈林著對反對派的經濟立場之批判一七頁）「隨着農民經濟通過流通過程，而逐漸向社會主義的生產發展，階級的界限，在共產社會完全消滅，也就日漸趨於消滅。」（前書二三頁）

這種理論的政治意義，是很明顯的。那就是說，要消滅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只須通過流過程就行了。『通過流過程的社會主義化』的理論之理論基礎，便是把交換誇張做資本主義生產的決定契機。這點，也是魯平的全部理論的特徵。

魯平從交換過程的檢討上來觀察卡爾價值說的任務，他說：「對於交換過程、交換過程的社會形態、交換過程和商品社會生產的關聯等等的檢討，實在是卡爾價值學說的對象。」（註）在魯平看來，交換問題，構成爲特殊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契機。魯平又說：「從人與人的無數生產諸關係當中，卡爾處理了

（註一）魯平著：卡爾價值學說綱要三頁。卡爾主張：「理論經濟學的檢討，須要從流過程移行到生產過程，這樣，近代的政治經濟學，才能成爲真正的科學。」如果拿魯平的主張和卡爾的主張相比較，那麼，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魯平的理解和卡爾的理解是怎樣的，就可以

判明了。

特徵着近代商品——資本主義生產諸關係的特殊生產諸關係之一環。那就是商品生產者間的交換的生產關係、及基於它而長成的資本家和勞動者間、資本家和地主間的『階級的』生產諸關係。在物質生產力的某一發展階段上產生出來的人類生產關係的這種典型，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註二）從這裏，最露骨地表現出爲魯平觀念論的根本毒害的生產關係和買賣關係的混同、及生產諸關係解消於交換諸關係中。——交換關係，在魯平看來是政治經濟學的唯一對象。——這是引導魯平達到對生產關係之純觀念論的理解去的，在這裏，我們不得不格外強調的一樁事實，便是他基於這個理論，展開了關於生產和交換的相互關係之非

（註二）魯平著西歐的近代經濟學者一八八——一八九頁。魯平的徒弟德波林，借用魯平所引證的

文句：「這些一切，全都正確」（！）德波林不留心魯平以引用號來掩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而在其中隱藏了自己的孟靈維克本質。（反駁經濟學上的機械論的傾向）波里林，李

昂吉葉夫校閱，論文集一二九頁）。

卡爾主義的表象。

依照魯平的意見，生產方式不是決定交換方式的，相反，交換才是『對直接生產的面部』蓋上了『一定的烙印』的。（魯平著卡爾價值學說綱要一八頁）

照魯平的理解，交換不是當做商品經濟——其中，一切生產關係由交換關係為媒介（機械論者不理解這個道理）——的生產諸關係之必要的運動契機來考察，而是當做本來以社會形式給與生產、在生產上蓋着『烙印』的外部過程來考察；拿魯平這種理解跟卡爾的說明相對比，就可以明白魯平是怎樣違反了卡爾學說的真精神。卡爾說：「一般地，生產物的交換形式，照應着生產形式。隨着後者的變革，前者也變革。因此我們知道：在社會的歷史發展的進行上，生產物的交換方式，是受着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哲學之貧困）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跟其他一切生產方式同樣，其中包含着那運動之特殊的、獨有的、媒介的機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因為是當作這種媒介契機看的

生產諸要素之獨特的分配底緣故，所以包含着商品交換、和從勞動者階級讓渡給資本家階級的勞動力販賣的。勞動力發生作用，而且因為當作資本的生產力，在直接生產過程中跟屬於資本家的生產手段相結合，所以必需具有商品交換，即勞動力販賣這個條件。但是如果以交換為根據，像魯平那樣主張生產方式是由交換方式來決定的，那就是大大的錯誤，而且在事實上也剛剛相反。卡爾說：「在資本家對工資勞動者的關係上，為貨幣關係的購買者對販賣者的關係，成了生產本身一個內在的關係。然而，這個內在的關係，是以生產的社會性質為基礎的，而不是以交換方式為基礎的。或者說後者是由前者所產生的。但是，如果不從生產方式的性質中去探求照應它的交換方式之基礎，而採取相反的探求方法的話，那就是適合了被生意經迷住的布爾喬亞眼光的行爲。」（資本論第二卷第四章）

所以，在交換「對直接生產的面部，蓋着一定烙印」的場合，魯平公然和卡爾相抗爭，因為卡爾認為：「不從生產方式的性質中去探求照應生產方式的交換

方式之基礎，而採取相反的探求方法，這是適應布爾喬亞眼光的行爲。」卡爾隨時隨地都加強的說：「在其一切的契機上，交換直接包含於生產之中，否則就是受生產所決定。」（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郭譯二十四頁）理解了交換方式是由生產方式來決定，才能理解在所有的歷史條件之下，商業雖然引起舊生產方式的解體，但却未必招至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事實。因為無論什麼新生產方式代替舊生產方式，並不是依存於商業，而是依存於舊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在古代世界，受了商業和商人資本發展的影響，結果，通常招來了奴隸制經濟，有時，由於出發點的不同，這個影響，却招來了從祇以生產生活資料爲目標的家長奴隸制轉化到以生產剩餘價值爲目標的奴隸所有制。反之，在近代世界，這種影響，招來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從這裏將得出結論：這些結果本身，是由商業資本發展以外的別種關係所決定的。」（資本論第二卷）

倘若照魯平所想像：由於交換形態本身的存在，而給與生產方式以獨特的特

徵；那麼，單純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質量差異，終於要變成動搖的了。在流通行爲上，資本不過呈現爲貨幣，而依交換行爲的形式來看，就連勞動力跟資本的交換（這是勞動力價值的實現），跟其他任意的信用販賣都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了。從外觀來考察，在交換的行爲上，貨幣只不過是支付手段而已。交換行爲受到自己的真正特徵的，只有當做資本運動的一個階段來看；曝露出資本之本性的，只是在那生產過程上。只有在生產過程，才表明當作商品來看的勞動力的特徵。勞動者和資本家的交換行爲，不是特徵資本主義的出發點，它受到自己的真正特徵的，只是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運動，當做一個必要的契機罷了。要這樣、才能證明了交換依着各種的生產方式，而具備各種的形態。要這樣才是正確的。因此，爲了明白區分那種種交換形態起見，就不能不檢討它怎樣表現着特定的生產方式的性質？流通過程的諸要素連同自己一起帶着什麼形態進市場去？魯平的反卡爾主義就在於恰如他所想像那樣：只有在交換行爲上，那些要素（物）

才獲得社會的形態。但是，如果『物』在交換行為以前，不帶有從特定的生產方式而生的獨特的形態，那麼，交換行為便獲得『買賣契約』這種形式抽象性質，而失掉了一定生產關係的實現這種獨特的性質了。魯平性質，同時想在其交換概念的矛盾，就是由於他將交換放在生產的上位，於是給交換附與純形式中找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獨特歷史特殊性的特徵。如果站在魯平的觀點，就不能區別出偶然交換過剩物的種族自然經濟和單純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

這種觀點，乃是保持康德拉契葉夫陣地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者——他們認為蘇維埃經濟是依從價值法則的商品——貨幣經濟，亦即資本主義。——見地的觀念親近者。例如：反革命的經濟學者尤洛科斯基，談到普羅列塔利亞國家時，他說：「在這個國家裏面，所不能夠做到的，只有一樁事情，那就是免除『價值法則』的影響。『價值法則』，變化各種姿態，纏繞着國營企業的支配者。」（尤洛夫

斯基著：論蘇維埃經濟制度的計劃及均衡問題，財政通報第十二號（一九二六年）

企圖恢復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運動者們，一方面繼續無謂的努力去描寫下面的事態：說在蘇維埃經濟之下，沒有任何達到社會主義的進行，或者說普羅列塔利亞不能把他們從慈愛深長的資本主義諸關係的權力底下解放出來；一方面又死咬定蘇維埃經濟的市場關係。魯平的觀念，由於籠統的將單純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包攝於『商品||貨幣經濟』的一個定義裏面，變成了康德拉契葉夫式的理論的養成所。在魯平看來，歷史上的各種的生產方式，都是一樣的東西。因為他是從交換的存在中，去找尋生產方式的特徵的。而這交換却又是一切社會構造裏面都有的。存在於不同的生產方式之下的交換，不能同一看待，這是絕對正確的。但是魯平却不理解這點。例如他忽視了單純商品經濟條件的交換和資本主義的交換的質量差異。他率直地說：「在資本主義之下的交換的數量比率的法則，較之單純商品流通，形式略有不同；不過，從

交換的質量方面看來，却是一樣的；由於分析質量方面，才能理解數量比率。……」（魯平著卡爾價值學說綱要一〇四頁）魯平得出了下面那種奇怪的主張：說在單純商品經濟之下的交換和在資本主義之下的交換，質的方面，是同一的；兩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間的交換，和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交換，質的方面也是同一的。這無異是抹煞了布爾喬亞生產方式的根本矛盾，無異是抹煞了資本家對勞動者間的矛盾，然而這個矛盾，正是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形式上平等的關係背後，潛伏着實質上的不平等（註一）。所以魯平的主張，顯然是替資本家辯護的。

卡爾說：「資本家和勞動者的交換關係，不過是屬於流通過程的單純的外觀——和內容本身無關係的，只是淆混現實意義的單純的形式罷了。勞動力的不斷的賣買，只是形式；不給與等價而不斷地為資本家所掠奪的對象化的他人勞動之一部，跟他人更多量的活勞動經常地相交換，這才是它的內容。」（資本論第一

資本主義的流通內所形成的諸關係，外觀上，是和單純經濟同樣的。後者最爲特徵的商品所有者間的『平等』，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也可以看到。「在那裏，勞動者當做自己的商品勞動力的賣手而出現，資本家當做勞動力的買手而出現。」（資本論第二卷）商品所有者，以等價互相交換。勞動者和資本家的交換，倘若撇開生產過程來看，還是等價物的交換。因爲勞動者，是靠着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實現勞動力的價值的。

在資本論裏面，卡爾都是以勞動力的價值完全實現爲前提的。爲了明瞭地證實實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諸條件，由資本家掠奪剩餘價值之必然性和合法則

（註一）卡爾說：「倘若當作交換本身來看，交換是單純的流通。但是，交換乃是布爾喬亞社會的表
面，在那表面上，流通是從它發生的，在交換主體之間，除了形式的外觀的以外，便不知什麼
麼差異的更深的諸過程消失了。那就是基於自由、平等、『勞動』的所有的王國。」（政治經

性起見，方法論上的這種方法，乃是必要的。對於布爾喬亞教授瓦格涅爾的恭維，卡爾加以批判說道：「那個糊塗的傢伙，（指瓦格涅爾）誣我像下面那樣的主張：『由勞動者所生產的剩餘價值，是以不正當的方法，裝進資本家和企業家的腰包裏去的。』但是，我是主張恰恰相反的事實的：商品生產，從某一點上講，是必然要變成『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而且，在那裏，倘若依從支配的法則的話，那麼，『剩餘價值』就不是歸屬於勞動者的，而是歸屬於資本家的。」（卡爾著：論瓦格涅爾的著作，馬恩文庫第五卷四〇七頁）卡爾再三指示出下面的事實：即其他各種商品，無論比較高些或低些實現它的價值，如果平均起來，如果暫時不管那由於資本競爭而起的商品流通的變態的話，都是按照價值來出賣的；反之，特殊商品的勞動力，通常是要比價值較低些出賣的。」

他又說：「當決定勞動力的價值的時候，我是假定了勞動力的價值是真正得了全部支付的。但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前書）

表面上一看，勞動者賣不賣他的勞動力，這好像是自由的，因為在交換的行動上，他是當作自己的商品勞動力的『自由』所有者，而跟資本家相對立着。可是「在實際上，當勞動者將自己賣給資本家之前，已經是隸屬於資本了的。他的經濟的不自由，是受着自己販賣的周期更新、立於他們之上而經營的人們的變動、勞動的市場價格的漲落等所制約所蒙蔽的。」（資本論第一卷）這種不自由，是受下面的事實，來決定的：就是勞動者無論進入或退出生產過程，始終都是當作勞動力的所有者而出現；反之，資本家在生產過程的結果，不僅當作前貸資本價值的所有者、而且當作剩餘價值的所有者而出現。落在資本家腰包裹的剩餘價值，是說明交換的真實性質的，是說明在那裏顯現出的等價物轉化為不等價的量的。假如沒有這種轉化、等價物交換不是勞資關係的一時契機、支付勞動力的貨幣不是可變資本的話，那麼，資本主義的生產就會不能存在了。資本家購買勞動力，而在生產過程中去消費它。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不僅是具有再生產勞動

力的價值的能力，而且還具有再生產若干過剩分——即剩餘價值的能力。」如果一經以考察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去代替考察各個資本家和各個勞動者的話，那麼，從貨幣形態而發生的錯覺，就會馬上消失了。資本家階級，以貨幣的形式，不斷地交付對於由勞動者所生產而為資本家所佔有的生產物的一定部分之收據。勞動者，在他們自己的生產物當中，祇受取寫在那收據上的部分，其實是規矩矩的把那收據奉還了資本家的。生產物的商品形態和商品的貨幣形態，隱蔽了這交換的真實性質。」（資本論第一卷）勞動者，當做出賣勞動力的代價而收受貨幣，這是掩蔽交換的真實性質的。雖然是這樣，如果還有人認為資本主義的交換跟單純商品經濟的交換，在質的方面，沒有什麼分別的話，那就是用失掉了內容的各種『社會形態』的分類，去代替現實的諸關係之分析的。

倘若不理解生產方式決定交換方式，就始終不能理解蘇維埃經濟。在蘇維埃經濟中，交換不是還存在嗎？可是我們的『交換』，跟資本主義的交換，本質上

是不同的。因為蘇維埃經濟，生產方式不同的緣故（普羅列塔利亞國家企業，『澈底的社會主義企業』，在農村中，長成着的集體農場的社會主義形態）。倘若把交換看做經濟關係的決定契機，那就不能在一切質的規定性和特殊性上來理解蘇維埃經濟了。

由於主張交換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決定契機，這契機是政治經濟學的唯一對象，因而魯平企圖把政治經濟學的任務還元於生產關係的物質性質和物質『社會形態』的研究。物質的『社會形態』的作用，被魯平過分地重視和誇張了。他說：「卡爾的體系，是研究（照應許多複雜生產關係的）許多複雜物質的『經濟形態』或者『形態規定性』的。」（魯平著卡爾價值學說綱要四八頁——旁點由引用者附加）對於政治經濟學問題的這種理解，在魯平，是關連着他的意見「物質是『設定』和『創造』人類生產關係」的（註）。他忽視了物的這種能力，——『設定』和『創造』流通當事者間的關係。——是生產諸關係的單純的實現形式，

同時又是社會生產過程中生產諸關係往後作用的條件。可是同志畢索諾夫又看漏了後者的關係，他說：「卡爾決不是以研究『物質的社會形態』爲任務的。如我們所知，他是說明（當做商品 || 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的獨特的特徵看的）生產諸關

（註）在第二版卡爾價值學說綱要裏面，魯平到處敘述着：物質只是創造生產關係。在第三版裏面（一五、十六、二十各頁），屢屢以「實現」這用語來代替「創造」這用語了（好像這些用語是一的一樣）。在使用舊用語「設定」「創造」的地方，大部分是講一定的人們生產關係的（第三版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各頁）。這種情形不是無心的訂正，而是想使自己的見解暗地里脫離極不堅固的障地，這是誰都可以看透的，同時也是卡爾價值學說綱要第三版的一般特徵。但不幸得很，這個嘗試全盤失敗了。失敗的地方，就是因爲在第三版裏面，一方，元來的舊「定式化」和新「定式化」並存着；他方，用盡了接近政治經濟學上的諸問題的方法，而本質上，魯平依然停留在舊的障地。但是，魯平却成功了一樁事情，那就是叫他自己的某些信徒去信奉相反的見解。例如德波林在對第三版的評論中，鄭重聲明：「魯平把定式化的曖昧，在第三版裏完全訂正了。」

係的對象發現形態的。」（魯平主義乎卡爾主義乎一一頁）同志畢索諾夫錯了。問題並不歸着於：商品經濟，生產諸關係在物質上發現出來這一點。商品社會的經濟構造的特質，在於生產關係的運動只有通過物質運動才能實現這一點。「物」不單顯現出人的生產關係，而且還實現人的生產關係。「物」價值」的運動，是商品經濟的生產諸關係的運動條件。我們敢問畢索諾夫：如果不同時研究商品經濟生產關係的運動形態，怎麼能夠研究這經濟的生產形態呢？同志畢索諾夫對於「物質的社會形態」的研究之爭辯，就是證明他關於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物」的作用，抱着不明確的表象。

同志畢索諾夫，因為不理解「物」的作用，所以過低評價了關於商品拜物教的卡爾的理論。而魯平，對於「物」的「社會形態」的迷惑，則在關於商品拜物教理論所佔卡爾體系的地位之錯誤表象中表現出來。

比如說，魯平在卡爾價值學說綱要裏面講到：「人們當作價值的追補、當

作和卡爾的基本論題有並行的興味的文藝批判附錄來敘述商品拜物教的理論。造成這種理解的原因，乃是卡爾自身，乃是因爲卡爾在資本論第一章的外形上的排列，把拜物教的理論放在最後一節。但是外形上的這種排列，並非照應卡爾思想的內部秩序和關聯的。拜物教的理論，乃是卡爾經濟學的全體系，特別是他的價值論的根抵。「(前書一三頁)「它成了商品經濟的生產關係之一般理論，成了經濟學的入門。」(前書一四頁)第一，魯平主張：造成誤解商品拜物教理論的意義的原因，是卡爾本身。——由於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的材料之外形排列上，把商品拜物教理論放在最後一節。——那是十分錯誤的。顯然魯平認爲科學敘述上的素材的排列，是任由研究者的意思如何而定的。這才是達到觀念論的解卡爾方法的起重機。若據恩格斯的證明：卡爾的方法，存在於科學的發展，同時，存在於『科學的特殊的固有的關聯。』第二，把『商品拜物教的理論』，改變爲達到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學的』導線，改變爲特殊的『社會學方法』，這也

是不正確的。魯平稱之爲『社會學方法』的，——在物質的諸範疇背後的人類生產關係的卡爾解釋。——決不是特殊的方法，而是把唯物辯證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中的必然結果。

比較魯平稍爲早一點，同志布哈林在轉形期經濟學裏寫過下面的話：「卡爾在商品拜物教的理論上，給了達到政治經濟學的光輝的社會學導論。」伊里奇在評註上，用警語『嗚呼』來嘲笑他。

第六章 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及分析與綜合的統一

當卡爾着手研究布爾喬亞社會的運動法則時，一方面，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之下，「凡庸的布爾喬亞理性駑馬，在分隔本質與現象、原因與結果的鴻溝之前，茫然地停立着。」（恩格斯著論卡爾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支配着科學；他方面，出現了『思辨形態』的黑格爾辯證法。辯證法雖被黑格爾的觀念所歪曲，但，只有辯證法才能作政治經濟學上卡爾的方法論的出發點。伊里奇說：「在其發展的形態，卡爾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適用於政治經濟學。」（伊里奇遺稿集第九卷一九七頁）

唯物辯證法，確是卡爾拿進政治經濟學裏面的新的東西。不理解這一點，却是一切修正主義者和『批判家』的特徵。最近有一位『卡爾批判家』牧斯，他和白

倫斯坦因相提攜了，但是，白倫斯坦因曾經說過：「卡爾不須靠黑格爾辯證法的幫助，也不拘有無辯證法，還是完成了所有偉大的事業。」（牧斯著反卡爾論，四九五頁）。

魯平却没有率直地表明這一點，而否認唯物辯證法是卡爾的研究方法之基礎，當作『社會的』方法來特徵卡爾的方法。他追隨了裴特里，認為卡爾和古典學派的不同，是把特殊的『社會觀點』放進了政治經濟學里去的。

魯平說：「抽象的方法，對於卡爾，是和包含李嘉圖在內的許多前驅者相共通的。但是，卡爾的獨特的功績，是把社會的方法——在物質的諸範疇之中，看出人類生產關係的表現——放進政治經濟學里面。（魯平著卡爾價值學說綱要，第三版、三六頁，旁點由引用者附加）我們在後頭，再給古典派經濟學的方法，就中李嘉圖的經濟學方法詳細地加以特徵罷。這里，爲了確證魯平跟卡爾的方法的正確特徵怎樣地離反起見，且拿魯平上面的話跟下面伊里奇的文意對比來看

罷，伊里奇說：「講到一切的著作（卡爾恩格斯的著作），焦點和所表明所熟慮的諸觀念的本質，用一句話來規定，那就是辯證法。拿唯物辯證法適用到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改造、自然科學、哲學、勞動階級的戰略及戰術，——這是卡爾恩格。思抱有最大關心的地方，這是他們放進最本質的東西的緣故，這是在革命思想的

（註）費爾希丁一類的修正主義者，雖然愛說卡爾恩格的辯證法適用於經濟學，但是把這種適用局限於諸範疇的論理的發展之領域，而不擴大到分析希爾喬亞社會之現實的，經濟的，階級的諸關係的領域，即是觀念論的解釋卡爾恩格的方法。

費爾希丁說：「卡爾恩格告訴我們，他把黑格爾的方法完全意識地放進了政治經濟學里面去，而方法的活用，在通常人們所尋求的地方是找不到的，這就是說，在現實階級矛盾的描寫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以普羅列塔利亞為担当者而目指生產諸力（生長於資本主義體制之中，任日益超越資本主義體制的）的獲得的社會必需的矛盾發現上，是找不到的。方法的活用，寧可是在邏輯概念的形成和敘述方法上，完成其獨特的邏輯作用。」（費爾希丁著卡爾恩格經濟學之歷史的準備，論集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問題，第一版二五三頁，傍點由引用者附加。）

歷。史。上。他。們。的。巨。步。躍。進。所。在。的。地。方。」（註）

卡爾剝去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外衣。依黑格爾的意思，現實世界不過是理念之簡單的外部現象而已，他以為世界的發展，便是理念的自己發展；於是自然及社會的發展，便變成了離開時空而存在於什麼地方的概念運動的結果。在這里，我們不想觸到黑格爾哲學體系的全貌，只揀要緊的來說，那就是要強調卡爾唯物論地改造了黑格爾的辯證法，闡明了辯證法的革命的意義，針對着階級鬥爭的實踐（註）。卡爾說：「我的辯證法方法，在根本上，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寧可正是相反的，照黑格爾的意見，思惟過程——他更把思惟過程叫做理

（註）「在其合理的形態，辯證法對於布爾喬亞及其空論的代辯者們，確是一個苦悶和恐怖。因為

辯證法在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時又包含着其否定、其必然滅亡的理解；在運動中，從其過渡方面去觀察一切生成的形態，是大無畏的，其本質上是批判的、鬥爭的。」（資本論第

二版序文）。

念，使它轉化爲獨立的主體——是現實世界的創造主，而現實世界，只不過是思惟過程的外部現象而已；反之，照我的意見，觀念世界的東西，不外是在人類頭腦中物質世界的東西的反映和轉化罷了。……在黑格爾，辯證法是用腦袋站立着的。我們要從神秘的外衣里面，找出那合理的核心，叫辯證法用脚跟站起來。」

（資本論第二版的序文）但是如果就從這里急急下結論，說卡爾只是從黑格爾的體系換了個出點，那是很大的錯誤，那是把卡爾恩格斯所施於黑格爾辯證法的工作性質看得太簡單了，那是誤解了工作的性質的。他們的工作，不僅改變體系的出發點，並且對黑格爾所處理過的諸範疇的全體再加以檢討。如果輕視唯物論地把握黑格爾的困難，那就是說對於卡爾辯證法的觀念論歪曲的危險性，作了過低的評價。

對於克服黑格爾辯證法之觀念論的、神秘的性質這種工作，伊里奇給與首要的意義，以這個領域內的卡恩之批判勞作爲模範，同時，認爲必須使這種工作更

加繼續發展。他說：「根據卡爾應用過唯物論地改造了的黑格爾辯證法，我們能夠而且一定得研究黑格爾的辯證法。我們從各方面研究辯證法，從黑格爾的主要著作抽取精華登載在雜誌上，由於引用經濟、政治諸關係的領域內的辯證法實例——這樣的實例，在現代的歷史，特別是帝國主義階段的階級鬥爭，是非常豐富的——而能夠又不能不唯物論地解釋黑格爾的精華。」（伊里奇給卡爾主義旗幟之下雜誌編輯部的信。傍點由引用者附加）

我們的哲學指導部，對於普及黑格爾的研究和他的辯證法、以及他的辯證法是卡爾主義的準備意義的這樁工作，雖然收了很大的效果，但是因為對伊里奇的哲學遺產一般的意義，作了過低的評價，連帶到對伊里奇的這些指示，也作了過低的評價，以至誘導到許多本質的錯誤。

違反伊里奇的指示，「完全無批判地處理黑格爾論理學體系的許多契機。黑格爾在抽象的、觀念論的、神秘的形式上描寫了辯證法運動的一般形相，這一事

實，就是叫我們對黑格爾的遺產，不能採取無批判的態度。指導部的同志就錯在這個地方，他們儘依舊樣沒有加工，只以形式條件——即必須唯物論的理解它——去處理黑格爾的論綱。關於此點，伊里奇曾有原則的遺言：『在該種形式上，不能不適用黑格爾論理學。不能不當作該種東西來處理。必須從理念的神秘中淨化出來，而從那裏頭提取論理學的（認識論的）色調。這是更重大的工作。』

（伊里奇遺稿集十二卷，二〇五頁）指導部的錯誤，便是忽視了伊里奇遺教的結果。哲學指導部的人們的許多著作中，顯然現出形式主義的潮流，這樣，唯物辯證法的鑽研，便變成了跟具體內容沒有什麼關聯的諸範疇的遊戲了。」（註）

辯證法論者和黑格爾主義者不同，辯證法論者，從自然和歷史——客觀實在一般——它自身便是辯證法地發展這一事實上出發。人類思惟和科學的辯證法發展，反映着客觀的辯證法，因此是認識實在的有力工具。恩格思說：「我們主觀的思惟和客觀的世界是根據同一的法則這件事實，有着絕大的力量來支配我們一

切的理論思惟。」（自然辯證法）我們主觀的思惟和客觀的世界所根據的辯證法的法則，不論其一切多樣性，仍可以還元為若干基礎命題。自然辯證法里面有一篇當作科學看的辯證法的一般性質，恩格斯在那里規定了辯證法的三大法則：一、從量到質的變化及其逆轉的法則；二、對立的相互滲透的法則；三、否定的

（註）哲學及自然科學赤色教授學院細胞編輯部決議。載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三〇年，第一九——

二〇號。這種形式主義思潮，從許多違背卡伊主義的一般通念的論綱中表現出來，例如：

「把黑格爾的觀念辯證法和唯物辯證法同一看待（加列夫），認為黑格爾描繪了一切運動形態之包括的實在的畫面（德波林），這些都是不充分批判黑格爾的觀念論、黑格爾的體系的。又如德波林再三強調他的主張：雖說有了卡恩伊的諸勞作，但是到目前為止，在唯物辯證法的鑽研上，還是以黑格爾的論理學為出發點（德波林），這也是錯誤的；又如辯證法的諸範疇，不是客觀世界的發展法則之簡單的反映，相反，它們是帶來了給客觀的物質世界關聯和合法則性的（德波林），這種論斷所生出的特徵和辯證法的正確的定義，相提並論，也是錯誤的。

否定的法則。這三個法則互相不可分地連繫着。

如果想理解由量到質的變化及其逆轉，理解新的發生和舊的滅亡，說明變化和飛躍的真因，那就得當作對立的相互滲透的結果來考察一切的運動。伊里奇說：「倘要簡單的給辯證法下定義，就不妨說辯證法是研究對立的統一的科學。

從這點，可以把握住辯證法的核心。」（伊里奇遺稿集第九卷二七七頁）或者像他在別的地方講過的一樣：「統一的分裂和認識它的矛盾諸部分……是辯證法的真髓（如果可以叫做根本特徵的話，那就是『本質』之一，是根本特徵之一）。」（伊里奇著關於辯證法的問題全集第十三卷）

只有能夠認識統一東西的分裂，然後才能在事物中曝露出它的發展的源泉和爲其推進力的矛盾。是的，辯證法是研究自然、歷史、思维的普遍發展法則的科學。唯物辯證法要求思惟意識地配合着爲研究對象的現實之運動法則，唯物辯證法要求思惟着具體的現實，要求思惟是具體的現實的。真理是具體的，真理的規

準是實踐，像這樣才是辯證法唯物論的骨髓。當批判費爾巴哈的時候，卡爾加強的說：「人類的思惟是否能夠把握真理呢？這個問題，不是什麼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類必須在實踐上來證明真理，即是必須在實踐上來證明他的思惟的現實性和力量以及其現世性。如果離開了實踐，那麼思惟是現實的呢或非現實的呢？這種爭辨，就是純粹煩瑣哲學的問題。」（費爾巴哈論綱）

因此，辯證法唯物論，要求思惟不能離開實踐。它不僅要求對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的抽象認識，並且要求這種統一的實踐實現。卡爾曾經指摘過：「從來一切唯物論者（費爾巴哈也在內），有一個最主要的毛病，就是僅在客體或觀照的狀態之下來把握對象、現實性和感性，而沒有當作感性的、人類的活動、和實踐來把握對象，沒有主觀地來把握對象。因此，在活動方面，就顯得是抽象地、反唯物論地從觀念論——不消說是否認現實的、感性的活動——展開的。」卡爾澈底的敷衍了這批判的方針之後，得出了個結論：「哲學者祇可能各種各樣的解釋世

界，但是主要的，還是在於變革世界。」（費兒巴哈論綱）（註）

鬥爭的理論離開了實踐，實際便是墮入了非鬥爭的理論。在科學的研究上，卡伊主義者必須常常牢記住伊里奇給與唯物辯證法認識的諸規定。他批判布哈林的形而上學的、形式論理學的見解時，有過這樣的話：「要了解對象，就須把握

（註）德波林把費爾巴哈當作辯證法唯物論者史的唯物論者來粉飾，他主張：「費爾巴哈的時代還未到來，」「卡爾主義是費爾巴哈主義的繼續。」他又主張：費爾巴哈是從卡爾的精神來解決關於實踐問題的，他的這些主張，跟卡爾本人的費爾巴哈觀是根本不同的。在德波林，費爾巴哈主義的那些要素。不祇是簡單的理論要素，它一方面表現於不充理解「階級的、戰鬥的——批判的活動」的作用和意義上，他方面表現於哲學指導部輕視現實的生活、現實的運動和普羅列塔利亞的實踐鬥爭的諸問題，而偏重書齋資料、公式和引用上。

赤色教授學院細胞編輯部的決議，已經正確的指出：「跟魯平派作論爭，證實了逃避過渡期及帝國主義的國際恐慌的諸問題之理論研究，這是怎樣地含有社會階級意義。」（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三〇年第一九——二〇號）。

和研究對象的一切方面、一切關聯及媒介。也許我們不能夠完全達到這一步罷；但是，全面性的要求會警戒我們，而把我們從錯誤和硬化中拯救出來啊，這是第一點。第二點，辯證法的邏輯，要求我們從其發展上、從其『自身的運動』上（黑格爾慣說的）、從其變化上來把握對象。……第三點，人類的一切實踐，必須當作真理的規準、或者當作爲人類必需的東西和對象的關聯的實際規定者、而進入對象的完全的『規定』之中。第四點，辯證法的邏輯，指示着『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永遠是具體的。』（這話蒲列汗諾夫常愛掛在口邊）」（一九二一年二月，再論工會現狀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錯誤）

真理的具體性，不容許把辯證法的諸法則當做一成不變的公式，亦即不容許當做能夠適合於一切發展的典型，而應用於一切的領域。真理的具體性，祇是由於辯證法的普遍法則在各個新領域內被具體化，在過程自身中被發現，一切特殊的、固有的東西把特定的領域豐富化，由於它固有的辯證法；這樣，才能被保

證。辯證法要求接近活的現實，要求依據科學的檢討而把握它的一切多樣性。但是辯證法真理的具體性，決不是指這個真理橫在現象的表面上；辯證法是找出發展過程的『真實內容』的；然而，這『真實內容』的現象形態，並不和它的本質相一致。卡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事物的現象形態和本質直接相一致的話，那麼，一切科學都是多餘的了。」科學的任務，在乎找出為具體世界的一切多樣性發展根抵的內部合則性（註）。「具體物之所以是具體的緣故，就因為它是許多規

（註）伊里奇常常警告，當研究社會現象的時候，不能夠將這些關係的「內容」「本質」「根本的傾向」跟現象形態相替換。「鬥爭的形式可以變化，但是鬥爭的本質，那階級內容，却不可以變化。如果拿關於鬥爭內容的問題去和關於鬥爭的形式問題相替換，那就是轉落到詭辯論者的作用。」伊里奇另外還講過這樣的幾句話：「像農民分化這種根本的傾向和它對地方條件的依存的形式，全然是兩樣的事情。」不同的歷史的情勢，只是把同一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現象形態變形。」

定的總括，它是多樣的統一。」（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二六頁）科學不是簡單地記述和模寫這種多樣性，而是從其內部合則的、必然的關聯上，把具體的事物再生產——由於在『思惟的頭腦』中，改造直接的觀察和直觀的所得——於思惟之中的。

在思惟上再生產具體的事物，亦即找出現實所有的現象的必然性，找出那些諸現象的內部紐帶和互相別約性，這在根本上，和將活的現實的所有多樣還元於乾枯的、無內容的圖式抽象——波格達諾夫、布哈林等機械論者，却以這個為科學的最高任務——是截然不同的。

依照波格達諾夫的意見，說明現實，就是『給與那現象的傾向和合法則性的抽象圖式』（註），這種任務，是跟卡爾主義正相反對的。對於卡爾主義極有害的、枯死的圖式主義，被他高抬到科學認識的最高原理。卡爾寫給恩格思的信說：「把許多『場合』歸納於一個普遍的原理，黑格爾決不會叫它做辯證法的。」

卡爾主義所教示的，跟波格達諾夫和布哈林的說法完全不同。科學的目標，在乎從現實的一切多面性及特殊性上、從現實的一切關聯上、從過渡及矛盾上來了解現實。在統一的背後，不能看漏了差別。只有形而上學才會想迴避矛盾，或則集中其注意於世界的實體性的統一性，或則集中其注意於具體現象界的多樣性。基於這個，相應着這個，於是在他們中間，或則生長着枯死的圖式主義，或則生長着將實在的科學認識置換為簡單的記述的傾向。

然而，以現象的簡單的記述，是不能理解現象的發展法則的。我們要知道的實在，是各種各樣現象的許多色彩的畫面，這些現象相互間的關聯，在質的方面，是多種多樣的。真實的歷史現實，有各樣的社會構成的現象相交錯着。它的

（註）斯狄巴諾夫也有類乎波格達諾夫的「組織學」的論綱。他說：「有機生命過程的科學認識的任務，在乎找出這過程中由物理學及化學所定立的一般的、相對地單純的合則性。」（卡爾主義

基礎的發展法則，被次要的事實層——屬從於前者，但不是從那基礎的發展法則直接流出的——所混淆了。

如果把所有的現象通通羅列起來，那麼，我們就會昏迷於矛盾與撞着之中了啊！所以爲要認識所有具體現實起見，必須首先把具體現實，從一切偶然的、次要的——混入具體現實的發展進行中，但非和這發展不可分地聯繫着的——淨化出來。比方，拿資本主義經濟來說罷，許多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們，有時候很能記述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經驗事實，他們中間的某一些學者，進步到能夠記述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關係，但是他們不。理。解。這。些。諸。關。係。之。內。在。的。發。展。法。則；因爲他們不能夠從極複雜的資本主義的現實中抽出勞資關係及其發展，不能夠理解這些諸關係的特殊性及其歷史固有性。

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表面、如果能夠找出資本家和勞動者、資本家和資本家、資本家和地主的關係，那麼，也就能夠找出資本家和獨立的單純商品生產者的關

係，資本家和剛剛切斷與自然經濟聯繫的臍帶的生產者的關係。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純粹的現象，純粹的資本主義也是不存在的。伊里奇說：「無論在自然界、在社會上，都。沒。有。也。不。能。有。純。粹。的。現。象，這是卡爾的辯證法所指示的。辯證法告訴我們：所謂純粹的概念本身，已經是表示在一切複雜上不能無遺漏地把握對象的人類認識之某種偏狹性和片面性的。在世界上沒有、也不能有『純粹』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常是混進了封建制度和小市民制其他什麼的。」（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一六〇頁）

就算在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可以看到舊經濟構成的遺物以變形或歪曲的形態殘存於資本主義的軀殼內的。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是混雜着非資本主義社會構成之遺物的。

爲要認知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在具體的資本主義現象中，必須先淘汰去那些防礙認識——從純粹的形態上，從其內在的、必然的關聯上——資本主義的諸

現象(註)。卡爾說：「在理論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法則，以在純粹的形態上展開的爲前提；但是在現實上，只不過是近似的罷了。如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

(註) 從現象的內在性發生出來的，辯證法唯物論就叫它做必然性。辯證法唯物論分別開爲外在必然性的偶然性與爲內在必然的必然性——根據諸事象的必然的系列的——「其根據不在於本身之內，而在於本身之外」的(黑格爾語)，我們叫它偶然性。

機械論者，特別是布哈林，那時所不能充分說明的，乃是一切的偶然性。布哈林曾經建議過應該從社會科學中除去偶然性的概念。依辯證法唯物論來說，「偶然，因爲它是偶然的，所以有根據；但是，同時正因爲它是偶然的，所以又沒有什麼根據。」(恩格思自然辯證法) 偶然的東西，因爲有根據，所以不是偶然的，其根據在於各種事象的必然系列之外，所以又是偶然的。因此，卡爾當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抽取必然的東西，即從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的本性發生的東西；而撇開一切偶然的東西，即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中沒有根據的，植根於前資本主義關係的。這樣一來，卡爾達到了舊的東西屬於新的東西，過去的社會構成的遺物混進資本主義發展的進路的特殊形式之最完全的、最具體的認識。

發展，或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殘滓而不純淨和複雜化越少，那麼，這種近似的程度也就越高。」（資本論第三卷）因此，爲要了解資本主義的現實發展的法則，必須先得認識『純粹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從副次的、異種的現象淨化出來的情形上去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發展，這是卡爾在資本論里面已經實行了的。

然而我們不能用人工來再現『純粹的資本主義』，仿效我們在實驗室做化學實驗一樣，除掉次要的現象，而使社會現象在我們的眼底經過，那是辦不到的，所以必須應用抽象力來代替實驗裝置。「當研究經濟形態的時候，顯微鏡、化學試藥都沒得用場，必須用抽象力去代替它們。」（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文）（註）

（註）請參照下面伊里奇所講的話：「當解決某種複雜紛紜的社會經濟問題時，初步的規則，需要

採取一種辦法，從複雜化的一切外部影響及關係解放出那最特徵的問題來，先把它解決、結束了；然後將那些外部複雜的關係順次探入而逐個解決它。」（伊里奇全集第九卷三三二頁）

當分析具體的、直接給與的資本主義現實的時候，卡爾借助於抽象力，抽出了『純粹資本主義』。但是，單單抽象力仍是不夠的。現代布爾喬亞社會的特徵，就是社會關係的複雜和紛亂；在資本主義的關係的表面上所出現的一切現象，比如價格、利潤、利息、地租、工資等等，攪作一團的湧出於我們眼前。

資本主義特有的那些一切現象，我們不能把它們一列並排着，一下子來研究；也不能先從複雜的——以簡單的東西為基礎而發展來的——諸關係來着手。

卡爾說：「從現實的前提之實在的東西、具體的東西開始，比方，政治經濟學，從為全社會生產行為之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好像是個正確的辦法，但是仔細一想，就會知道它的錯誤。如果我們把構成人口の階級除外時，人口就只是一個抽象物。又如我們不把階級所依存的各種要素，比如工銀勞動、資本等等認識清楚，則這些階級也只是一句空文。加之工銀勞動、資本等是以交換、分業、價格等等為前提的。例如：假定沒有工銀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資本也就不能

存在。所以如果我們以人口開始，那就是一個總體的混亂的表象。我們要依着更精密的規定，分析的、逐漸的求得單純的概念；從被表象的具體的東西愈益向着微妙的捨象的東西而進行，終於達到最簡單的諸規定。從那里又回轉頭來，結果會復歸到人口。」（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郭譯二五——二六頁）

卡爾從那表現『具體總體的各方面』的諸範疇之一切多樣性中，提取了那表現布爾喬亞社會之最普遍關係的最單純的、抽象的範疇。

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大量的』、最『日常的』的關係，乃是商品生產者間的關係——在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態上、價值形態上表現出來。——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中，卡爾說過這樣的話：「對於布爾喬亞社會，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態或商品的價值形態，乃是經濟的細胞形態。從沒有素養的人們看來，會以為分析它只是徒然往牛角尖里攢；是的，當作那種分析的時候，是要把細微的區別作為問題的，它在顯微鏡的解剖學上成為問題的完全一樣。」分析的本

質，就是具體的、直接的東西被還元於最單純的東西。黑格爾曾有幾句給分析加以特徵的話說：「這種作業，是分解一種具體的對象，分離其差別，得出抽象的普遍性的形態；或者是以具體的東西爲『根據』，由於捨象認爲非本質的東西的特殊性，而抽出某種具體的普遍性——即『屬』或『力』或『法則』，這便是分析的方法。」（黑格爾小論理學第二二七節）伊里奇評黑格爾對於分析方法的规定稱許爲關於分析方法的光輝的规定」（遺稿集第九卷三六一頁）。如果把分析的任務扼要來講，那就是在個別的東西中找出普遍的東西，在直接的所與的背後，找出現象的法則。但是分析的成果，並不是空虛的抽象，也不是失掉質量规定的性的普遍，而是『具體的普遍』、『某種有规定的普遍性』（黑格爾小論理學二二八節）。黑格爾說：「不是簡單的抽象普遍，而是包含特殊性之豐富性的普遍。」伊里奇引用他的話句，而在空白上補註着『參照資本論』，並且稱讚爲「光輝的公式」。『不祇是抽象的普遍，並且是在本身之中具現着特殊的、個別的

豐富之普遍……』是頂瓜瓜的。」（伊里奇遺稿集第九卷三三——三四頁）

當引用黑格爾對於『普遍』的理解時，伊里奇補註着『參照資本論』，那是當然的。卡爾正是當作這種『普遍』、當作布爾喬亞社會的經濟細胞而分析地提取了生產物的商品形態。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態或價值形態，在其還未展開的形式中即包藏着資本主義諸關係之具體多樣的一切豐富性（註）。在關於辯證法的問題中，伊里奇說過這樣的幾句話：「卡爾的資本論，首先分析布爾喬亞（商品）社會之最單純的、日常的、根本的、頂大量的、不知行過幾十億次的關係——亦即商品交換。依着分析，在這最單純的現象（布爾喬亞社會的『細胞』）中解明了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因而一切矛盾的萌芽）。然後先前的敘述，就從頭至尾

（註）略察諾夫說：「做出發點的，不是抽象的經濟範疇，而是爲布爾喬亞財富的基礎細胞、原基形態的商品。卡爾是從所有具體歷史的一定社會史的刻印的現象開始的。」（略察諾夫著政治

的顯示出這些諸矛盾及這社會各部分的總和的發展（成長和運動）。」

最單純的範疇，因為是活的具體全體之一面的關係，要把它替換社會生產之極多樣的形態所固有的一般規定，那是不對的。無論在那一時代的社會生產，都具有若干共通的表徵和規定。卡爾說：「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的；但是，它在使得共通的東西真正顯現、固定、因而免至我們反復的限度內，是一個合理的抽象。不過那些諸規定對於認識具體事物是不很充分的。」卡爾更以下面的幾句話來作結束：「概括起來說，共通於一切生產階段、由思惟當作一般性的東西而固定着的諸規定，原是有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之一般諸條件，只是不能把握現實的歷史生產階段的一些抽象契機罷了。」（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八頁）從其諸規定的一切多樣性上、從其一切特殊性上來認識現實，便是科學的任務；因此科學的認識，不以抽出一般的規定和抽象的範疇為滿足，而要在其諸關係的一切豐富性上，在其一切質量規定性上把現實再現於思惟之中的。所以失掉了質量規定

性的抽象關係，不能作從單純到複雜的上升的始點，爲這始點的根柢的東西，應該是『一個有規定的普遍』（註）。

我們要以一種方法去尋究潛伏在最單純的關係中的合則性之發展，這種方法就是把新的諸要素逐漸引入研究範圍，因而把成爲研究出發點的具體物的一切多樣性再現於思惟中；我們的研究，循着商品經濟最單純的關係——商品交換——的諸矛盾之發展，就自然會走到商品與貨幣的商品分裂、貨幣向資本的轉化，再

（註）同志李昂契葉夫不理解這點。在他所著的小冊子勞動支出的法則中，談到「卡爾的方法的根柢的特徵，不是把質量相異的諸現象，機械地、片面地還元於普通的、普遍的法則那種單調而枯燥無味的抽象（這在他以前的人也可以做到的），而是從最簡單的抽象引出一切特殊性的實際現實之一切多樣性。」像這樣說法會得出下面的結論，即是說卡爾的方法之特徵，在於他從「單調而枯燥無味的抽象和普遍的法則」引出了實在世界的一切多樣性。但是，怎樣可以從「枯燥無味」的抽象引出實在世界的多樣性來呢？不消說，這在李昂契葉夫，依然是不解之謎。

走到榨取、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法則、生產價格、剩餘價值分裂爲各階級的所得、利潤、利息、地租等，這樣，由於分析地抽出最單純的諸關係，不是科學地認識現實的終點，而是出發點。卡爾說：「等到這些契機（分業、價值、貨幣等——引用者註）多少被抽象、被固定了之後，就從如像勞動、分業、慾望、交換價值那樣簡單的，上昇至國家、國民間的交換、世界市場那種政治經濟學體系，便開始了；這顯然是科學的正確方法。」（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二六頁）。從抽象到具體的這種上昇，便是綜合。

由於全面的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解明在價值中這種生產方式的運動法

（註）研究，是從具體總體之分析開始，敘述，是從依着分析而被抽象的最單純的東西開始，因此如像卡爾本人也說過的一樣，敘述的方法和分析的方不能不有形式上的差異。卡爾說：「研究，必須詳細搜集材料，分析材料的各種發展形態，找出那些形態間的內部紐帶；完成了這一步之後，才能適應地敘述現實的運動。」（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文）

則，所以在資本論里面，卡爾不是把資本主義現實的多樣性如像它顯現在現象的表面那樣再現出來，而是從其內在合則的關聯上再現出來的（註）。在市場上的物質運動的背後，隱藏着人們之間的諸關係，在物的交換的背後，隱藏着人們的勞動的交換。我們知道，價格早已不是當作供需關係的偶然的遊戲之結果而出現，它的變動，是依從生產價格的法則的。我們知道，工資、利潤、地租、勞動力、生產手段、土地等，不是生產諸要素的產物、而是由勞動從新形成的價值之合則諸部分。我們不能當作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正常進行的偶然破壞來考察恐慌，我們應該當作是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內部矛盾的必然合則形態來考察恐慌。只有分析與綜合的統一的辯證方法，才能給與從物的外表現象形態的背後洞察現象的本質之可能性。

對於理解抽象和具體的關係的問題，伊理奇曾作了下面的規定：「由於從具體上昇到抽象，因此思惟不是離開真理的，而是接近真理的。物質的抽象、自然

法則的抽象、價值的抽象等一切科學的（正確的、嚴正的、不是無條理的）抽象，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自然。從活的直觀到抽象的思惟、更從抽象的思惟到實踐——這樣，便是認識真理的、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路程。」（見伊里奇遺稿集第九卷一六六頁）

分析與綜合是互相限制的。辯證方法，「在其運動的每一步，都同時分析地綜合地作用着。」黑格爾的這個特徵，伊里奇讚美說『頂瓜瓜的。』（前書三八八頁）分析，是分開具體的現實，而抽出一般的最單純的範疇。綜合，是從那些最單純的諸關係，在其一切質的規定性及多樣性上，把具體現實再現於思惟之中。當作它自體而處理的分析，是粗陋的經驗論的方法；當作它自體而處理的綜合，是教理的及形而上學的合理主義的方法——是企圖以煩瑣的概念遊戲去置換客觀現實的認識方法。

不理解卡爾的辯證方法是分析與綜合的統一，都是機械論者的特徵，也是魯

「平一流觀念論者的特徵。機械論者想要把各種社會經濟構成的發展，還元於一般的、超歷史的法則；他們是想要在那里面找出政治經濟學的真髓來的。例如達蘇科夫斯基說：「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必須是把有生命的社會生產法則之特殊資本主義顯現形態，還元於那些諸法則本身；必須是靠着抽象分析的方法，而『顯現』被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諸形態所淆混、所掩蔽的經濟現實的內部構造。」（見卡爾主義的旗幟之下雜誌、一九二六年第六號）照他的意見，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就是把資本主義諸關係還元於一般法則——失掉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獨特的特殊性。——在這種任務之下，科學的認識方法，就陷入於抹殺這社會構成的一切質量規定性而片面地誇張的分析了。我們所見的布哈林的『勞動支出的法則』，恰恰是植根於這種方法論基礎之上的。

對於波格達諾夫一派把科學的研究僅限於分析，而魯平則強調了卡爾的辯證方法是綜合的方法，而把綜合的方法和對立起來。不理解分析與綜合的

內部關聯，至使魯平主張卡爾分析的結果不是綜合的出發點。這樣的歪曲辯證方法的兩個契機間的關係，爲要掩飾其背叛卡爾對於抽象勞動問題的理解，當做一種狡猾的手段，在魯平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魯平說：「如果必須從勞動中辯證法地抽出價值來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把勞動這一用語，解釋做從商品經濟所固有的一定社會形態上被認識的勞動。」

「如果我們講的是關於在生理上平等或是在社會上平等的勞動一般爲限，那麼，這種勞動就不形成價值。如果將任務限於純粹地分析地還元價值於勞動，那麼就會達到貧弱的其他的概念罷。」

「如果我們問一問：若把價值當作勞動生產物所給與的、造成的、無須特別說明社會的形態，而從那里出發，則這種價值可以還元於什麼勞動呢？大概我們會回答說：還元於平等的勞動吧。換句話說，價值只是從具有一定的社會形態的抽象勞動中辯證法地導出來的，但是價值向勞動的分析還元，是做當作社會上平

等的勞動一般之勞動性質的規定的，或者是做當作生理上平等的勞動之勞動性質的規定的。在資本論第一章第二節，卡爾依分析方法，把價值還元於勞動；他不涉及商品經濟勞動組織的社會形態的吟味，而強調當作生理上平等的勞動看的勞動性質。反之，在認為要從抽象勞動導出價值的地方，在抽象勞動的特徵上，他總是強調商品經濟勞動的社會形態。」（見魯平卡爾價值學說綱要第三版一六二——一六三頁）

魯平把分析方法和辯證方法對立起來，依照我們看是沒有道理的。分析不能跟辯證法對立，能夠跟綜合——兩者形成統一——對立。分析與綜合的統一，是卡爾「抽象」方法的基礎，是辯證方法的特徵，恩格思說：「思惟是把認識客體分解為諸要素，同樣，也是把共通諸要素互相結合為一個統一的。沒有分析也就沒有綜合。」（見反杜林論）

根據卡爾的方法去分析商品，結局，我們得出了『勞動一般』，即是在生理

意義上的人類勞動力支出。分析與綜合的統一，便以這個爲前提——即分析的成
果應該是綜合的出發點。

但是，如果依照魯平的意見，爲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成果的「勞動
一般」，是失掉了特殊歷史特徵了的。不消說：要求通過思惟而再現具體資本主
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是應該具有這種特徵的。

魯平想嘗試在辯證上的方法與分析的方法對立的中間找出一條逃道。於是他

(註)爲了預防誤解起見，這裏順便提一提這件故事：關於抽象勞動，觀念論者之流根據有名的文

句——「在商品價值的實體(原語的真義，應譯成「價值的對象性」)中，自然物材的一個原

子也不含有；」或者是「商品價值的實體(價值的對象性才是正確)純然具備社會的性質。」(資

本論第一卷)這文句是翻譯者曲解了卡爾原文的。德文 Wertgegenständlichkeit (價

值對象性)，原來是指價值存在的物質性質，價值存在的對象性，然而巴察洛夫和斯狄巴諾

夫的俄文譯本隨便翻成「價值的實體 Wertsubstanz」，因而歪曲了上述兩句話。詳見 X X

主義學院通第二十五號。

告訴我們：爲分析成果的『人類勞動力的支出』，應拋棄於政治經濟學之外，『沒有包含一個物質原子』（註）的抽象勞動，應當做『辯證方法』的出當點。這樣一來，魯平便認爲分析終點的『勞動一般』，不能是綜合的始點——『抽象勞動』——而要當作後者的『前提條件』相並列着。

魯平抹殺了綜合與分析的分離的價值，而漸次得出了抽象勞動的概念。實際上，『勞動一般』並不失去質的規定性，因爲成爲問題的，乃是在價值上當作被對象化的勞動看的、因而當作勞動的社會形態看的勞動之普遍性。

魯平體系的明顯的錯誤，表現於他對價值的形式和內容的解釋中。在卡爾價值學說綱要第二版，魯平是站在內容對於形式的超歷史性的見地上的。他說：「價值的內容，不是特徵着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殊性的。」（見卡爾價值學說綱要第二版八七頁）

在第三版里面，仍然沒有當作客觀的某種東西來考察價值內容的歷史性，而

當作依存於我們的認識方法如何、依存於我們的『見地』如何的特徵來考察價值內容的歷史性。他說：「由於從造成了的形式分析地進展到那內容，我們當作價值的內容，而找出了社會上平等化的勞動；但是，如果我們不是拿造成了的形式當作研究的始點去處理，而是拿內容本身（即勞動）——從那裏必然產生出形式（即價值）的——當作研究的始點去處理，也許會達到別的結論吧。爲要從被視爲內容的勞動過渡到當作形式看價值起見，我們必須認爲在商品經濟，勞動的觀念中，一定得包含着勞動所固有的社會形式，即是以抽象的普遍的勞動爲價值的內容。」（見前書第三版一三二頁、磅點由引用者附加）這樣，若依魯平的意見，就無異是說價值的內容本身，是繫於我們的見地和我們認識方法如何的，也就是依存於我們在分析與綜合這兩種『不同』的方法中選擇那個而定的。這顯然是墮入了主觀主義。魯平的觀念論也就在這是顯露出來了。至於卡爾主義的機械論曲解，也是殊途同歸的，我們可以舉出下面的事實來作證明：當時在討論兩種

方法的問題上，同志寬恩和魯平相提攜了，寬恩說：「卡爾把理論研究的方法，劃分爲分析的和綜合的，」又說：「魯平也跟我們一樣，劃分開兩種不同的方法。」（見寬恩經濟學教程第三版六七——六八頁）

像這樣，兩個極端相合致了。因爲觀念論者始終不能成爲辯證法論者，而機械論者則始終不能成爲唯物論者，所以得到這樣的結果，乃是當然的。

如果拆開分析與綜合，就一定會弄錯了辯證法的方向，一定會破壞了卡爾經濟理論的統一性，一定會打斷卡爾經濟學體系的有均衡的發展。唯物辯證法方法，始終都是統一的、一元的（全一的）、鬥爭的方法，它的力量與生命就在這里；它的發展是照應着普羅列塔利亞鬥爭實踐的理由，也就在這里；爲我們的時代最偉大的革命家，同時又是最偉大的辯證法論者的伊里奇，他之所以重視辯證法的意義，儘使得辯證法發展的成就遠過於同時代的一切人們（蒲列汗諾夫也在內）的理由，也就在這里。哲學指導部，由於過低評價了當作哲學者看的伊里奇

的這種作用，而犯了深刻的錯誤。同志史太林說得好：

「講到唯物論哲學，自從恩格斯起以至伊里奇止，科學上最新發明的一般化這種最重要的任務之執行，與及對卡爾主義者之間的反唯物論潮流作全面的批判，至聖的伊里奇從事這兩樁工作的事實，我們不能不視爲伊里奇貢獻於理論的意義之最鮮明的表現吧！恩格斯有兩句話說：『每有新的大發見，唯物論必採取新的姿態。』誰都知道，至聖的伊里奇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完成了這樁任務的；同時，誰也都知道，像口頭禪那樣嘲笑伊里奇『不介意』哲學的蒲列汗諾夫沒有決心向着這樁任務的執行認真地猛進的。」

第七章 卡爾經濟學體系之「邏輯的」與「歷史的」

乍看起來，卡爾體系的諸範疇之整然的發展，好像是從先驗前提——價值概念——的諸概念體系的純演繹展開似的。布爾喬亞的『批判家』們通常就是那樣『解釋』卡爾體系的。卡爾批駁其中的一人華格捏爾說：「我完全不是從『諸概念』出發的，因而不是從『價值的概念』出發的；所以後者的『分割』是沒有必要的。我從勞動生產物在近代社會所採取的最簡單的社會形態出發。這才是『商品』。」（卡爾著評華格捏爾著作，見卡恩文庫第五卷三九三頁）

這些『批判家』們，不理解卡爾方法的性質，而當作純主觀主義的成果來描寫卡爾的抽象範疇。若據喬姆堡特的話，「對於卡爾，價值不是經驗的事實，而是思惟的事實。」（見喬姆堡特著對卡爾經濟體系的批判——科學評論一八九八

年，第四冊四八四頁）若據最近的『批判家』牧斯的話，卡爾的抽象，「不是純知識分析的手段，而是被有了先驗哲學的頭腦的先入主所支配的理論家之工具。」

（見牧斯著反卡爾論一二頁）。

許多的『解說家』亦與『批判家』相雷同。例如魯平派的卡爾解說家克森，寫了一本叫卡爾資本論的辯證法構成的書，把政治經濟學諸範疇當作黑格爾的精神諸概念的自己發展來描寫。這位卡爾的解說家說道：「關於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這社會里，交換帶有貨幣的性質——的概念的發展和這社會本身的发展之一致，因此完全當作表面的東西而顯現出來。」（見卡爾資本論的辯證法構成一二頁）他提起這樣的問題簡直跟卡爾主義沒有半點關係的。

實際上，資本論的諸範疇乃是現實生產關係的理論表現；資本論的諸範疇的發展過程，是受着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諸關係之發展所決定的。卡爾的科學體系的展開與資本主義的內在的、合則的發展之一致，決不是表面的東西，

而是在現實及理論上的資本主義諸法則發展和現實發展的深刻的關聯上奠定了基礎的。講起來，要資本論的諸範疇，直接地精密地反映歷史發展和一切偶然性及曲線，也是辦不到的，那怕卡爾的理論是解明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及死滅的法則，它到底和經濟形態的歷史不是同一的東西。只有對於那種建立在實在是由思惟所創造而發生這個前提之上的觀念辯證法，才會說歷史發展和邏輯發展是沒有差異的。所以卡爾當批判黑格爾的時候，作了如下的指示：「然而從抽象的東西昇到具體的東西的那種方法，只不過是思惟要去據有具體的東西，思惟要在精神上再造出一個具體的東西的方法罷了。」（見郭譯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二六頁）

黑格爾陷入一種錯覺，以為範疇的邏輯發展，便是實在界的發生過程，於是把一切倒裝了。卡爾評黑格爾的法律哲學時，講過這樣的話：「他不是從對象展開他的思想的，他是根據自己完成的思惟（即在論理學的領域，完成自己的範圍

的思惟）而構成對象的。這個場合，不是以發展政治組織的具體觀念爲任務的，而是以使政治組織與抽象觀念發生關係，使前者成爲理念的發展史之一肢體爲任務的，那是明白的神祕化。」（見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德文版，全集，第一部第一卷四一五頁）黑格爾不是以在思惟上反映實在發展的具體過程爲任務，而是由純邏輯方法使概念和範疇交互發展爲任務。此際黑格爾陷於一種觀念論錯覺，認爲在歷史過程中實現觀念的發展。歷史解消於論理學之中，好像培蒂一樣布洛克爾斯狄斯被推進範疇的框子裏。黑格爾不理解「獨特對象的獨特論理學」，而想從實在強勉地湊集從他的論理概念產生的形式，白費氣力（見前書）。卡爾說過幾句挖苦黑格爾演說的話：「從黑格爾看來，業已經過的和尙在經過的一切東西，都恰恰是在他自己的理智中經過的東西。照這樣講起來，歷史的哲學，無非是哲學的歷史，無非是哲學本身的歷史。『依時間次序的歷史』就沒有了，有的，只是『在悟性中的一些觀念的繼續』。他確信由思想的運動構成世界，但

是，他只不過依照體系去重建、並且依絕對的方法去排列存在吾人頭腦中的思想罷了。」（見哲學之貧困第二章第一節）

當時蒲魯東試圖把黑格爾的觀念辯證法適用到政治經濟學上的諸範疇，結果，這些範疇不成其為生產諸關係之理論表現，反而化為強有力的空虛的抽象。蒲魯東的意見，經濟的現實，是應該屬從於諸範疇之發展的，反轉來就不對了。關於這點，卡爾作了如下的指摘：「經濟的諸範疇，不過是生產諸關係之理論表現及其抽象罷了。地道的哲學家蒲魯東先生把事物倒裝了，在現實的諸關係中，只看見那些蒲魯東先生所謂沈睡於『人類之非個人理性』之胸中的原則和範疇之化身。」（見前書同節）

蒲魯東把邏輯發展，和歷史發展同一看待，反之，一批布爾喬亞經濟學家，則由於陷入偏狹的歷史主義和否定理論的可能性，而以簡單的記載去代替理論的研究。在政治經濟學上，他們形成了『歷史學派』，以經濟現象的『歷史記載』

來代替了古典學派的演繹方法。從許多詳細的研究中，蒐集龐大的歷史、具體資料的這一學派的寶具們，給那些積載成山的無秩序的事實和數字壓死了。他們吃了這錯誤理論立場的虧，不知道應該怎樣去解明和把握所蒐集的資料。『歷史學派的無能是很顯然的，甚至布爾喬亞的一批代表者（像 Mengen, Marshall 等）也對他們施以猛烈的攻擊呢。

在特殊的形態上，可以看出同志斯狄巴諾夫也有由歷史記載來代替理論研究之見解。好像他對××主義學院的報告中，說由具體歷史路程來說明價值形態啦，說貨幣形態之謎，在於野蠻人的經濟之中啦，說資本之謎，在於其發生史之中啦，因此同志斯狄巴諾夫自然而然地把理論研究的一切任務歸着於各種形態的歷史交替過程之研究了。

這時，他把各種社會構成的研究放在同一平面上。他說：「現實資本主義的理論，必須深入到封建時代。因為在目前，封建時代還是可驚地滲透於現代資本

主義之中的。即是因為那個不是由資本主義產生的、而是資本主義當作自己的歷史前提的土地私有制，在今日還被保存着的緣故。」（見斯狄巴諾夫著何謂經濟學，××主義學院通報第十一冊二六六頁）其實在現實的資本主義可以找出前資本主義的經濟構成啦，必須從其發生上去認識各種現象啦，必須解明資本主義發生的合則性啦，這一類問題，現在已用不着再囑囑了。退一步來說，以那種見解，能夠無遺漏地認識為特殊經濟構成的資本主義嗎？以經濟形態的歷史能夠包括，政治經濟學嗎？從封建社會諸關係果真能夠說明和理解資本主義的土地私有嗎？卡爾主義答道：「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卡爾主義是要認識某一社會經濟構成及其諸關係之歷史特徵的，是要把各個社會經濟構成當作具有獨特的合則性的特殊質量來認識的。只有否定質量的客觀性的人，只有不理各歷史時代之特殊合則性的人，只有不理解研究社會經濟諸構成的伊里奇學說（註）的人，才能把理論經濟學還元於經濟諸形態的歷史。政治經濟學是歷史科學，這話早已無須多說了。

因為政治經濟學是處理歷史地變化的內容，研究相交代的生產之社會經濟形態，「給與研究社會經濟的不同體系和各體系根本特徵的基本概念的。」（見伊里奇全集第二十卷二〇頁）認識各社會經濟構成的作用的諸法則，並不歸着於這構成各個方面的發生的記載。這些諸法則，不是由經濟諸關係之發生自身所給與的，而是要基於某一社會經濟構成的某些關係所固有特殊運動才能解明的。

（註）伊里奇說：「現在——資本論出現以來——唯物史觀已經不是假說了，而是被科學地證實的命題。我們科學地說明某社會構成的機能和發展，即不是某國家、國民、甚至階級的生活，而是確實科學地說明社會構成的機能和發展，而沒有其他的嘗試為限；即跟歷史唯物論所做的完全一致地整理「適應的事實」，對某社會構成給與嚴密的科學說明，得出它的活的畫面；而沒有其他的嘗試為限；那麼，唯物史觀即是社會科學之別名。唯物論並不像米海洛夫斯基所想那樣：是歷史的『優越的科學把握』；而是唯一的科學把握。」（見何謂人民之友，旁點由引用者附加）在這裏伊里奇加強的說：成為問題的，恰是當作特殊的質量看的社會經濟構成之發展法則的說明。

當作對於邏輯發展和歷史發展的混同的反響，產生了以歷史發生順序的諸範疇的研究來代替邏輯繼續發展的傾向。

說到我們在思惟中再現具體事物這個問題，不是指依照表象及直觀直接給與我們那麼樣再現的，而是指在內部合則關聯上再現的。我們依以把具體的東西再現於思惟中的『諸範疇，作為前提應常牢記在我們的頭腦中』，這些諸範疇反映一定社會的存在形式、存續條件，而總是單獨反映各個側面。（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政治經濟學諸範疇，是表現某一社會經濟構成的獨特性的，因而它們在理論發展的順序，不是根據它們在歷史的連續或經濟理論的建設過程上被歷史地開展的順序來決定的，而是根據其表現的諸關係在社會生產體系內所佔的地位來決定的（註）。比如：『商業資本放款資本在歷史上是先於產業資本的。由於它們支配了前資本主義生產形態，而準備了產業資本的生長。但是等到後來，商業資本及放款資本反而隸屬於產業資本的運動了。在近代布爾喬亞社會，商業利潤和

利息，不過是由產業資本使用的勞動者所形成的剩餘價值之一部份罷了。所以近代社會的商業利潤和利息的運動法則，只有由於解明剩餘價值的祕密，即基於生產資本的分析才有可能。政治經濟學，在尚未分析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之前，研究利息和商業利潤，那是十分錯誤的。雖說在歷史上商業資本和放款資本先於產

(註) 在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評論中，思格思寫著下面的話：「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在方法採擇以後，還可以兩樣的——歷世的或邏輯的。——把它安排。在歷史上和在其文獻反映上同樣地發展，總是從簡單的關係進到複雜的關係的，因此經濟學的文獻史發展給了批判關於它而應進的門徑。若依這個方法，經濟諸範疇在大體上，是跟在論理發展上同樣的順序、是相續。這種形態，外表上可說有一種明確的長處，因為是探討現實的發展的。但是實際上，這種稱的安排只是僅僅幫助敘述通俗的。歷史的發展，往往採取飛躍及曲線而進行，不能不追尋其一切。結果不僅過多地採用無價值的資料，並且思想的進行也往往被切斷。加之，倘沒有布爾喬亞社會的歷史，則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斷不能敘述，然而爲了在這個領域以內前者經過多少整理過的資料全然沒有，工作是極其麻煩的。所以邏輯研究方法，才是唯一適當的方法。」

業資本，而且研究它們的理論也是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先蹤，但是卡爾仍然等到資本論第三卷才開始研究它們的諸形態。關於資本主義的地租也是同樣。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要基於分析為支配的經濟力的資本然後才能理解它。所以卡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中說了這樣的話：「把政治經濟學諸範疇，依照它們在歷史上是決定者的次序，逐一排列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也是錯誤的。它們的次序，甯可是由它們在近代布爾喬亞社會中相互間所有的關係而決定的，而這種關係，與那被認為自然次序的，或適應歷史發展之次序的，却正相反。在這里，應該研究的問題，不是經濟諸關係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之順序中所佔的地位……而是在近代布爾喬亞社會內部的它們的編配。」（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三六頁）可是這種編配原來是指什麼呢？為什麼在政治經濟學諸範疇的發展之順序表現出這種編配來呢？在資本論中，政治經濟學諸範疇的發展猶且反映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究竟在指什麼意義呢？

資本主義的種種生產關係，具現它的法則性的各發展階段，具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之發展及具體化的順次階段。無論在理論上、在歷史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法則性都是辯證法地發展的。相繼而起的各種形態，並不排除過去形態，並且把它及其法則性一同包含於自己之中。這樣，價值法則在生產價格中發生作用，生產價格在地租中發生作用。

「它——應指相繼而起的形態——在每一被規定的階段更提高過去的內容的總量，通過辯證法發展，不僅沒有失掉什麼東西、遺漏什麼東西在自己背後，並且把所獲得的一切東西包含於自己之中，更加豐富化、濃密化。」上面這一段黑格爾的意見，伊里奇把它引用而加以附註：『拿這一段話足以要約辯證法的一切，』乃是當然的。（見伊里奇遺稿集第十一卷，二七六頁）

政治經濟學首先從給與某一社會構造之極一般的法則的諸形態、諸關係開始，從那兒再進到直接統制這社會構造的現實運動的諸關係、諸形態、諸法則，

這是很自然的。政治經濟學，從商品及貨幣出發向着資本、資本的流通、利潤進行；從利潤出發向着生產價格、向着商業資本、土地所有的利息和地租等等進行。我們依以認識資本主義之法則的、隨着研究的進展而包羅相照應的諸範疇的順序，照應着那些法則歷史地發展的順序。例如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基於產業資本的發展，在某一階段上對於資本主義現實才是合則的。在產業資以前的商業資本，跟當做在發達的資本主義起作用的關係看的商業資本，是有着本質的差異的。

在一定階段上，商業資本由於被包含在產業資本的發展進行中，而隸屬於這種發展，隸屬於產業資本，獲得特殊形相，對於發達的資本主義是合則的。我們在政治經濟學中便是要研究這種合則的。不待說，這種研究是要基於產業資本並且要在分析之後才有可能。

政治經濟學諸範疇的發展，照應着歷史順序（表現於範疇的諸關係，對於發

達的資本主義轉化爲合則的形式的歷史順序)。當作決定發展的資本主義諸關係看的生產關係之歷史發展和邏輯發展，互相照應着。即使兩者的發展，跟照應的諸範疇——在政治經濟學中被固定的某一構成之發生、發展、死滅的法則——之歷史發展順序往往有好些不相一致的地方，還是不能抹消上面的事實。在資本主義初期發展階段盡過作用的諸關係，跟商品——貨幣流通的一般、根本法則不相一致；但是，這些諸關係，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情勢是盡過作用的，却不能當作某一社會生產階段的支配法則而完全地發展。所以我們在政治經濟學中是要把它們當作發展的資本主義之一般關係、當作抽象來研究，通過它而認知在資本主義的初期發展階段上盡過作用的諸法則和諸傾向。

機械論者們，就中同志寬恩和畢索諾夫，事實上否定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卡爾分析的單純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抽象，因此是錯誤的，他們不理解「當作生產物之一般形態看的商品，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抽象得來的」(註)。他方面資本

論的諸範疇的順序，是依着它在近代布爾喬亞社會所佔的地位來決定的，魯平一派從這樁事實出發，下了欺騙的結論，說諸範疇的邏輯發展和布爾喬亞社會的發展之間沒有內部關聯。

在給先頭講過的克森的觀念論勞作的序文中，魯平說：『著者綿密地探討從概到概念之辯證法的過渡。』（見魯平著卡爾價值說綱要五頁）這種『綿密的探討』，爲的是想要反對卡爾主義而作如下證明的：即是「在關於商品生產者社會的觀念的發展和這社會本身的發展相一致，如果存在的話，照先前屢次指摘過，只全然是具着表面的性質的。」（見克森著卡爾資本論的辯證法構成一二一頁）依照克森的意見：關於社會的觀念的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之間，找不出內部關

（註）見卡爾著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三卷、六四頁。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裏面，卡爾分析商品經濟「一般」。但是這種分析，在他看來，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般形態之分析罷了。（這件事實的看法，表現於資本一般裏面。）

聯；這樣，概念成了脫離現實本身的發展而獨立地發展。這種觀念論的見解，便是魯平稱之爲對於『從概念到概念之辯證法過渡』的綿密探討。魯平從這種見解出發，得出下面的結論：說卡爾在資本論第一卷開頭所展開的諸範疇，只是簡單的邏輯抽象，而不是照應資本主義發生之歷史過程的。他主張單純商品經濟只是資本主義之簡單的抽象，決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階段。魯平有過這樣的幾句話：「從勞動價值和單純商品經濟到生產價格和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是爲了要理解爲具體物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那是理論的抽象，而不是從單純商品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之歷史過渡的描寫。」（見卡爾價值學說綱要第三版，二七七頁）他使政治經濟學諸範疇之邏輯發展和資本主義發生之歷史過程絕對地對立起來。他形式論理學地認定：單純商品經濟，要嗎，是資本主義的抽象；要嗎，是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而不容有第三者存在。魯平不理解下面這樁事實：即邏輯處理方法，「實際上，不外是被剝去其歷史形態和紛亂的偶然性的歷史的東

西。從歷史開始的地方思惟也非開始不可，於是思惟往後的發展，便不外是一種鏡像，然而，是相應現實歷史過程本身所啓示的諸法則而被補整的鏡像，從其充分成熟的、典型的發展點，能夠看出一切的契機。」（見恩格思著卡爾政治經濟學批判之評論）商品是資本之最一般的形態，這件事是相應着單純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的。魯平不理解：價值不祇是生產價格的邏輯前提，並且又是歷史前提。

卡爾說：「商品按照價值、或大致按照價值來交換，這是對應着比較以生產價格來交換的更低級的一個階段的。對於後者的場合，必需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某種階段。……因此，價格和價格運動受着價值法則所支配這點姑置勿論，只認定商品的價值不但在理論上先於生產價格，並且在歷史上也是先於生產價格，這是完全得當的。而且就生產手段屬於勞動者所有的場合的諸狀態而論，也說得過。而這種狀態不問古代與近代，凡是在握有土地的自耕農和手工業者之間都可

以看到。」（見資本論第三卷第十章）價值之所以是生產價格之歷史前提的理由，就是因為在發展的資本主義以前，生產手段屬於勞動者握有的經濟關係實際上已經存在了的原故。

跟魯平剛剛相反，同志寬恩從單純商品經濟在歷史上先於資本主義這一事實出發，下了荒謬的定論：——單純商品經濟當作具有特殊法則的獨立社會經濟構成而存在，這特殊的法則，非在特殊的科學中來研究不可。在新經濟學方法論一書裏面，他說：「交換經濟有兩種基本的典型：一是基於交換關係而成立的，而是沒有勞動的榨取關係的單純商品經濟；二是以交換關係和榨取關係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的經濟構造，單靠研究交換關係一般的科學，不能夠透澈說明，必需有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特殊科學，那便是政治經濟學。」（見寬恩著新經濟學方法論）

在這裏不能不指摘的事實，就是：第一，像同志寬恩那樣使交換的分析與資

本主義榨取的分析對立起來，這是不行的。須知發展的商品交換，須知也包含着勞動力和資本的交換。所以當分析『交換』的時候不可忽視了資本主義的榨取。這種分析，必然的會引導我們達到在商品生產的某一發展階段上必然發生的資本主義。第二，爲要認識單純商品經濟的發展法則和資本主義而造出兩種科學，那是不行的，我們不可忘記：單純商品經濟是由其內部發展法則而長成轉化爲資本主義的呀！伊里奇說的好：「資本主義不是對於人民秩序的矛盾，而是其最相近的直接的繼續。」（見何謂人民之友）對於這點的不理解，就是指無視潛在單純商品經濟的資本主義之根柢，結果必至於過低估量了蘇聯小商品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經路之危險性。在這種觀念之下，就會不分好歹地拋棄了跟小商品經濟的布爾喬亞傾向作鬪爭這一問題，即是會放棄了爲着改造中農而作積極鬪爭這一任務。但是，另一方面，小商品經濟也有改造爲社會主義基調的可能性，因爲獨立小生產者還不是資本家。如果我們把單純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完全等同看待，那麼，

我們就會不能說明：在一定的社會諸條件之下，卡爾所指摘的農業上的小生產可能走非資本主義進化的方向之可能性啊（見卡恩文庫第一冊，卡爾給維拉·沙斯立支的信）。在蘇聯，以普羅列塔利亞指導，社會主義工業、土地、運輸、銀行的國有化，外國貿易的獨佔等等的形式，造成了這些諸條件。根據蘇聯經濟的

（註）關於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的方法論根柢的問題，到現在，我們經濟學的文獻還未曾加以根本檢討。布爾什維克雜誌編輯部，當總決算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間的論爭時，寫着下面的話，完全是對的：「關於理論經濟學諸問題的論爭，隔離開實踐和活的現實，在兩個營陣都沒有拿托洛斯基主義——它的孟雪維克觀念，爲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在世界普羅的整個革命鬥爭上的是極大危險之一——當做問題這一點上看出來。」關於蘇聯的小商品分野和社會主義分野的發展之相互關聯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的表象，對於計劃與自然成長、計劃統制與價值法則之鬥爭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的見解之機械論性質是很顯然的。但是沒有分析他們對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相互關聯的見解，而只是不放心以這些契機無遺漏地特徵托洛斯基主義。關於這個問題，待以後再來研究。

這種基礎槓桿，集團農場建設，全面的集團農場化，通過當作階級看的富農的清算，普羅列塔利亞國家把單純商品生產者的經濟發展誘導向社會主義的方向。

如果不理解單純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就會延至無視潛在小商品經濟的資本主義根柢。他方面，如果把單純商品生產者看得和資本家一樣，那就會導向托洛斯基主義，導向否定在小農民經濟佔優勢的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性。

第八章 均衡理論與卡爾的經濟學理論

到了最近，均衡理論廣大地普及於經濟學者之間了。採取反對的觀點的雙方論客，都把均衡理論當作辯證法唯物論提起了。在理論體系上，不但旗幟鮮明的機械論者（如波格達諾夫、布哈林等）是從均衡理論出發，就連魯平及其信徒們，在經濟學研究上也以某種形式堅持着這種理論（註）。波格達諾夫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教程第二版的序文裏寫着下面幾句話，不是沒有原由。他說：「我喜歡能夠這樣斷言：在我以前的諸勞作所敘述的，在我的著作所確立的若干理論觀念，在我們的經濟學文獻中更被擴大和被適用；特別是對於當作生產之統制者看的勞動價值學說，再生產的理論和市場的理論的均衡原理，能夠這樣斷言。」（見波格達諾夫、斯狄巴諾夫合著的經濟學教程第二卷第四版六頁）

對價值理論和恐慌理論之『均衡原理』的適用，究竟在那裏？這個問題讓我們到後面再看，目前要緊的是先知道『均衡原理』。布哈林是這個理論的徹底的信徒，他爲着擁護這個理論起見，舉出了下面的論證：「第一、這個理論是說明辯證法之物質根柢的；第二、這個理論是辯證方法之理論的、體系的敘述，並且是辯證方法之理論的、體系的基础；第三、這個理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自己證

（註）照魯平的意見：科學研究的任務在於把均衡和分業（無論這個形態採取什麼樣相）的法則精確

地定式化（見卡爾價值學說綱要第三版二五二頁）。他把政治經濟學諸法則當作均衡的諸法

則而加以定式化，說「價值法則就是商品社會的均衡法則」（見前書七八頁）。同志列昂契葉夫

也說述同樣的意見：「若依卡爾的課題，價值法則就是商品生產社會的均衡法則。」（見列昂

契葉夫著卡爾的資本主義理論的諸問題）至於畢諾夫則認爲：「均衡的假定，乃是整個理

論的前提。」（見經濟學的諸問題）其他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但是，只舉出了這些，已經

充分的顯示出：均衡論在參加論爭的種種立場的學者間，甚至在相反的兩個營陣的經濟學者

間，都是很廣播着。

明，即這理論使得世界觀脫去目的論的臭味——不可避免地要跟立脚於『精神』之自己發展的黑格爾的定式化相聯繫。——這個理論還容許以觀察物質形態之攪亂的場合，代替『發展』進化和簡單進化。因此，這個理論，乃是從運動的物質體系諸法則之更一般的觀念論諸要素中被淨化出來的定式化。」（註）

概括起來說，依照同志布哈林的意見，均衡理論便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敘述。而以這種說明，如下的描出辯證方法：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均呈現為『互相鬥爭、衝突的諸力』之結果。在互相鬥爭的各種力量均等的場合，它們就互相抵住，於是「現出靜止和平衡狀態。我們在自然界及社會上所看見的均衡，既不是絕對的均衡，也不是不動的均衡；它是可動的均衡，是鬥爭，矛盾。即作用於

（註）布哈林說：「卡爾和恩格斯事實上把辯證法從神密的幕內解放出來。即在作自然及社會的各種領域之研究時，唯物論地應用了辯證方法。在這裏，要討論的問題，是關於這個方法之理論的——（體系的）敘述及它的相同的理論的——（體系的）基礎。但，它是由均衡理論所

給與的。」（見史的唯物論三六二頁）

各種方向的諸力——這些諸力是制約着運動的——之敵對」。若說到這過程的形態，可以分爲：「第一、均衡狀態，第二、均衡的攪亂，第三、在新基礎上的均衡恢復。」黑格爾把最初的均衡狀態叫做正；均衡的攪亂叫做反，亦即對立；第三、把新基礎上的均衡恢復叫做合——在新基礎上矛盾和解的綜合狀態。——無論石塊、生物、人類社會、其他一切，我們都可以把它看做某種全一的东西和體系。一種體系跟爲其『環境』的其他諸現象保持一定的關聯而存在着。體系和環境間的相互關聯，有三種主要典型：第一、是『安定均衡』，這時，環境和體系的矛盾『以同樣的數量比率而不絕地被再生產出來』；第二、是具有正的符合的『可動均衡』，均衡『造成於新的基礎上』，而意味着『體系的發展』，環境和體系的矛盾，『是數量的差異』；第三、是『具有負的符合底可動均衡』，新均衡造成於『低級基礎』之上（見前書六一——六三頁）。社會和環境之間，除了生產諸力的運動上表現的外部諸矛盾以外，「還有內部諸矛盾。它是許許多

多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間的矛盾。」（前書二二九——二三〇頁）而「體系的內部構成（內部均衡），相應着存在於體系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如何，必然地要起變化。體系和環境的關係，是決定的數量。」（前書六七頁）鼎鼎大名的均衡理論的智囊，結局便歸結到這裏。

布哈林，把均衡理論叫做辯證法的物質根柢。對於辯證法的這樣的概念，並不是新鮮的。很早以前，杜林已經把辯證法矛盾解釋成『互相抗爭的各種力量之拮抗了』。他以『互相抗爭的各種力之拮抗』去替代辯證法，曾被恩格思極峻烈地擊破了（註）。關於杜林怎樣影響布哈林的體系這件事，這裏我們不想多談；我們要說的是，波格達諾夫才是布哈林解釋自然及社會的哲學教父。同志布哈林的均衡理論——被稱爲從神秘形態中解放出辯證法的——實在是從波格達諾夫那裏借過來的。他們的見解，同出於一個淵源，這只消由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論和波格達諾夫的活的經驗哲學中，各摘錄一段對照來看，就立刻可以明白了。

布哈林

世界上存在着走不同方向的諸力。只有特別的場合爲限，它們在某一瞬間互相保持均衡，在這時候，便現出安定狀態；亦即它們的現實鬥爭，變成了潛伏的。但是如果其中的一力發生了變化，立刻就曝露內部矛盾，生出均衡的攪亂。可是等到一瞬間保持新的均衡時，它——新的均衡——就在新的基礎上，亦即在各種力的別樣的結合之下被保持着了。於是我們觀察這過程的形態，就可以看到：第一、均衡狀態，第二、均衡的攪亂，第三、在新基礎上的均衡恢復。

（見史的唯物論七五頁）

波格達諾夫

再回想由辯證法最初規定的相對立的各種力的鬥爭而進行的組織過程罷。假定這過程是有個什麼開始的話，那麼，在這開始以前，參加這過程的兩種對立的力之鬥爭還未曾有，在這點上，就有了什麼一種均衡。又假定這過程在某處終結，那麼，該二力的鬥爭，這時即便消失了，在這點上，無疑的，又應有什麼一種新的均衡出現。那末，在這裏，就存有一切真理了。即是從均衡開始，經過攪亂均衡的二力之鬥爭，再達到新的均衡。

（見活的經驗哲學國立出版所，一九二〇年版，一九七頁。）

總之，依照均衡論的說法，辯證法的真髓在於：將一切運動形態，還元爲走反對方向的質量上。一樣的外力作用這點。如果將一切還元爲走反對方向的諸力之鬥爭，那就變成了：將質量規定的物質，還原爲無差別的好量了。辯證法要求認識各種運動形態的質量特殊性，要求認識爲這特殊發展的推進契機之內部諸矛盾的特殊性。『均衡理論』的真髓，却在於：拔去這個特殊性，把一切多樣的運動形態，還原於抽象的、形而上的機械論公式。——走反對方向而『鬥爭』的二力之均衡，均衡的攪亂，均衡狀態的恢復。——機械論者想找出一切運動的普遍法則。但是實際上，因爲跟辯證法絕緣，所以他們完全不能認識特殊的運動形態。

同志布哈林，在史的唯物論中所講的，絕不是新的意見，他的見解和波格達諾夫的見解全然一致的，這點，看過上面那段對照，想已一目瞭然了。波格達諾夫的方法論，不但支配着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論，並且還支配着他的經濟學上的各種勞作。在給轉形期經濟學的評註中，伊里奇到處強調了布哈林的方法論和波格

達諾夫的『組織』理論之連繫。

不理解質量的客觀性，——這是機械世界觀最顯著的特徵。——至使他們將發展解釋做沒有飛躍的，沒有連續的中斷的，只是簡單的增大及減少。「發展（進化），有兩個基本的（或兩個可能的，或在歷史上所見的）概念。就是一當做反復看的、當做增大及減少看的發展；（二）當做對立的統一（統一的東西，向互相排斥的對立之分裂及它們中間的相互連系）看的發展。前者是枯死的、貧弱的、乾燥無味的，後者是有生命的。只有後者才能給與解釋萬物的自己運動之關鍵，才能給與解釋『飛躍』、連續的『中斷』、『向對立的轉化』、舊的死滅和新的發生之關鍵。」（見伊里奇著關於辯證法的問題）

（註）恩格斯說：「杜林氏以『世界及其本質的定有的一切行動之一切根本形態』，絕對不能弄出什麼積極的東西來。實在已經把黑格爾的本質論降低到這樣一種愚蠢論調：不是在矛盾中運動的諸力，而在相反方向中運動的諸力；避免這種熟語的一切應用，確是他的最上策。」（反

杜林論）

爲所有運動出發點的契機，不是走反對方向的各種力的鬥爭，而是對立的辯證法統一。所謂認識過程的意義，就是指從其『自己運動』上，從其自發展上，來認識這過程。辯證法唯物論，把發展看做事物之內部的、內在於事物中的諸矛盾運動的結果，因此，是究明『差別的內在發生』的；反之，在歪曲卡爾主義的機械論看來，事物的變化只是攪亂均衡狀態的外部衝動之結果。

同志布哈林，把均衡狀態解釋成這樣的意義：「當作它自體看的體系，即不加外力的體系，其原有狀態不能發生變化，這種狀態，便是均衡狀態。」他和波格達諾夫同樣：成爲實在的決定契機的，不是運動的契機，而是靜止的契機。如像布哈林的口頭禪所謂『可動的』均衡，也不是改變他的理論之反辯證法性質的；因爲他把『可動性』看做一時的均衡攪亂之故。在布哈林的概念中，『可動性』，只有由外部衝動才能說明；因爲均衡，倘若是相反二力的抵住之結果，那麼，只有由外部衝動，乃至像波格達諾夫所謂『世界要素的本來的差異』，才能引起均

衡攪亂的。辯證法唯物論就不這樣，它把發展看做運動和均衡的統一（註），均衡

（註）「講到運動及均衡，均衡是分不開運動的。比如拿天體的運動來說罷：在均衡中可以相對的看出運動，在運動中，又可以相對的看出均衡。一切各別的相對運動，即在運動的某天體上的各個小物體的一切個別運動，是相對靜止，以至均衡的傾向的。要是沒有相對的靜止，就會沒有發展。物體相對靜止的可能性，一時均衡狀態的可能性，乃是物質的，因而又是生命的分化之本質條件。太陽這一星體，完全沒有個別的物質的均衡，只不過有當做全關塊來看的均衡而已。就算是有個別的物質的均衡的話，那也是微乎不足道的，而且還要受表面上的密度之極不均等所制約呢。太陽的表面上，是恆常的運動和擾亂、熱力的分解。在月球上，是完全沒有相對運動的，是完全的均衡——死神支配着一樣的（月——否定性）。在地球上，運動分化為運動和均衡的交替。個別的運動顯示均衡的傾向，但是總體的運動却揚棄個別的均衡……。最後，在活的有機體中，我們看到：最小自微細部分，大而至於器官的一切東西無間斷的運動，它在平常的生活時期，顯現為有機體全體的恆常均衡，而且是常常運動着的。亦即運動和均衡的活的統一。一切的均衡只不過是相對的，一時的罷了。」見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

只是運動的一契機。恩格斯說：「一切的均衡，一切的靜止，完全是相對的，只不過是對於那個這個一定的運動形態才有意義。」（反杜林論）均衡，是相對的、一時的。個別的運動，趨向於安定，總體的運動，不絕地打倒安定。『均衡的攪亂』，不單是外部衝動的結果，同時又是自身運動的結果。所以，認識對象這句話，就是說：要究明其發展的內部法則，要從其自身運動上來認識發展。

當研究近代資本主義的時候，卡爾分析了這一生產方式之內部運動法則，解明了制約其發展及死滅的資本主義之內部矛盾。找出這一社會經濟構成的運動法則，這是政治經濟學的任務。然而機械論者，却固執着相反的意見。他們不理解均衡和運動的辯證法關聯，他們把科學的任務，在於探究均衡的法則（註）。

如果拿卡爾在資本論的序文裏所講的話：「本書的窮極目的，在於找出近代社會的經濟運動法則，」跟同志布哈林的主張：「找出均衡法則，乃是理論經濟學的根本問題。」（見布哈林轉形期經濟學）兩相對比起來，那末，機械論方法

論是和卡爾主義分家便會一目瞭然了。

跟這個相對應，從卡爾看來，價值法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法則，

(註) 機械論方法論，引導到這樣的結果：均衡法則和運動法則的絕對對立，體系的存在法則和體系的死滅法則的絕對對立。這種錯誤的論定，在同志李昂契葉夫的判斷中，極其明瞭地表現着：「以認識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發生、存續及死滅的法則為任務的理論經濟學，決不局限於把說明資本主義之靜態的理論諸法則的體系定式化。它給與資本主義之存續的諸法則，同時給與其發生發展死滅的諸法則。」(見李昂契葉夫，傅米里尼茲卡雅合著過渡期經濟學大綱三一頁) 這樣地把資本主義的存續諸法則跟它的死滅諸法則對立起來，這是和卡爾主義完全無關的。價值法則，不但是資本主義的存續法則，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的死滅的法則。「分析，便是要從最簡單的現象之中(布爾喬亞細胞之中，價值形態之中，)找出近代社會的一切諸矛盾(及一切諸矛盾的萌芽)。然後，先前的敘述，給我們指示出：這些矛盾及這一社會從始到終的各部分總和之發展、(成長、運動)。」(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 在卡爾學說中，商品的諸矛盾和價值形態的發展之分析，引導我們進到貨幣、資本、榨取關係、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它是終久要走到打破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階級鬥爭之法則。

按照價值的交換（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的諸條件之下，是根據生產價格的交換，）對應着爲偶然性的均衡之契機。可是，在布哈林呢，價值法則，是均衡的法則，價格的離反價值，只算是一時的均衡攪亂。卡爾常常加強地說：「在生產自然成長地形成的秩序之下，均衡只是偶然性。」（見資本論第二卷）但是同志布哈林却說出相反的話來：「在那裏，可以發生一切的偏差動搖，所以全體系在擴大、複雜化、發展、不斷地運動及變動之中；總而言之，在均衡狀態之中。」（見轉形期經濟學）

若依同志布哈林的議論，結局，對於恐慌的解釋，會不認爲是資本主義諸矛盾之強力解決的形式，而認爲是一時的平衡攪亂。這樣的恐慌觀，恰與杜坎·巴拉諾夫斯基和康德拉基葉夫的命題——說卡爾從『均衡攪亂』之中觀察『恐慌的本質』——相吻合。把恐慌看作均衡攪亂（認定均衡是資本主義的正常狀態）的這種見解，是跟卡爾主義漠不相關的。卡爾說：「資本使用於個別領域的比例，

由連續的過程而被均等化，這是事實。但是，過程的連續之現存，以同樣的連續的不均衡——由於這過程而不絕地、有時不能不強力地均等化的——為前提，這也是事實。」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着恆常的不均衡，但是却沒有恆常的恐慌；因為不均衡和恐慌並非同一的東西，恐慌只不過是比例的強力恢復的形式罷了。現存的不均衡老是發展下去，等到再生產成爲不可能時，這就成了恐慌。卡爾說：「恐慌恰是表現再生產過程的破壞與中斷的契機。」（見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

認爲恐慌是均衡的一時攪亂這種見解，是基因於不理解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之敵對性質的。機械論者離開了質的規定性來考察再生產過程，即不把再生產過程看作是在一定的特殊歷史生產關係上進行的、而且依從生產關係之法則的過程來考察，而把再生產過程看作是物的和人的生產要因之自然補償的技術過程來考察。這種自然主義技術接近，同志布哈林在轉形期經濟學中表現於如下的命題，

他說：『我們把社會看作是自然的諸要素之體系來處理。』對於這句話，伊里奇，簡單地評註道：『請救救啊！』在同書中，布哈林又這樣說：「處理物和勞動力的自然形態，以它們的單位來計算；處理社會本身，必須當作自然的——物質的諸要素之組織來考察。」從這裏，可以極明白的得出結論：布哈林不是把再生產過程當做物質生產要素的再生產和社會諸關係——對這過程賦與特殊性質的——的再生產之統一來考察，而是當做自然——技術過程來考察。這種論調再推論下去，就會抹消了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和轉形經濟再生產過程之質的差異。相應着這種論調，同志布哈林在轉形期經濟學中又寫道：「普羅利塔利亞當前的任務，在形式上，即倘若把過程的社會內容置之度外，那就是跟縮少再生產場合的布爾喬亞的任務相同。」——這一處，伊里奇加以評註道：「『我的』（即指布哈林——引用者註）波格達諾夫式煩瑣哲學，是我的主要敵人。」（伊里奇遺稿集，第十一卷。）

再則，這裏還須附帶的說一說所謂危險的敵人這一回事。因為均衡理論，已經化為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再建設之反革命潮流的理論武器了。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從四面八方向我們要求：叫我們不要剷除都市及農村的舊經濟關係，破壞神聖的『均衡』原理啊！他們不理解：均衡一般是沒有的，有之，也只是在特殊的各社會構成的運動中所固有的、有質的規定的均衡之契機而已。他們故意把市場均衡和均衡一般看成同樣，不僅叫我們的計劃凍結在均衡點上，並且還叫我們的計劃服從於市場的自然力之永久法則，基於這些法則、通過這些法則來統制經濟。

前面提及過的尤洛夫斯基說道：「一切商品——貨幣經濟，必須考慮到市場的現存，（但是問題是在於怎樣考慮；克服市場關係呢？還是立腳於市場關係的自然成長的發展呢？——引用者。）又市場上，均衡必然到來這一點，和在形成這種均衡上，價格現象發生什麼作用這一點，都不得不加以考慮。蘇維埃國家的

經濟，只要是某種典型的商品——貨幣經濟爲限，那麼，價格形成的諸法則，對於這一國家仍然保有強制力量。」（財政通報第十二號，一九二六年，一八頁。旁點由引用者附加。）

這樣，基於價格形成的法則的『均衡』（是那一些諸法則呢？——當然他們是指永久的資本主義諸法則。）——在這裏，有着現代布爾喬亞復古論家的一切書齋智慧之哲學意義。尤洛夫斯基一派要求：放任價格法則的作用，以市場均衡的確保爲地盤，而建立於它的基礎之上；其餘，當然還附帶着要求：如自然力的長成略！資本主義的勝利略！計算，是確實的，它只是無主宰地進行。從由普羅列塔利亞指導來統制的市場諸關係，到基於社會主義建設、合面集體農場化、當作階級看的富農之清算、而克服這些諸關係，——像這樣，便是我們跟資本主義諸要素及其辯護家作理論鬥爭和社會實踐的道路。

不消說均衡論的『適用』，並不限定於再生產理論的領域以內。照先前所指

摘：波格達諾夫不但把均衡原理應用到再生產的分析，並且還應用到價值理論上去，這點，他誇爲自己的功績。

我們已經知道了：在再生產理論上，均衡原理引導向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之反卡爾主義的表象，防礙着對於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現實諸法則之理解，而且變成了轉形期經濟學的再生產理論諸法則之爲布爾喬重復古論家所歪曲的理論基礎。

那末，我們要知道均衡原理之適用於價值說，存在那裏。因此，非得首先知道社會發展的『能』理論——爲價值理論之機械論解釋的一構成部分——不可。

在『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講義』中，同志寬恩，不僅再生產了『均衡理論』，並且還再生產了和均衡理論有密切關係的觀念。即：「社會與自然間的『能』的『正』，乃是社會發展之決定的東西。」（見寬恩著經濟學方法論講義、三頁）

現在拿寬恩和波格達諾夫的見解作一番比較罷：

寬恩

波格達諾夫

在生產力和生產諸關係的發展中，發生了特殊的『自然淘汰現象』。亦即在生存鬥爭中，不充分適應鬥爭的生物，就會死滅，只有最適應的生物才能生存，同樣，在和自然作鬥爭亦是如此，倘若不能使自己的生產機構完全適應這鬥爭的要求，結果，耗費於生產的『能』超過了由獲得的諸對象所補償的『能』，這樣的社會就會滅亡。

（見寬恩著新經濟學方法論）

一切社會體系的生存之本源的、根本的條件，就是爲了生存而跟外界自然的勝利鬥爭；因此，我們在這裏必然地看出的根本傾向，便是適應的傾向。換句話說，一切社會體系，在其總體上，在其生活必要部分上，必須充分滿足自己的需要。否則，就會生出完全的或者部分的攪亂啊！亦即被呼爲體系，而且以組織性、安定性、維持均衡爲前提的東西，就會滅亡啊。

（見波格達諾夫經濟學教程第二版。）

依照卡爾的意見：生產力和生產諸關係矛盾的結果，一個舊社會構成就跟新社會相交替。依照寬恩及波格達諾夫的意見：一個社會消費多，生產少，因而滅亡。這種理論，在寬恩他們看來，不但是適合於各種社會經濟構成的普遍發展法則，並且是同樣程度適合於動物和人類之普遍發展法則。卡爾跟馬爾薩斯作鬥爭時，曾經指摘過：社會不是個體的簡單的總和；並且，社會也不是依照人類的生物學發展法則而發展的，乃是依照由一種社會經濟構成的構造產生出來的法則而發展的。在各歷史發展階段，具有各自特有的法則，因此卡爾認定要設立一般人口法則，是不可能的。現在退一步來講，假定寬恩及波格達諾夫的理論是對的，那麼我們請問：封建制度爲什麼會滅亡了呢？資本主義制度爲什麼會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地方會滅亡了呢？而其餘的六分之五，也就快要滅亡呢？難道可以說：在封建制度之下，人們消費多，生產少嗎！何況在資本主義之下更不能這樣說呢。

卡爾指示了：開始生出剩餘勞動的，不是資本主義，等到勞動者生產已經超過了勞動力的再生產所需要以上，資本主義才開始出現。

波格達諾夫的嘗試，是企圖把社會發展的諸法則、諸矛盾、階級鬥爭等，還元為社會和環境的均衡（『能』的『正』）攪亂的，伊里奇當時曾經徹底批判過他說：「波格達諾夫，是完全不依照卡爾主義研究的，而是力圖將過去研究所得的成果，換上生物學的『能』論用語法之衣裳的。這種嘗試，徹頭徹尾是不妥當的，因為要將『能』、『能』的『正』等等的概念，應用到社會科學上去，只不過是一種空話而已。實際上，拿這些諸概念，斷不能解決社會現象的任何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的任何說明的。」（見伊里奇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企圖把社會現象還原於生物學現象、物理學現象的這種嘗試，伊里奇叫它『空話』。它不能解決社會科學方法的任何說明，這點，在波格達諾夫所建立的『能』論價值理論上，已是很明白了。

講到均衡原理和『能』論社會發展理論之於價值理論的適用，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所謂『社會價值』，便是指「爲要生產一定的生產物，對於社會必需的勞動『能』的分量」（見波格達諾夫經濟學教程六三頁）；或者是指像波格達諾夫的寬恩所說的那樣：「在價值上所表現出來的，……是生產即等於人類生理『能』之一定量的支出這件事實。」波格達諾夫，想把他的『能』論價值觀奠定基礎，他說：「假定：社會全是單調一樣的東西，各種經濟，其欲望之大，及在它們各自的內部，支出於生產的勞動『能』的分量彼此都差不多；如果有百萬個這樣的經濟，那麼，各個經濟的欲望，便相當社會必要的百萬分之一，各個經濟的勞動，也相當勞動『能』的社會總支出的百萬分之一。如果這時候，社會總生產完全滿足社會欲望的全部，那麼，各個經濟，爲了完全滿足自己的欲望，當把自己的商品相交換時，就必須收回社會總生產物的百萬分之一。如果各個經濟收回的比較少，那就會漸漸衰弱而開始崩壞，於是從前的社會任務——在

和自然作鬥爭中，提供社會總勞動『能』的百萬分之一給社會的——便不能完成了。如果一部分的經濟收回的社會總生產物在百萬分之一以上，那麼，收回百萬分之一以下的其他的經濟，就會變成困難和衰弱了。」（見前書）

從寬恩他們的價值的『能』論之基礎出發，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每個經濟單位，必須不斷地收回支出了的勞動『能』；要不然，那個經濟就會衰弱而至於崩壞。由各生產單位所支出的，必須當作相應着它的『能』——積蓄於被消費的生產物之中的——而以自然的形式收回來。波格達諾夫的體系，是從還未有剩餘價值這種假定出發的；因為如果是生產者不僅再生產他們消費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力，同時又再生產剩餘價值的話，那麼，事情就會兩樣，即使從波格達諾夫的前提出發，也絕對不能得出結論說：要是支出的勞動『能』多，收回的勞動『能』少，這種生產單位就會崩壞；生產者只要收回必需生產物和生產手段，就可以繼續進行支出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力的再生產了。

波格達諾夫的體系，是在被誤解的單純經濟諸關係上建立起基礎的。在單純經濟中，商品生產者的平等表現於：他們按照價值來交換自己的商品，即照應着對象化於商品中的勞動量而交換這一點。商品生產者，在交換自己的商品時，如果收同比他支出於生產較少的對象化的勞動，他就會轉移到旁的生產部門去，這並非因為他害怕肉體的衰弱，而是因為轉移到旁的生產部門要比較上算哩。社會，却跟波格達諾夫的意見作對，一部分的商品生產者，在價值以上出賣他的商品的場合，社會並不滅亡、崩壞。價格這樣的背離價值，只不過是表示各種經濟部門間不均衡的存在罷了。在資本主義經濟，這種不均衡及和它有連帶關係的生產與消費間的不均衡之必然增大，在現實上，就招至恐慌和生產過程的中斷。然而，恐慌和生產過程的中斷，却並非由於社會收回的勞動『能』少，支出的勞動『能』多而發生的，乃是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亦即生產諸力和生產諸關係的諸矛盾，要求強有力的解決而發生的。應用於發達的資本主義之波格達諾夫的

理論，總而言之，是胡說白道。在這裏，價格直接的以生產價格爲中心而擺動，經過許多媒介環，才開始由價值來決定，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各個資本家的平等，就是指他們獲得平均利潤這一回事。

若依波格達諾夫的理論講來，資本家非得收回支出去的數量的勞動『能』不可，否則，他們的經濟就會衰退、崩壞下去啊！這簡直是癡人說夢。須知各種生產部門的資本分配，不是依照勞動『能』的支出和收回的平均之原理來進行的，而是依照對於等量資本的利潤的平均之原理來進行的呀。波格達諾夫的『能』論的價值理論，不是當作商品經濟勞動之特殊的社會表現形式來考察價值，而是當作表示人類對自然關係和『能』的正之超歷史範疇來考察價值的，波氏理論之無內容，已清清楚楚地給曝露出來了。波格達諾夫理論的根本罪過，在於將經濟勞動還原於物理工作這一前提的錯誤。恩格斯說：「拿物理學的尺度去表現經濟諸關係，這是不可能的。」（見書信集二八四頁）如果依照波氏的見解，說價值只

是一定數量的『能』，那麼，爲形成價值勞動的抽象勞動，也是生理『能』的支出，而且只是生理『能』的支出。這樣的解釋抽象勞動，便是波格達諾夫和寬恩的特徵。抽象勞動的自然主義解釋，跟卡爾沒有半點關係的。抽象勞動，是社會、歷史範疇。但是，這種說法，並不如魯平所想那樣：抽象勞動是非物質的，是在交換中形成的。抽象勞動，乃是表現出當作商品經濟——在那裏，具體勞動不是勞動的社會形態，勞動的一般性才是勞動的社會形態——之特殊社會的勞動形態看的人類勞動力支出底平等的。因爲卡爾不是從『能』上來解釋抽象勞動，所以抽象勞動的測定單位也不是物理學尺度（例如基羅格蘭姆、米突等），而是社會尺度。卡爾說：「單純的平均勞動，在不同的國度和不同的文化時代，當然其性質有差異，但是，在某一特定的社會，却是一定的。」（見資本論第一卷）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將那些「把工作的熱力學範疇，企圖適用到經濟學中去」的學者們的嘗試，稱爲噓語。他說：「將某種熟練勞動，換算成基羅格蘭姆——

米突，而用它來決定工資成嗎？便請這麼試試看罷。」（見恩格斯著：自然辯證法。）

第九章 卡爾的方法與古典派經濟學

曾經黑格爾整理過的合則的發展及變化的觀念，由卡爾而開展於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研究中。黑格爾發展觀的本質，在於：各種現象不僅在時間空間連續，並且某一現象依照內部的、內在的法則，從其他現象之內部發生並發展這點。

卡爾不是把經濟理論的歷史，當作個別的觀念、命題、理論之無秩序的集合來考察的，而是當作合則的發展來考察的。在卡爾的體系，經濟學史的內容，便是被完成的勞動價值說之發展。卡爾給克格爾曼的信中說道：「理論的歷史，不消說，是照你的正確的想像一樣，雖有是明瞭或是曖昧、是紛亂的錯覺或是科學地決定的之差別，但却證明了對於價值關係的理解是同一的。思惟過程本身，是

從各種關係發生的，是它本身自然過程，因此，現實地理解的思惟，完全是一樣的，只是依着發達的階段，而且應着成熟的程度如何，特別是應着思維器官的發達如何，而起變化的。」（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書信）這樣，從勞動價值的方法則出發，直至建立完全適合於現實的、理路整然的卡爾體系，是須要許多經濟學者亘一世紀半之努力的。

卡爾以前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從其採擇方法的觀點看來，可以劃分爲兩個基本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經濟學者從複雜的活的全體開始分析，以抽出最單純的諸規定而終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經濟學者從單純的抽象諸規定出發，企圖理解具體全體之複雜諸關係的時期。

亞丹·斯密士以前的經濟思想史，屬於第一期。當論述各個經濟問題時，如貨幣、市場、商業、輸出入、商品、致富要因、國家的結合等等的現象，重商主義者還未能把那些零散的普遍化，發展爲全一的理論體系，亦即他們還須探求這

種發展的出發點。十七世紀的經濟學者們，總是從有機的整體，如人口、國民、國家、聯邦等等來開始；但在結尾上，總是用他們依着分析結果所得到的僅少規定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例如分業、貨幣、價值等等來作結束。」（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二六頁）到了古典派經濟學，才開始試圖從價值出發，而把握具體全體的一切多樣性。亞丹·斯密士便代表第二期的初頭，在這時期，各種政治經濟學體系，「從勞動、分業、欲望、交換價值等簡單的東西向上到國家、國民間的交換、世界市場等的政治經濟學的諸體系已開始了。這種方法，顯然是科學的正確的方法。」（見前書）古典派經濟學，是踏上了認識布爾喬亞社會之內部關聯及發展的法則的道路了的。不過古典學派的思惟，受着布爾喬亞階級性所限制，他們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因此使得他們不能曝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矛盾。爲了不能理解：形成價值勞動之特殊社會性質、布爾喬亞社會勞動的雙重性和矛盾性、從那里發生的商品之矛盾等等，至使古典學派的分析，不能貫

澈到底，以不充分而終；比如價值形態、貨幣、資本秘密，對於斯密士、李嘉圖他們，依然還是未決的懸案；所以他們的綜合，不能算是成功的，不能夠從其內部的及合則的關聯上把具體資本主義再現出來。古典學派的不幸，並不在於魯平所想的那樣：他們沒有脫離分析的領域，而是在於他們基於不充分的分析而嘗試綜合。然而古典學派，却不單只研究現象的表面，並且研究了現象的法則，在這一點上講，他們總算是作了卡爾經濟學體系的準備之必要的歷史階段。

卡爾稱之為古典學派的，乃是指從培蒂以後的研究布爾喬亞生產關係之內部關聯的一切經濟學。「卡爾把古典學派和俗流經濟學對立起來，因為後者只是徘徊於表面關聯的領域以內；爲了所謂最素朴的現象之似是而非的說明和布爾喬亞的御用起見，而始終反復着科學政治經濟學在很早以前已經提供了的材料。」（見

資本論第一卷）

一 在斯密士和李嘉圖體系中的經濟諸範疇之發展

斯密士的偉大功績，在於他開始從價值理論出發，而試圖把握資本主義現實的一切多樣性。當作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開創人的斯密士，一方面試圖究明『經濟諸範疇之內部關聯』，他方面，試圖記述『發現於外部的布爾喬亞生產方式之生活形態』（見卡爾著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在這兩課題之間，缺乏一種聯繫，這是斯密士的特徵。而這一特徵，又表現於斯密士關於價值的諸規定——在政治經濟學中，變成了相反諸觀點的出發點——之雙重性和矛盾性之中。誠如恩格斯所說，我們在斯密士的學說中，可以看出：不但有着「關於價值概念的『正相反對的各種見解之痕跡』，又不但有着兩種、並且有着三種、正確地說，有着四種關於價值的相反的見解，對角線式的並存着。」（見反杜林論）

斯密士，不能夠建立起理路整然、而沒有自相矛盾的價值理論。因為這個原

故，他不能夠達成對於資本主義現實的一切現象見解之統一。卡爾說：「但是斯密士的矛盾，具有如下的積極意義：即斯密士的矛盾，包含着許多課題，他事實上不能解明這些課題，然而正因為不能解明的原故，以至曝露了他的自相矛盾。由於後來經濟學者之間的論爭，說斯密士的學說，時而採用了這種觀點，於是在這一點上的他的忠實的本能，完全被證明了。」（卡爾著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一二〇頁）

財富之生產和分配的諸問題——斯密士把『國富論』的主題這樣地定式化。因為斯密士把布爾喬亞的生產形態，看做照應着正常人性之自然的、永久的形態，於是他把在資本主義社會財富所採取的特殊形態，當作自然的形態來處理。這樣一來，他便不能澈底的分別開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當作使用價值總和看的財富和當作價值總和看的財富了。

對於何謂財富這一個問題，斯密士有兩種答案。他說：「人類相應着以欲

望、利便、享樂的對象來保障自己的程度，而分出富者或貧者。」但是，除此以外還可以看出和這見解相並行的另一種帶着價值性質的見解，即：「人類相應着其能夠支配或能夠購買的勞動量，而分出富者或貧者。」（見斯密士著關於國民的財富之研究）

跟財富和財富的布爾喬亞形態之混同相關連，斯密士，又將關於財富源泉的問題，跟關於交換價值源泉的問題等同看待了。他和重商主義者及重農主義者相反，他把『國民一年的勞動』、他把當作分業化的一體系看的社會總和的勞動，認做財富及價值的唯一泉源。同時，我們還可以在斯密士的理論中，看出他從重農主義者借過來的論綱：自然的生產物，『有着跟最高價的勞動者的生產物同等的價值。』（斯密士語）物質財富和社會形態之不絕的混同，把斯密士引導到如下的結果：當研究使用價值的時候，他『把自然的要素，置之度外』，反而『在純社會財富的領域中，——即在交換價值的領域中來討究。』（見政治經濟學批

爲着不能洞察價值的特殊社會性質的原故，因而斯密士又不能無遺漏地分析形成價值勞動的性質。他把勞動的這種性質，看做個別具體勞動的自然性質。在斯密士的理論中，出現勞動家畜也跟勞動者同樣具有形成價值的能力這一論綱，決不是偶然的。當解決了關於價值泉源的問題之後，斯密士便集中全部注意於交換價值的數量規定。這時，他不絕地混同着：關於『價值的內在尺度』的問題、和關於使得各種商品的價值測定實際成爲可能的、實在的、外部的價值尺度的探究的問題，從這里，斯密士開始探究不變的價值尺度，終於至到對一切勞動者，站在同量的勞動要求同一的犧牲這個理由，而主張不變的『勞動價值』。我們在斯密士的理論中看到：價值所表現的勞動之客觀平等和被交換的『勞動量』之主觀比較與估量的混同。這種見解，後來引導到商品生產所支出的勞動數量和以這商品能夠購買的勞動數量之混同。

卡爾說：「斯密士把由商品包含的勞動時間來決定商品價值、和由勞動價值來決定商品價值，總常常混同着，在詳細說明的時候，始終動搖不定。於是他主觀的承認：社會過程，在不等的勞動種類之間，用強制力來設定的客觀平等化把個人勞動平等起來。」（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四九頁）

斯密士，拿當作商品買手和賣手看的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係來做分析的出發點，得出了由手工業生產的諸條件所制約的結論，亦即『勞動的數量』是跟『勞動的價值』同一的結論。然而等到『土地的佔有和資本的積蓄』發生，勞動者對於自己的勞動，所收回的工資，就不等於他的勞動的生產物，由此，各種商品所含的勞動數量不再調劑商品的價值了。這樣一來，照斯密士的意見：商品價值變成了只是根據以這商品能夠購買的勞動數量來決定的。生產條件採取資本形態的場合，『勞動的數量』不等於『勞動的價值』，斯密士沒有得出這個結論，反而想使勞動價值的法則作用於他以前的時代。斯密士立脚於價值法制，不能夠解

決關聯着資本和活的勞動相交換而發生的矛盾，他的謬論，可由這個事實來說明。

資本使得交換變形。然而，斯密士雖立脚於「勞動的價值」這一正確的規定，但却解決不了這時所發生的諸矛盾。他不能夠把經驗事實跟價值法則連繫起來，墮落了深深的經驗論坑潭。他建立了：價值的分裂為各種所得和由工資、利潤、地租等構成價格底理論。他認為工資、利潤、地租是各自獨立的構成部分，共同構成商品價值的，它們都是價值的獨立泉源。斯密士說：「工資、利潤、地租——是一切所得的三個基本泉源，因而又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種基本泉源。」這樣一來，他就建立了「一切商品的價值，常常依附於它們的『所謂中心點』（斯密士語）」和自然價格的體系。自然價格對於生產參與者的一切，必須保障自然工資、利潤、地租。

說起斯密士的自然價格，究其實仍不外是生產價格罷了。但是他把生產價格

與價值混同了，因為他固執着錯誤的、站着於表面現象的見解，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從工資、利潤、地租等獨立地決定的價值所形成的。斯密士一點沒有關心到存在於勞動價值和平均利潤之間的諸矛盾。他不去證明價值法則通過全系列的媒介環境，怎樣實現於資本主義社會，反而去建立那種和勞動價值說相並行的、時而和勞動價值說完全無關係的、獨特的生產費（費用價格）學說。斯密士在自然價格論中，陷入了為整個生產費學說之特徵的循環論法。

為要指摘：斯密士所不曾解決，而把解決的任務留給李嘉圖和卡爾的諸矛盾及諸問題起見，首先的舉出下面的事實：第一，斯密士不曾給與為形成價值勞動的抽象勞動的分析。第二，他的價值說顯出方法論的曖昧，即是顯出主觀契機和客觀契機的交錯。第三，當他決定價值的時候，時而採用商品生產所支出的勞動，時而採用以商品所能購買的勞動。第四，他為着基於由勞動的決定價值，不能夠解決對象化的勞動與活的勞動底交換；因而轉將價值法則的作用，局限於商

品經濟的前資本主義形態。第五，他根據自然價格的理論，逃避開基於勞動價值說的利潤平均化的問題，並且不提這個問題。

對於斯密士從一個原理出發，而不能建立科學的體系這點來講，則李嘉圖便是把原理邊沁式的解作：「對於某種判斷，當作原則和根抵而有益的基礎觀念」，通過資本主義諸關係的一切迷路而觀察和縷述一切其餘的諸範疇跟價值的原理如何矛盾。卡爾一方面承認李嘉圖的抽象方法的着眼點底正確性 和科學性，一方面又指出：第一，李嘉圖的抽象不澈底；第二，李嘉圖當考察商品價值的時候，不能捨象其他具體的諸關係，他不要什麼媒介環，直接地將價值的抽象規定，應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諸關係。李嘉圖底抽象的第二個本質的缺陷，是它的形而上學性。辯證法發展的思想，是李嘉圖所不了解的。他以『競爭無礙地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為研究對象，跟斯密士一樣，認定資本主義是生產的永久自然形態。因此，在李嘉圖，政治經濟學的諸範疇，也就從歷史範疇轉化為永

久範疇了。

李嘉圖追隨着斯密士，在區別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後，跟着就區別當作使用價值底總和看的財富和爲價值底總和的財富。主要的，是想規定「支配着財富底分配的諸法則」，於是李嘉圖首先在價值中找尋分配的尺度，而集中全副精神於價值的決定上。處理了由斯密士的價值的規定、即由支出於生產的勞動的規定底李嘉圖，在勞動中找不到實際尺度，「那尺度……是測量起因於商品生產所須的勞動之多寡的各種變化的」（李嘉圖語）。引起李嘉圖所關心的，不是價值的實際尺度，而是決定價值量的變化底法則。他解決了『勞動的數量』和『勞動的價值』的斯密士的混同，由於站在澈底的、客觀的觀點上，又解決了斯密士的主觀主義。

依照李嘉圖的意見：勞動是價值量底內在尺度。因爲「從勞動上來講，相異的諸商品是同類的東西，亦即勞動是諸商品底統一、諸商品底本質、諸商品價值

的內部基礎」(卡爾語)。然而，李嘉圖一邊承認勞動是價值底基礎，一邊又沒有分析勞動爲什麼採取價值底形態。他沒有區別開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因爲他『不曾理解勞動是價值要素的特殊形態』(卡爾語)。他對於交換價值的分析，只限於交換的數量比率，他忽視價值形態。可是「勞動生產物的價值形態，乃是布爾喬亞生產方式底最捨象的、又是最一般的形態，因爲這樣的原故，所以布爾喬亞生產方式，被當作社會生產一種特殊方式、同時當作歷史的產物而加以特徵。」(見資本論第一卷)

斯密士理論所逢着的難關：——即資本和勞動底交換，對象化的勞動和活的勞動底交換，由李嘉圖以下面簡單的主張來解決了：「支出於商品的勞動底『數量』和拿商品能夠購買的勞動底數量，是不相等的。」但是他沒有再進一步去討究交換就停止了。跟斯密士一樣，他也把商品交換的法則，直接地適用於資本和勞動底交換，於是陷入了這樣的結果：第一，擺不脫那種好像是有勞動的販賣及

勞動的價值的錯覺，墮入了循環論法。以至將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依『勞動』本身的假想價值來決定。第二，（也是從第一必然產生的結果）他不能夠基於勞動價值而展開不矛盾的剩餘價值說；卡爾却由於插進了為媒介環的勞動力——資本家購買而勞動者販賣的——光輝地解決了。須知勞動不是商品，勞動力才是商品啊！

因為迴避開資本和活的勞動底交換問題。至使李嘉圖無法理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範疇，並且常常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看做相當於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而混為一談了。根據這種論調去理解資本主義生產現實運動之必要的諸根據，『實不堪一擊』（卡爾語）。因為不依資本的有機構成來區別資本，所以李嘉圖不能解決勞動價值說與平均利潤率的矛盾。他把價值底法則直接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形成過程，這樣一來，就把價值和生產價格等同看待了。在這裡，雖然他發覺有了問題，但是他却認定在那本經濟學原理裏面所給與的解決，是他本

人的不夠，他依然堅持着勞動價值說，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面說道這樣的語：「缺點不在於這種學說不能克服困難，而是在於試圖明確敘述的人物力量不夠的緣故」。（李嘉圖給拉姆傑和馬克加洛克的信，一八一六年）

李嘉圖克服了斯密士殘留下來的許多矛盾撞着，然而還是留下許多未解決的問題：第一，沒有分析形成價值勞動的性質，對於價值形態也沒有加以注意。第二，沒有基於勞動價值說，來解決少量的對象化勞動和多量活勞動底交換問題。第三，利潤率平均化的過程，不應當把它看做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價值法則的破壞來展開、甯可應當看做勞動價值法則的實現來展開這一任務，仍作懸案殘留着。

二 古典派經濟學方法論的特徵

我們看過了斯密士和李嘉圖的經濟學諸範疇之後，古典派經濟學方法的功勞

和缺點也都明白了。在它的功勞方面來講：古典學派，力圖在資本主義諸關係外表運動形態之背後發見那些諸關係的運動法則，力圖在外觀上散亂的諸形態的多樣之背後，曝露其內部諸關聯。他們不是僅僅把資本主義諸關係表面體系化或者記述的，而是把那些多樣的諸關係，分析地還元於統一的東西。他們的方法，是抽象的、合理論的分析方法。古典學派的分析和卡爾辯證法的分析本質上不同。古典學派的方法，是在十八世紀底形而上學唯物論直接影響之下被形成的。這時期法蘭西唯物論的根本特徵，在於：僅注意到實在的量的方面，而抹煞了質的規定性和特徵着實在的諸矛盾。

古典學派，認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適應人性的永久生產形態。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適應着生產諸力發展的必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照古學派看來，却以爲是『恰如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是自然的必然的東西。他們不能夠找出：這一生產方式的歷史過渡性質和制約其發展及滅亡的內部諸矛盾。

認定資本主義是永久體系，他們自然找不出其否定的要素。「李嘉圖把布爾喬亞生產，更精確地說，資本主義生產，當做絕對形態來考察。所以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關係的一定形態，如果沒有跟生產相矛盾，那末也就不會變成生產的桎梏了。」（見卡爾著：關於剩餘價值的諸學說第三卷）

斯密士和李嘉圖，都是新興布爾喬亞的代表者。新興布爾喬亞對於自己秩序的缺陷採取批判的態度，多少還帶點兒科學分析的能力的。但是他們是自己階級的代表者，不能夠說資本主義是歷史過渡生產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夠看出資本主義社會諸矛盾之發展。所以他們便不曉得從一切特殊性、矛盾性上來全面地分析資本主義關係了。古典學派的分析，把各種形態的一切多樣性還原為一個一般的、同一的原則。——除去這一社會構成的質的規定性，從它的多樣分解開來——古典學派的分析，不能夠跟綜合連繫起來，那是基因於他們的機械論思惟的根本方法論錯誤，亦即基因於把現實看做沒有矛盾和對立的統一（註）。古典學派

的方法，因此便有了本質的缺陷。照前面講過的：分析以綜合爲前提，反過來假如沒有綜合，也就不會有包括的分析。

但是，比之古典學派的前驅者們，則斯密士和李嘉圖的方法的積極方面，是不容否認的。古典學派曾試圖把資本主義現實的一切多樣的現象有意識地還原於內部統一。他們將在現實的表面上看到的分離的各種所得形態，歸納於第一源泉：亦即將地租還原於超利潤的盈餘分，利息還元於利潤的一部分，利潤還元於爲生產物價值一部分的剩餘價值，最後，將生產過程中的那些一切諸形態還元於勞動。卡爾說：「古典學派的偉大功績，就是打破了：那種虛偽的外觀及錯覺、財富的各樣社會諸要素間的那種互相獨立化和真締化、物的那種人格化和生產關

（註）當給休謨·米爾的方法加以特徵時，卡爾說道：「經濟關係，——因而，又表現經濟關係的

諸範疇——是內包着對立、表現着矛盾和矛盾統一的，米爾強調了對立的統一的契機，而否

定了對立。米爾將對立的統一轉化爲對立的直接同一。」（見關於剩餘價值的語學說第三卷七

六頁）這種特徵，用之於發展米爾的恐慌理論的李嘉圖也是適當的。

係的物化、日常生活上的那種宗教。古典派經濟學，將利息歸屬於利潤的一部分，將地租歸屬於超出平均利潤以上底超過分；亦即兩者是融合於剩餘價值中的東西。古典派經濟學，又將流通過程當作只是簡單的形態變化的東西來表現。最後，分析商品底價值及剩餘價值，而將它們歸屬於直接的生產過程的勞動。」

（見資本論第三卷）

還有，古典學派底功績，在於：立脚於還原價值於勞動，而使科學迫近了剩餘價值生產的問題，往往以朴素的犬儒主義曝露了資本主義秩序的諸矛盾。但因混同資本主義財富的發展和財富一般的增大，且因受資本主義秩序的框子限制着眼光的關係，所以確信資本主義永久性的古典學派，往往不惜公然接近資本的諸矛盾。例如李嘉圖，由於把相對人口過剩的形成，看做恆常的現象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犧牲，而公然正視資本主義採用機械的諸矛盾。然而，從布爾喬亞世界觀產生出來的古典學派的分析之不充分，使得他們得不着徹底地探討和發現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諸矛盾的可能性。從這里，就發生出他們所犯的許多嚴重錯誤。——糟塌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引導他們走上擁護（辯護和贊揚）資本的道路——這樣一來，不理解資本依着有機構成的分裂，和資本依着蓄積過程底分裂的李嘉圖，便因襲斯密士，而得出了恰如蓄積的資本以全部工資的形式被支付出去的結論。李嘉圖當論證勞動與資本蓄積的外觀上的利害調和時，廣泛地利用了斯密士的結論。不理解商品生產者勞動的特質，因而又不理解貨幣形態底性質和流通過程的諸矛盾等的李嘉圖，不單是否定了一般恐慌的不可避免性，並且關於這可能性本身也還加以強辯。斯密士在很多地方，由於把價值認作某種、預先被給與的、相互獨立的、不同的三個階級的所得量，亦即認為價值是工資、利潤、地租的總和，以至全部糟塌了加意研究的成果。若依斯密士底意見，工資、利潤、地租這些部分，各具自然的、公正的數量。斯密士的結論，因為是把資本主義分配看作沒有對敵的自然的、公正的分配，而替它辯護，所以被廣泛地利用了。

古典學派之還元多樣的資本主義現實於統一，結果還是半途的、片面的、不徹底的。卡爾說：「古典學派經濟學，在這點上，往往陷於自相矛盾。它總是試圖不消媒介環，而將一切還元於統一、證明相異諸形態的泉源之同一。」（見卡爾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三卷）這樣，在分析上是不徹底的古典派經濟學，又在綜合上露出其分析的一切缺陷。當古典學派試圖根據分析——不充分的價值規定——的結果而展開資本主義的具體諸關係時，就立刻曝露出他們的無能——使價值與利潤的媒介環開展的無能——了。他們的綜合，由於分析的不充分而停頓；反之，他們的分析却由於在方法上的綜合契機之不充分而停頓。古典學派，不能無內部矛盾地發展剩餘價值說，這點是顯然易見（註）。

力圖把利潤直接還元為生產物價值的一部分、把利潤與剩餘價值相淆混的結果，李嘉圖終至於將生產價格和價值混為一談了。他在以專門發展價值為任務的地方，因而在專門處理商品的地方，已經嘗試着：將平均利潤率和從更發展的資

本主義生產關係而生的一切諸前提，放進研究對象中。由於把利潤和剩餘價值混爲一談，而將利潤還元於價值的李嘉圖，因而又混同了價值和生產價格，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就是把資本主義諸關係和單純商品經濟的諸關係等同看待了。

在分析上，卡爾比之古典學派遠爲深入。他不單把價值還元於勞動，並且還原於勞動的特定的社會形態，因此，卡爾能夠發見從價值過渡到利潤的必要的媒

（註）卡爾說：「古典派經濟學，希望通過勞動的偶然價格，而達到價值。經濟學者，爲了埋頭於勞動的市場價值和所謂價值的區別，爲了專心於價值和利潤率的、或由勞動所生產的商品價值等的關係起見，隨着分析進步，不但從勞動的市場價格推論出假想的價值，並且向來就不曾發覺已到了必須將勞動本身的價值歸屬於勞動力的價值的地步。古典派經濟學，沒有意識到自己分析的這種結果，把「勞動的價值」或「勞動的自然價格」的範圍，當作價值關係之最後的十全的表現，而無批判地採用的結果，終於陷入難解的混亂和矛盾中，同時，又替在原則上只承認外觀的淺薄的俗流經濟學，造成了堅固的活動根據地。」（見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七章）

介環，亦即能夠發見勞動力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後者，是以『任何商品生產者都不是生產手段所有者』為前提的。社會中一部分的人——資本家——佔有生產手段，另一部分的人只不過保有勞動力而已，沒有辦法不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生產手段的佔有者。

卡爾證明了下面的事實：即古典派經濟學的分析，是既淺薄而又不澈底的，「因為古典派經濟學，對於發生地展開各種形態，不感到興味；對於依着分析，把各種形態還的於統一，才感到興味，因為它是把各種形態當作前提而從那里出發的。……古典派經濟學，不當作歷史形態來考察根本資本形態和以掠奪他人勞動為目的的生產，而當作社會生產的自然形態來考察根本資本形態和以掠奪他人勞動為目的的生產」，因此，終於陷入錯誤，走進迷途。（見卡爾著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三卷三八八頁——三八九頁）卡爾說：「李嘉圖原方法在於：首先從商品價值量由勞動時間決定這點出發，其次，探討其餘的經濟諸關係及諸範疇有沒有

跟這一價值決定相矛盾，或者它們把這一價值決定怎樣地變形。這種方法顯然可以看出：一方面，因為是經濟學史上的科學必然性，所以具有歷史辯解；但另一方面，科學上的缺陷也很顯著，於是這種缺陷不單在敘述的方法上（形式上）表露出來，並且還帶來錯誤的結果。——因為這種方法，想跳過了必要的中間環，直接地證明經濟學諸範疇的一致——（見前書第二卷九——十頁）。古典學派的形而上學思惟，使得他們不可能從某一形態發展到其他的形態。他們一方面，把複雜的形態，機械地強力地還元於簡單的形態，因而他一方，不能從簡單的形態發生地抽出複雜的形態，迫得把兩者直截了當混為一談。

不理解質的特殊性，是機械論世界觀的最大特徵，這點，在古典派經濟學方法論中也鮮明地表露出來。只要一看這樣特徵古典學派的方法，就可以瞭解：那些不看古典學派的方法和卡爾的方法之差異，而認為後者是『抽象——分析』方法的人們之謊謬了。（參看布哈林著食利階級的經濟學二九頁，及古諾論集經濟

學的根本問題中的關於對卡爾研究方法的理解）卡爾的方法，是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是辯證法，但決不是像斐特里及魯平所想像的：『社會觀點』是卡爾開始適用於政治經濟學的新的東西。辯證法唯物論方法，使得卡爾能夠把資本主義當作歷史過渡的社會經濟構成，而認識了它；正藉着這種方法的幫助，在商品經濟的物的關係之背後，解明了人的關係。魯平承襲斐特里，以歪曲失當的形式描畫古典學派和卡爾的相互關係。若依魯平意見：古典學派的方法和卡爾的方法之差異，在於：前者將經濟諸形態還元於物質——技術生產過程，反之，後者却提起了爲什麼物質——技術生產過程會採取該種形態這個問題。（見魯平著卡爾價值學說綱要第三版五四——五五頁）像這樣來解釋古典學派和卡爾，我們能夠同意嗎？我們認爲不能同意的。魯平把古典學位和卡爾都俗流化了。假如古典學派說的全部精髓，只在乎將社會的還元於物質的——技術的生產要因的話，那麼，他們跟俗流經濟學者就會一點沒有分別了啊！卡爾講到『三位一體公式』時，冷笑

了那些把工資、利潤、地租看做爲物質生產要因的勞動、資本、土地的結果的寶貝們，同時，把他們跟古典學派嚴密地區別開來。不過，在古典學派中，可以看出俗流解釋的要素，也是事實；因爲狹隘的布爾喬亞眼光之故，古典派不能夠洞察資本主義諸關係的底奧，但是他們的特徵，却並非那種流俗表象，而是對於現實的科學的、客觀的認識之諸樣相。然而這些樣相，乃是卡爾經濟學體系發展的出發點，這樣，卡爾能夠光輝地打破和克服先驅者們的歷史眼光制限性的。我們在古典學派的理論中可以看出俗流表象，同時也可以看出布爾喬亞社會之生理學的分析。他們不是將各種所得還元於各種物質——技術生產要因的人們，而是將各種所得還原於由勞動所形成的價值的諸部分之開創人們。他們底分析，照我們已經講過，它是片面的、不充分的；他們的綜合，在第一步，就被顛覆了；話雖如此，但是，認古典學派經濟學是俗流經濟學的魯平的主張，到底是沒有根據的。

第十章 在布爾喬亞科學中經濟學對象的規定

布爾喬亞科學，現在正逢着危機。這是一切布爾喬亞最偉大的代表者們都沒法否認的事實。一九二五年，蘇特爾茲曼發表了一部題作『現代經濟學的危機』的龐大著作，實在不是偶然的。比較早些的時候，歐頻哈米爾對於這個主題而寫的論文中，說有下面的話：「科學國民經濟學，目前陷入臨死的狀態。」歐頻哈米爾不能理解布爾喬亞經濟學的『死症』不是偶然的事實。這死症是一種宿疾。原來布爾喬亞社會的階級諸矛盾之長成，逼使布爾喬亞科學代表者們從研究資本主義的客觀發展傾向，轉變到辯護資本主義，——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高的成就——那宿疾就是從這一瞬間開始了的。卡爾給古典派以後的經濟學加以特徵說：「布爾喬亞在法蘭西及英吉利取得了政權。從那時代起，階級鬥爭，無論在實際

上，在理論上，都日漸採取明顯的威嚇的形態了。階級鬥爭撞打了科學布爾喬亞經濟學最後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在於那種學理正確或這種學理正確；而在於一種學理對於資本家是有益呢，還是有害呢？妥當呢，還是不妥當呢？觸犯警察的忌諱呢，還是不觸犯警察的忌諱呢？御用的論難攻擊，代替超越利害的研究而出現；爲了辯護的昧心與惡意，代替自由的科學研究而出現。」（見資本論，第二版跋文）這確是給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刻劃得淋漓盡至。布爾喬亞科學，到現在已喪失了客觀地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諸矛盾的能力。它不是在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過渡性質這一點上着眼，而是在證明資本主義之確固不動的永久性這一點上着眼的（註）。

（註）伊里奇說：「即使是在事實的專門研究領域內能夠貢獻最有價值的勞作的經濟學教授，如果事情一經關聯到經濟學的一般理論，那就無論一個人、一句話也不能夠相信。因爲在現代社

會，經濟科學，跟認識論同樣是黨派的科學。」

布爾喬亞科學的危機，變成了布爾喬亞經濟學底兩極：『自然主義的』極和『社會的』極之鬥爭而出現。兩種傾向底任務，到現在只剩一種了。便是跟卡爾主義相鬥爭。他們只不過是採取不同的道路執行這種任務罷了。關於這點，兩種傾向的代表者坦白地說了出來。『經濟學中社會傾向』的巨頭蘇特爾茲曼說：「在實踐上，跟彈壓打成一片，積極的社會政策是必要的，同樣，科學也不能以簡單的批判為滿足。否則，卡爾的精神就會永生啊！我們要用健全的社會觀念論的新鮮漂亮的體系來打倒唯物論體系，我們要拿這種法寶去吸收那些因為沒有漂亮的觀念論而投入社會主義懷抱底人們啊……」。

蘇特爾茲曼，對抗卡爾底『唯物論體系』，力圖建設『健全的社會觀念論的體系』；另一方面，自然主義傾向的代表者們則以其他的方法，從對於布爾喬亞可悲的現實的逃避開；換句話說，即他們不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特殊過渡樣相，而探討剝去特殊規定性的抽象的『經濟』——看作人類和自然的簡單的關係

——。葛塞爾以極端犬儒主義的形式，說明了他們爲甚麼必須拿當作純技術過程看的生產分析去代替生產的社會秩序之研究。他說：「目前，在關於社會秩序組織之觀念形態的問題中，有着歪曲的表象和政治權力的影響之誇張（葛塞爾覺得傷心）。在廣汎的大衆中，經濟生活的一切不幸和一切不愉快的現象，存在着彷彿是社會秩序的組織及形態根本錯誤的結果而乍看起來確是自然的表象。這種表象，使人確信着：彷彿只要掌握政權，就可以對現存社會組織施以必要的改革，因而樂意的改善也容易實現。如果詳細地考察來看，就將要知道：一切空想和革命理論，結局只是基於這些素樸的表象的合成。」（見葛塞爾著理論經濟學基礎觀念——旁是由引用者附加）照這樣看來，葛塞爾的意見：一切不幸事件，乃是起源於：認經濟生活的不幸依存於社會秩序的組織和形態這種思想，存在於大衆之中的原故。如果能夠光輝地證明了：經濟生活並不依存於社會秩序，那麼，認社會秩序的變革能使經濟生活的法則發生變化這種『錯覺』，就會馬上消散了。

啊：這種理論，是貢獻與布爾喬亞作理論根據，來對抗那些希圖獲得政權和變革現存社會組織而改善廣泛大衆生活條件的人們的；在這裏，很明確地描出了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的諸任務。「政治經濟學必須探究：我們經濟生活的各方面，依存怎樣的社會構造。底組織形態，跟怎樣的社會構造的組織無關。」（見前書——旁點由引用者附加）若依葛塞爾的意見：政治經濟學是必須證明經濟生活不依存於社會構造的。

葛塞爾說：「這種研究的結果，知道了：認爲社會秩序具有改善經濟過程作用的社會主義教理主義者的信仰，會立刻失掉其內部根據。」（見前書）一切布爾喬亞經濟學者，並不完全像葛塞爾那裏公開談論『科學的諸任務』的。但是現代布爾喬亞科學之『科學的』研究者，却都是指望著打破『社會主義教理主義者』之信念的。蘇特爾茲曼力圖建設「健全的社會觀念論的體系」，而葛塞爾則以證明經濟過程與社會秩序無關，來代替生產的社會秩序之研究。根據這些理論，恰

是決定爲了布爾喬亞『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對象。葛塞爾說：「我們的科學對象，就是具有一定社會形態的經濟。這經濟的性質，在某種程度，則處於現存社會秩序的影響之下，但，在某種程度，則又與這要因無關。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就在說明這種無關的程度，就在指摘：分析的進行，特別是其結論，在現實上能夠具有什麼意義。爲要達到這種目的，當我們作基礎研究時，關於社會秩序的組織及形態，不能不以容許最少限度的前提爲原則。」（見葛塞爾著理論經濟學的基礎觀念、二五頁——旁點由引用者附加）照上面所講，葛塞爾是以關於生產的社會秩序的前提之最少限度適用爲政治經濟學研究底根本原則的。他恰恰是推薦拋棄爲卡爾主義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東西。因爲布爾喬亞科學是希望把矛盾和階級鬥爭——是播下對於布爾喬亞諸君不愉快的種子的——拋棄的。

不像葛塞爾那樣公開的經濟學者，拿『經濟』或『國民經濟』這一類概念來隱蔽社會關係的抽象。最流行的、最常見的一種經濟學定義：「經濟學是研究國

民經濟的科學。」(註一)這個在德意志語格外愉快地響亮的定義，已經給盧森堡嘲笑過了。盧森堡又引用洛薩的政治經濟學對象底定義「我們將研究國民經濟的科學一語，解釋做研究國民的經濟生活之發展法則的科學」，而加以諷刺說：「政治經濟學是什麼？照尊意，是研究國民經濟的科學。角邊眼鏡是什麼？是眼鏡，是鑲着角邊的眼鏡。挽貨馬是什麼？是挽貨物的馬。」(註二)

倘說：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研究『國民經濟』，——那麼，這兩句

(註一)丘布洛夫著：經濟學教程二〇頁。關於政治經濟學對象，還有一種流行的定義：「研究財富的科學。」斯密士將它的主要著作名爲「關於國民之財富的研究。」米爾說：「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乃是財富。經濟學者或以研究財富的性質及其分配法則爲任務，或以研究生產爲任務。但，財富這個名詞，原來應該怎樣解釋呢？有些人(如斯密士)把財富解作使用價值的總和；有些人(如李嘉圖)又把財富能作交換價值的總量。這個用語的曖昧和科學性，已經給傑爾努塞夫斯基揭露出來了。」

話即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明。然則，究竟經濟是什麼呢？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

(註三) 經濟學者對於這一個問題，有種種不同的答案，但仍有一點是一致的：即『經濟』，『經濟活動』的本質表徵，乃是衆所周知的『經濟原則』。華格捏爾說：『經濟是根據計劃並且根據經濟原則而向着人類必需滿足的人類勞動行爲之總和』。

關於『經濟原則』，且留着後面再說，這里先着眼下面的事實吧：滿足人類欲望的勞動行爲，就是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永久過程，亦即使用價值的生產過

(註二) 盧森堡著：經濟學入門。在洛薩的原本（按即指歷史學派創始者洛薩著的國民經濟學之基礎

·實業家和研究者用參考書及教科書一書，一八五四年發行。——見盧森堡著經濟學入門

——譯者註）可以看到許多無內容的術語遊戲，例如：“Wolkwirtschaftslehre”

“Lehre von der volkswirtschaft”，“Nationalökonomie”，第一、第二只是形式不同

而內容相同的概念，兩者都相當於第三的「國民經濟學」。

程。若把某一社會經濟構成的特殊運動法則，跟人類對自然的永久關係相置換，那就是跟企圖證明經濟現象不存依於社會秩序的葛塞爾的意圖恰相一致了（註四）。當作研究經濟的科學看的經濟學的定義，乃是基於技術和經濟的混同而來的，丘普洛夫曾試圖區別技術科學和經濟科學，他說：「和技術學不同，經濟

（註三）教授蘇倫傑夫說：「在我們經濟生活的諸現象中，有些極流行極普通的話，如『經濟』、『經濟活動』之類。無論誰頭腦裏都有着一種表象：經濟是什麼？經濟活動是什麼？但是這種表象，離科學概念——關於它，明瞭地印入我們腦經的，而且我們明確地決定地解明它的本質的——還很遠呢。於是『經濟』、『經濟活動』這一類的用語，毫不加以分析，就當作規定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基礎來處理；如果我們要把當作理論經濟學對象來處理的許多一定的諸現象，安排在這種用語之下，那就會上大當。我們知道：『經濟』這一概念，是很廣泛的很曖昧的概念，說經濟的時候，也可以包含完全不能算是政治經濟學對象的許多對象。」（見蘇倫

傑夫著：經濟學入門一二頁）

學。是。從。某。種。觀。點。——（即從由於人類活動而獲得的利益和起因於人類活動的犧牲之觀點）來研究追求滿足物質欲望的人類活動之科學。

（註四）「於是這點成了經濟學者們的辯護論之根據。他們說：跟機械之資本主義的充用有不可分的關係之各種矛盾和抵抗，因為不是從機械本身發生出來的，而是起因於機械的資本主義的充用的，所以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原來機械被資本主義的充用時，延長勞動日，但是機械本身，則縮短勞動日；機械被資本主義充用時，提高勞動強度，但是機械本身，則減輕勞動；機械被資本主義充用時，使人類隸屬於自然力之下，但是機械本身，則意味着人類對自然的勝利；機械被資本主義充用時，使生產者轉化為被救恤的貧民，但是，機械本身，則使生產者的財富增殖。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拿上面的事實作為論據，而簡單地宣明：若就機械本身來觀察，深知以上一切顯明的矛盾，只不過是普通事實之單純的幻像而已，就它本身，因而又就學理上來講，確實不存在的。這樣一來，他們主張：早就用不着絞腦汁了，也不必攻擊機械之資本主義充用了；——與其冒攻擊機械本身之愚，毋寧作持反對派的論調。」（見資本論第

「從這種觀點來看：追求物質欲望之滿足的人類活動，便是所謂『經濟活動』，這些活動的總和便是『經濟』。」（見丘普洛夫著：經濟學教程一一頁）

丘普洛夫特別加以說明道：「這種觀點，當分析利益和犧牲的均衡時，特別是當分析追求物質欲望之滿足的活動時，是要用作經濟觀點的。」（見前書十頁）從根據利益和犧牲的比率這一原則的估量經濟行為之『觀點』，區別出經濟現象和技術現象。即令關於問題的純主觀提起、和『觀點』，暫時擱起不談，而這個場合亦不能不強調技術和經濟之間，實質上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因為，『支出』和『成果』的比率之基準，也可以適用於工藝過程（由原料的生產物的收獲率、燃料的熱利用率等）之物質關係。丘普洛夫自己不懂得這種關係，便作如下聲明：「這些觀點（技術觀點和經濟觀點——著者）往往一致。即在技術關係上最完全的經濟行為，在經濟關係上也表現為最有利的。」（見前書一一頁）

因此，丘普洛夫越過最初的定義，進而不能不把經濟現象的特殊差別之定式

化變形了。

總之，支出和成果的比率，以「利益和犧牲的均衡」之算出為基礎。在這裏便可找出巧合於一切的「經濟原則」（註）。而這一原則，便成立於「計算考慮利益和支出，而採取兩者底均衡」這一點上。若據丘普洛夫，這種均衡的算出，是從其他一切現象中區別開經濟現象的。可是，取得均衡的，只是就同質的數量而言。於是，在他後來的定義中的經濟原則，——力圖使成果超過於支出——便

（註）這一經濟原則，一部分經濟學者，不但把它轉化為經濟活動本質表徵，並且把它轉化為一切人類活動一般原則那樣無內容的東西。例如：列德勒爾說：「倘若常常觀察，在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內，可以叫作『經濟性』的，不僅在移動儲蓄財產的場合，並且在人類以某種目的而作的任何行為都可以看出這種行為之相同的樣式，換句話說，即是將現存的一定量諸手段——依照追求的目的而使用的——由最少的支出而收穫最大的成果那種樣合目的地使用。」

（見經濟原則）

以這一事實（把支出和成果還元於與爲自然形態的使用價值的形態（進入於這過程，且從這過程出來的）不同的某種東西）爲前提，可是，在不絕地進行這種還元的社會，在生產着價值的社會，他的定義中的『經濟原則』，在現實上恰巧支配着經濟活動。資本主義生產的代表者們。認真追求利益，渴望資本增殖而活動着。若依喬姆巴爾特底繪畫表現：全世界是一冊大帳簿，在其左右兩邊的紙頁上，借方、貸方、支出、收入等類的魔法辭句放射着黃金色的光輝。在關於當作經濟活動永久的，決定的動因看的經濟原則的誇張的斷定中，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只不過是將布爾喬亞紳士諸君的生意觀念翻譯成似是而非的科學辭句罷了。在生產不是爲了追求利潤，而是向着在質方面有各種的、在量方面有一定的勤勞者欲望的滿足的社會主義社會，有名的經濟原則，決不能成爲經營原則。然而有一部分經濟學者，希圖挽救和擁護『支出和成果的均衡』之永久榮譽。他們爲了這個緣故，提議：採取支出『能』的數量和形成的『能』的數量之差額，作爲經

濟尺度，應該找出全部支出及全部生產物之還元的經濟尺度。不消說，在他們當中無論那一個也不會提起共通於蒸汽機關、鹽漬胡瓜和合唱團合唱的『能』尺度。可是問題，並不在於：「支出和成果的『能』的均衡」實際上沒有實現性這一點，而是在於：對於無生物、有生物、動物社會、人類社會、又人類社會的各種構成，都一律適合的關係和尺度，能夠適用於統制某一經濟的特殊發展的原則這一點。由於將資本主義『經濟計算』的特殊關係移植於其他一切社會構成，而踏入了錯誤第一步的『能論家』們，再由於將不但和各個經濟構成的特質毫無關聯、並且失掉社會規定性的尺度，化爲經濟的普遍原則，而完成其錯誤。在社會主義社會，爲求『經濟的』效果性，沒有訴諸『能的』體操之必要。康德拉契葉夫派經濟學者，非難社會主義說：資本主義崩壞，是爲了爲支出效果性標幟的利潤率作用衰敗的緣故，經濟以無帆無舵，滿足各個生產部門中的技術指數、和計劃機關爲着經濟全體的自由採量，不能不前進。然而效果性的經濟標幟，在社會

主義也存在着啊！它不能不求社會勞動生產性的增進程度啊！在所有的社會諸條件之下，生產性增大的指數，是對於生產物一單位的總勞動量（活的勞動量和死的勞動量）之減少，這種減少，又關連着『資本有機構成』的高度化的。

「無論在怎樣的社會條件之下進行生產，進入商品的總勞動量的減少，總是勞動生產力向上的本質表徵。生產者依照預定的計劃，甚至在調節生產的社會和單純商品生產之下，勞動生產性也可以由這一尺度無條件地秤量；可是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事情怎麼樣呢？甚至半減活的勞動那樣的新機械發明，在資本家看來，是不大歡迎的，因為機械不節約資本，僅祇增高剩餘價值率的緣故。」「利潤率，不因採用新機械而直接變動……所以生產價值也依然照原來一樣不變……若就資本主義諸條件之下生產的社會來看，商品不廉價，新機械就不會帶來一點兒改良的；因而資本家也不高興採用新機械。如果採用新機械，只是損失現在還未消磨完其全部價值的舊機械而已……因為先要吃眼前的虧，所以資本家對於自

已極力警戒這種空想的、不上算的勾當。這樣，向上的勞動生產力，對於資本家有無條件的意義，……這種場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陷於新的矛盾。其歷史使命，乃是不管願意不願意而被迫前進的勞動生產性底幾何學增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像目前那樣，阻礙勞動生產性發達，違反這個使命。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不過是證明使自己衰老，並且日益超越自己罷了。」（見資本論第二卷）

於是，生產效果性的『尺度』，極明確地表現為兩種：即『生產者依照預先對應其生產的計劃而調節』的社會的『尺度』；和資本家——在他們看來，現象的本質，隱藏於物質關係的背後——的『尺度』。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生產性的向上，是前一種『尺度』。而這種向上是在：『活的勞動部分減少，過去的勞動部分增大，這樣一來，包含於商品中的總勞動量也減少』這一點上成立的。在資本家看來，利潤對於資本，亦即成果對於支出的數量超過，便是『尺度』，這一尺度的『科學的』定式化，便是所謂『經濟原則』。布爾喬亞經濟學從資本

主義諸關係中抽象出來運用的『經濟原則』，被轉化爲一切經濟活動——並且和生產的技術關係混爲一談——的本質表徵。布爾喬亞的自然主義傾向，便這樣地解決關於經濟學對象的問題。一切意義上的主觀論者，例如：從「個人的消費感情」上來觀察經濟學對象的李夫曼，即屬於這一流人物。李夫曼當決定經濟學對象時，亦從『經濟』出發。可是在前面解剖過的經濟學者，認『經濟原則』特徵着『經濟觀點』，對於這點，李夫曼則是從最大成果（物質的——數量的）之由最少支出而達成中來看技術上的問題的。經濟上的問題，在於獲得儘可能大的享樂，儘可能多的利益這一點。所以對於經濟現象的本質的檢討，使得李夫曼注定要墮入心理學的泥坑（參看蘇倫傑夫著：經濟學入門七〇頁）。他從心理判斷，心理評價中看出經濟現象的本質。李夫曼把主觀的——心理的經濟觀跟客觀的——物質的經濟觀——他認爲物質的經濟觀成立於技術和經濟的混同上——對立起來。他說：『經濟的事物』之心理解釋和支配的數量的——物質的解釋的對

立，乃是根本的；這個問題，無疑是理論經濟學的根本問題。」（註）

在馬薩爾，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範圍，乃是在人類活動的特殊範圍中——在那裏，人類被特殊的動因所誘導——的精神經驗。經濟學者不是研究人類的一切精神經驗的，而是研究發現於外部而且能夠用貨幣來秤量的東西。「經濟學者，只是根據外表現象來研究精神狀態，倘若看到那些現象是由於行爲之等力的動因而發生的，他就認爲是與先前同樣的現象。」（見蘇倫傑夫論集，對象和方法一六八頁、一九二五年）馬薩爾說：「統括於經濟問題這一共通名稱的諸問題，……特別是屬於人類由能以貨幣秤量的動因所誘導的人類行爲之一範圍。」（見前

（註）由蘇倫傑夫著經濟學入門七一頁引用。關於主觀心理學派的代表者當中，這裏我們只提到李夫曼氏。因爲在本章，我們要說明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各種觀點當中之某種觀點起見，而舉出許多作家。所以在本章，我們不是以批判奧大利學派和歐美學派的方法爲任務的。這個課題，須要加以特的考察，這裏只得暫時撇開。

書一八三頁）雖然馬薩爾發明他所研究的人類，既不是人類一般，也不是隔離的人類，而是『當作社會集團一成員看的人類』，然而在他看來，爲經濟學研究對象者，既不是人類意志的關係，也不是社會秩序，而是個人的心理經驗，而是在物質界的和使用價值的自然關係上的人類經濟行爲之動因。——這些動因具有必須能以貨幣秤量的唯一條件——

這樣，對經濟學諸問題的自然主義的、超歷史的接近，也是主觀論者的特徵。所不同的地方，只是一部分人（如葛塞爾、丘普洛夫等）將經濟關係歸着於技術過程，反之，另一部分人（如李夫曼、馬薩爾等）則將經濟關係歸着於使用價值的消費或獲得的過程中的個人心理經驗。但是雙方都是把當作具有矛盾、抵抗、階級鬥爭等的特殊社會構成看的資本主義，置之度外的。他們把人與人的關係，跟物與物的關係或人與物的關係相置換。恩格斯說：「是。人。與。人。的。關。係，在結局上是階級間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常常與物相關連着，而且以物的形式出

現。」

當研究經濟現象時，自然主義接近的無效果，和跟卡爾主義作鬥爭的顯然無力，至使經濟學中的『社會傾向』很快地普及了。而這個傾向，就是蘇特爾茲曼所證明的，所謂對抗卡爾主義而企圖建立「社會觀念論的健全體系」。『社會傾向』底代表者們，跟經濟學上的『自然主義』執行了斷然的鬥爭。這時，他們由於賦與卡爾的方法以矛盾二重性，也把卡爾暴力地拉進『自然主義』的隊伍中。

裴特里說：「在卡爾的體系中，佔支配地位的，至使不能完全理解他的體系的根本矛盾，在於卡爾從黑格爾精神哲學承繼過來的思惟的動因和思考的唯物論的、自然科學的傾向——與其說是對認識的純粹意志，倒不如說是由政治的社會運動的思想而課與卡爾的——之不妥當結合這點。」（註）裴特里嘗試了要從『唯物論的』動因中——依裴特里底意見，動因是由於『政治的、社會運動的思想』而課與卡爾的——解放卡爾的學說。

由於要從唯物論解放卡爾學說，裴特里將卡爾列入了從李志格爾特學派派生的新康德派之列。

這裏不能不提到一件事，就是：總之所有的『社會傾向』的人物，全是新康德派底兒子。蘇特爾茲曼、亞蒙、裴特里無論那一個都是徹底的新康德主義者。他們從李志格爾特及文德爾本特的新康德方法論出發，而構成關於經濟學對象的見解。新康德派哲學的特徵，便是在社會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科學認識之間設定界限。這派哲學，在出發點上，主張：社會現象不依從客觀合則性，因而根據客觀

(註) 裴特里著：卡爾價值說的社會內容二〇頁。斯志爾惠，當時亦指摘過所謂（卡爾底二元論，他說：「在卡爾的經濟學體系中，這個基礎動因交錯纏綿着：第一，是機械論的、自然主義的動因，卡爾根據這個動因，建立了關於當做價值的實體及尺度看的勞動支出的『客觀的』學說；第二，是在經濟現象的物質背後，觀察其根本內容、和在生產過程，歷史地變化人類關係的社會學動因。」）斯志爾惠給俄譯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

發展法則的解明不能夠說明各種現象的純因果。照他們的意思：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只有以文化史方法代替採自自然科學的因果方法才有可能。然而文化史方法，在於從是否適應一定目的觀點來檢討社會現象，這點。社會現象，不是因果關係、乃是依目的論關聯而互相聯繫，並且和其他諸現象聯繫。某李志格爾特主義者主張：談目的論的場合，要提及在一定的道德目的和倫理規準之對應中某一現象的評價。

它是露骨的素樸的倫理目的論。蘇特爾茲曼是倫理目的論的徹底信徒。其他的信徒更將『科學的』定式化給與目的論方法。於是，在評價現象時，用作標幟的，既不是倫理學也不是道德原則，而是將現象的選擇和分類之關鍵給與研究者之手的研究之目的。這樣一來，社會科學的任務，變成了不在於研究社會現象的客觀發展法則，而是在於：或從道德原則的觀點上、或從研究某一現象時之目的的觀點上來考察各種現象。對於現實的客觀認識跟純主觀主義相調換了。裴特里

從這種方法出發來解說卡爾體系。

依裴特里的意見：在價值說中卡爾底方法的二元論，表現於：從李嘉圖發生的「價值及價格諸現象之因果自然科學說明」、和「從社會內容分析出價值及價格諸現象，而企圖引入『社會的』觀點的文化學傾向」之矛盾中。裴特里拋棄現象的自然科學說明，而將經濟學研究的任務，歸於在『文化意義』上的、在『社會的』本質及『社會的』價值上的現象的認識。這樣，經濟學，便從研究基因於生產的人類關係和階級關係的科學，便從表明階級敵對及階級鬥爭之經濟基礎的科學，轉化爲概念與定義之樸素的觀念論遊戲了。對於這些一切的體系，可將一八六八年卡爾給恩格斯信中的話對照起來看：「只有由於以抗爭的事實（事實、物、現實諸關係的抗爭）和構成隱蔽的、秘密的、現實對立，來代替抗爭的教理（教理及理論的抗爭），才能使經濟科學成爲實證科學。」

關於經濟學對象的蘇特爾茲曼的解釋——究研對於社會——倫理學目的原則

有幫助的手段之科學——現在暫告一段落，這回，想多少觸到『社會傾向』的最
大代表者亞蒙的經濟學對象的定義來看罷。

亞蒙將關於經濟學對象的學說，從經驗的對象和認識的對象之區別開始。

他從新康德派哲學家借用這種區別。依照立戈爾特的意見：現實在不斷變化
中，現象決不能以同一的形式反復，只是一回的、唯一的、過渡的某種東西。我
們靠着自己的悟性，在被表象於我們的觀察的多樣諸現象中，才能帶來某種秩
序。他說：「在我們經驗事象的無限中，只有我們的思想才是整理不同的多樣的
東西。」（註）所以在社會現實中，決定各個科學的限界的客觀標幟，是不存在
的。

把各種不同的科學對象認作思惟活動的結果，這樣地區別開來。思惟由於從
一定觀點收集和分類事象的無限差別及多樣，而設定秩序。思惟由於將經驗的現
象分配於一定的關聯，而抽出『社會的、合目的構成』的認識對象——亞蒙把認

識對象跟觀察對象、經驗對象對立起來。——這樣，各種科學的認識對象，不是當作相異的運動形態之質的規定而給與；而是當作還元於從那個這個片面地選擇經驗世界的觀點收集來的概念之結果而出現。他說：「不是『物』的『實在』關聯構成科學，乃是各種問題的思惟關聯構成科學的。」（見亞蒙著對象一六七頁一九二七年版）構成經濟學諸問題的特徵是什麼？「經濟學上的這些基礎諸問題的特徵，被社會特質所要約。因而這些基礎諸問題特徵，在於當作方法論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諸問題而出現這點。」（見前書）可是，亞蒙怎樣解釋諸問題的社會性質這句話呢？怎樣解釋社會關係這句話呢？例如，蘇倫傑夫教授說：「在『社會的』這一概念的規定上，亞蒙站在跟卡爾同樣的基礎上面。」（見李倫傑夫著：經濟學入門四八頁）但是亞蒙和卡爾之間，並沒有絲毫一致之點，為要明瞭

（註）在亞蒙的理論中，間或有一些正確的論綱，這也是事實。例如：「現實或經驗界，在思惟進

入它以前，即已有了某種內部秩序和合則性。」（見亞蒙著對象二二頁）

這件事實起見，只消知道亞蒙的社會關係的解釋就夠了。在亞蒙的理論中，我們看得到的，只是對於『社會的』之非卡爾主義的解釋，蘇達姆拉一般的解釋。

『社會科學的』和『非社會科學的』之區別，亞蒙是從前者的社會制約性之中來看的。他說：「這種制約性，成立於我們稱之爲『組織』的社會構通的一定外表秩序上——由社會所給與，或通過社會而嚴密地設定，或在暗默中承認，或具有法律性質，或具有契約性質的。——」（見Annon, Objekt Etc. 1927. S. 16）

這不是和蘇達姆拉對『社會的』之解釋相一致了嗎？蘇達姆拉說：「社會生活，就是設定於外形秩序的人類共同生活。外表秩序、法律秩序，——是社會生活底唯一表徵，外表統制，外表規準——即是『社會的』之特殊表徵。」（Stammeler, "Wirtschaft und Recht" 1896. S. 90）亞蒙跟蘇達姆拉一樣，也認爲如果沒有外表『法律秩序』，社會現象就不存在。社會關係的特殊性，被還元於法律關係。社會關係和法律關係的這種混同，從亞蒙認社會關係和意志關係是同一的這

點上可以看得出來。亞蒙說：「只有由某一個人的意志及行爲，決定另一個人的意志及行爲這件事，我們可以認作是社會的。」（見亞蒙著對象一七八頁）「這裏要討論的問題，只是關於個人的行爲之互相制約性，和個人的意志及行爲對他人的意志及行爲之依存性。」（見前書一七八頁）因而，依照亞蒙底意見：社會關係就是意志關係。

卡爾區別開法律關係和生產關係，說前者是意志關係，後者是跟人類意志無關的，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卡爾評蒲魯東說：「在蒲魯東看來，問題，在本質上，只是關於現存的近代布爾喬亞財產的。財產原來是什麼呢？對於這個問題，只有把一切財產關係的總和，既不從其法律表現上、也不當作個人意志的互關係、而從其現實本質上、亦即當作生產關係來包括的『經濟學』的實踐分析，才能夠答復。」（見哲學之貧困）這樣看來，照卡爾底見解：『意志的互關係』乃是法律關係，斷不能跟『生產關係』相混同的。

這也是爆露一樁事實的：假如有人說亞蒙的解釋跟卡爾的解釋是站在同一的基礎的話，那麼，他就是既誤解卡爾的理論，又歪曲亞蒙的見解了。蘇倫傑夫依照魯平底解說來觀察卡爾。亞蒙的經濟學所研究的社會關係，跟卡爾的經濟學所研究的生產關係，是毫無共通之點的。

只要觀念論的解釋經濟學所研究的社會關係、和不當做依據生產的人類關係來考察社會關係爲限，亞蒙便不能夠看出經濟學對象和物質生產的關聯之必然性。他說：「經濟學所研究的諸現象，不但跟生產活動沒有連繫，而且離開生產活動而獨立着。這些現象表現於「經濟的、生產的活動」等類意想不到的地方。

「假如能有某種無社會關係的『經濟生產』的話，那末，反過來，也就可以離開生產，亦即在完全的抽象上，並且離開任何生產活動而獨立地想像某種社會關係了。」（見亞蒙著對象一二四〇頁）

「實際上，國民經濟學，不是處理財富的生產，而是處理某種社會關係的。

這些諸關係，在某種諸條件之下，可以列入財富的生產，但是不僅可以從跟財富底的生產之關聯上來觀察，並且也可以離開財富的生產而獨立地觀察。」（見前書二五〇頁）

概括起來說，亞蒙認為經濟學對象，是離開生產獨立的。他只考察社會關係的形式，亦即分離開內容的形式。他說：「經濟學的認識對象，乃是社會諸關係在社會溝通之一般的——一定組織內所受的特殊形式或狀態。」（見前書二二〇）

形式觀念論地理理解當作經濟學對象看的「社會的」這件事，就是指無視了布爾喬亞社會的根本階級拮抗，無視了表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特殊矛盾的拮抗。卡爾說：「社會關係，跟生產力緊緊地連繫着。由於獲得新的生產力，人類就變革其生產方式，變革自己的生活保障的方式，亦即人類變革自己的社會關係。」（見哲學之貧困）可是布爾喬亞科學，不想正視社會關係的變革，布爾喬亞經濟學的自然主義傾向，或則以各個人的技術關係，或則以心理經驗來替換依據生產

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而布爾喬亞經濟學的社會傾向，則將經濟學從研究生產諸關係的科學轉化爲研究與現實經濟過程分離的社會形式的科學，因之而回避開那些諸矛盾的分析。但是，兩者使得資本主義的底科學認識轉化爲資本主義的辯護，這一點，却是完全相同的。正因其如此，才不失其現代布爾喬亞經濟學底真義呢。

——完——

譯 後 記

政治經濟學的書，近年來已經出版了不少，無論是寫作的或翻譯的，初步的或高深的都有了。但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却比較少見。

我想既然政治經濟學裏有了辯證法的特殊的運用，那麼，要更完全認識這一門科學，就必須明瞭它的方法的一般特點。因此，我想：把這本書翻譯過來，對於讀者總會有多少幫助罷！

對於本書我不想發什麼議論，這裏只約略介紹一下；作者杜科爾氏，是蘇聯斯維托洛夫大學的教授，本書就是杜氏講學時的講義，再經他和阿貝支加烏斯兩人共同編訂而成的，本書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即它以批判機械論和觀念論的錯誤為主，旁及修正主義和古典學派以及其他，同時對於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論

爭的卡爾主義經濟學者的錯誤也加以指摘。原有緒論一篇，作者原序一篇，和經濟評議會委員羅甯氏的序文一篇，現在都略去了，這裡順便聲明一下。

我根據的是日文的本子，日譯者却是一個名手。不過從日文本重譯，倒遇到許多例外的困難。初時承吳敏先生的好意，答應從原文校閱一遍，我便託東京的納烏卡社購求原書，但不久該社停業了，因此沒有做到這一步，留下這一樁憾事。

此外曾得艾思奇先生的幫助，至於本書的出版，則全賴夏征農先生的好意，合併表示謝意。

倘有誤譯的地方，希望高明加以指正。

譯者 一九三七，五，十五日。於上海。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七 角

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原 著 者

阿貝支加烏斯
杜科爾

翻 譯 者

莫耐軍

出 版 者

一 般 書 店
上海環龍路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3457B



4408

5